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亨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320 期

2021 年 1 月 31 日

目 录

【国际移民研究专辑】

【论 文】

移民聚居区与族裔经济：美国唐人街的社会学研究

周 敏

分层同化论：新移民第二代研究的理论突破

周 敏

跨国主义的实践与移民祖籍国的发展：

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社团的比较

阿列汗德罗·波特斯、周敏

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

和社会支持——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

周敏、王君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移民聚居区与族裔经济： 美国唐人街的社会学研究¹

周敏²

我的学术生涯始于研究纽约市的唐人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本尼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专业是社会学，更准确地说，是城市社会学。我为什么会选择唐人街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当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生长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著名侨乡，有几百年的国际移民历史，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直到二战以前，有很多人远涉重洋，去了北美和拉丁美洲。我至今还依稀记得童年时阿婆（奶奶）常给我讲的枕边故事。在她言谈之中，美国和其他的国家不同，美国是一座“金山”，阿婆把去美国打工的乡亲形容成去“掘”金山，而去拉丁美洲的乡亲则说成是被“卖猪仔”当苦力。她还说金山里有唐人街，乡下人到了那里就成了“唐人”，唐人住在唐人街，在那儿可以讲唐话，吃唐餐，给唐人老板打工，不必遭洋罪。不管当初是富是穷，那些乡亲去了几年金山，个个都会变成人人羡慕的金山客。那时候，金山对我来说是那么遥远，唐人街是那么充满异国情调，那么神秘虚幻，那么扑朔迷离。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我会走进金山，踏入唐人街，还研究起唐人街来。

一、为什么要选择唐人街？

为什么要选择唐人街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这是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纽约唐人街是我进入美国的第一站。当我初次踏入唐人街时，对此仅仅是好奇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兴趣，更不会想到一个华人移民聚居区也可以成为社会学的研究课题。

1984年夏末，我从香港直飞纽约，纽约离我就读的城市奥尔本尼还有240多公里，需在城里过夜，然后再乘坐灰狗长途汽车或火车前往目的地。那时在纽约我只有一个朋友，他一年前才移民美国，除了他，我在这个城市里就再也没有其他熟人了，可谓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我朋友的一家人对我非常热情，一下飞机就把我接到他们在布鲁克林区租的房子住上几天，倒倒时差，也顺便带我游游这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抵达纽约的第二天清晨，我便跟着朋友的一家人到唐人街喝粤式早茶去了，随后还跟他们一起去了曼哈顿金融区的世界贸易中心和华尔街，登上了当时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如今已被毁了的110层高的双子星世贸大厦的楼顶。

记得那天我一走出地铁的唐人街站，立即就被一幅奇妙的异国都市风貌和多元异族文化交错的景象所震撼，至今还留下栩栩如生的记忆。在那里，宏伟壮观、富丽堂皇的摩天大楼近在咫尺，与陈旧脏乱、熙熙攘攘的唐人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立即被这片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华人移民飞地吸引住了。在此之前，唐人街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关于金山客的虚无缥缈的故事。在那些狭窄拥挤的街道两旁，五花八门的大小店铺鳞次栉比，商铺招牌上写着熟悉的中文大字，地摊、货物和小贩的手推车密密麻麻，与熙来攘往、人头攒动的行人一起挤在拥挤不堪的人行道上，饭馆的橱窗里吊着一排排的叉烧、烤鸭、酱油鸡和各种卤味，空气中还不时地飘来夹杂着广式点心的香味，炒杂碎的油腻味，各种海鲜的鱼腥味，还有垃圾的腐臭味……所有的这一切都掩盖在曼

¹ 本文曾刊于周敏《美国社会学与亚美研究学的跨学科构建》第1章。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² 周敏（Min ZHOU），社会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哈顿下城区高楼大厦的阴影之下，相映成趣。最令我震惊的是东方古老的传统文明和西方超前的先进文明这两种貌似不可调和却又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景象。唐人街的外观就像停留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像是一个为拍摄电影而在闹市中临时搭砌的场景。我不禁好奇地嘀咕，唐人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它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在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中还能容许它的存在？为什么过了一个多世纪后它还如此蓬勃兴旺？住在别处的华人为什么还是对此一往情深，还要不时地去光顾？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其实我心里嘀咕着的这些问题都是很有社会学意义的问题。我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是因为唐人街既生疏又熟悉，既有它独到的族裔属性，也有它与别的少数族裔移民社区所共通的特点。后来读了一些城市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如赫伯特·甘思（Herbert Gans）所著的《城市村民》和杰拉尔德·萨托（Gerald Suttles）的《贫民窟社会秩序》等¹，才受到了进一步的启发。因此当我在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时，唐人街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我的首选。但是应该如何入手，我却没半点把握。当时我对华人在美国的境遇一无所知，也对美国社会排华的历史背景和移民政策效应，华人被主流社会所歧视和边缘化，以及华人为自由平等而不懈抗争的政治运动等问题知之甚少，可以说是一点理论基础都没有。另外，在我就读的社会学系里，当时也没有一个研究亚美社区的教授。

我选择唐人街作为研究课题，除了一些朴素的感性认知，其实更多的还是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考虑。其一，我的初衷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原因，二是经济原因。我离开丈夫和10个月大的儿子独自赴美求学，如果不尽快学成回国与家庭团聚，就会有负于我的家人所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另外，我是一个自费留学生，在学校里拿到的奖学金很有限，对如何申请校内外的科研经费也一无所知，再说许多科研项目的经费是不面向外国留学生的。多呆一个学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有如天文数字，不快不行啊。

其二，研究唐人街，我可以充分利用我来自侨乡的社会资本。我的母语是粤语，还略懂珠江三角洲和五邑侨乡的好几种主要方言。我在侨乡的很多亲戚朋友在美国这边的关系很多，可以为我铺路搭桥，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建立起我自己乡亲社会关系网。熟悉族裔语言和现成的族裔关系网成了我进入唐人街的关键，为我的田野调查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容易赢得研究对象的信任和支持，使我可以较为轻松自然地出没于各类企业、商家和文化场所进行实地观察，找到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华人移民做面对面的访谈。我通过侨乡关系的介绍推荐所结识的一些新朋友还在唐人街为我提供免费的住所和在那里打工挣钱的机会。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资本弥补了我的研究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使我的唐人街研究得以顺利进行，按期完成。

其三，研究唐人街和唐人街的华人移民，对我将来回国的事业发展也许会创造出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当时许多中国博士研究生选择与中国和中国改革开放有关的题目，也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而我的唐人街研究在日后将会比较独特，或许能为在中国社会学学界开辟出一个新领域而打下基础。社会学在1980年代的中国还是新建学科，在那里做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我去当这个领域的开荒牛还是很有意思、很值得的。

出于上述的种种考虑，既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又要尽快获得博士学位打道回府与家人团聚，我便立意研究唐人街，并聚焦于两方面的资料收集：一方面，利用美国联邦统计局公开的人口普查数据来做定量分析，另一方面，根据我自己在唐人街的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来做定性分析。这两种资料来源和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在当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与其说是一种创举，不如说是迫于沉重压力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应该说，当初我并不是凭兴趣选择我自己喜欢的论文题目的，那时我根本就不具备能够使自己随心所欲去作选择的条件。

题目选定后，如何说服导师又是另一个难关。在美国的社会学研究生院里，几乎每个博士生

¹ Herbert J. Gans, *The Urban Villager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Gerald D. Suttles,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Slum: Ethnicity and Territory in the Inner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都把将来能在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里当教授作为职业目标，博士论文被视作能否跨入学术界的敲门砖。因此，导师比较注重学生选题的原创性，还考虑博士论文的研究是否有突破现存理论框架的潜力及学术发展的前景。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当时研究唐人街并不是什么新鲜题目。城市社会学的主流学派对此类移民社区早有定论。甚至连我自己的导师，著名城市社会学家约翰·罗根（John R. Logan）都不怎么看好我的选题。但我坚信能通过我的努力，从中会发现新的和有趣的东西。我从直接的实地观察中体会到，唐人街长期以来是美国华人移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心，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是一个在白人至上的主流社会夹缝中顽强生存的边缘社区。通过剖析唐人街这一具体个案，可以加深对美国少数民族社区和其它族裔文化的理解。此外，唐人街虽处美国，但与母国和海外众多的华侨华人社区息息相关，保持着千丝万缕、有形或无形的联系，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和经验。因此以纽约唐人街作为典型，解剖麻雀，应该可以从中找出规律和新的理论模式。选好了课题、并说服了导师后，我本着相信自己的感觉、坚信自己的判断、尊重客观的事实和运用严谨的科学方法的心态，对博士论文的研究计划作了认真详细的策划。

总而言之，当时我选择纽约唐人街的华人移民社区作为研究课题时，并没有想到要著书立说，独创学派，一鸣惊人。也无意去挑战主流派的理论，更没有想过要在美国的学界出人头地。我选择唐人街，在当时实在是迫不得已而做出的一个很现实的决定。我对唐人街的感情和学术兴趣，是在以后做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地培养起来的。我当时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各种便利的条件，尽快完成学业。

二、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

唐人街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ethnic enclave）。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以及政界、新闻界和娱乐界均对唐人街持负面的观点，视其为光怪陆离、藏污纳垢的罪恶温床，是寄生在繁华大都市之中的贫民窟，是阻碍移民与主流社会沟通的一个文化落后、自我循环和自我生存的封闭社会。许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大多把唐人街描绘成新移民为了生存而暂居的栖身之地，以此为落脚点或跳板，通过个人的长期努力和缓慢的文化熏陶而最终被同化，融入主流社会。在对美国唐人街的研究中，我的立论观点与当时在美国社会学界对移民社区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同化论截然相反。古典同化论的观点认为，移民的同化过程是完全被动的，移民社区阻碍了移民同化的过程。我则认为唐人街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城市贫民区的机制和潜质，能够为移民落地生根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不应把唐人街置于美国社会之外，而应把它看作是与美国社会息息相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把移民看作是有待开发、守旧落后、顽固不化的弱者，而应把他们看作是积极向上、勇于创新、能够把握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强者。我的研究围绕着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经久不衰的移民社区里，族裔成员如何能够在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族裔身份的前提下，通过个人和群体的共同努力而打入美国主流社会？我的分析视角聚焦于一个移民社区，但涉及的内容更为宽泛，其中包括对纽约唐人街的近年来（也就是1980年代）发展历程的定性描述，分析一个以单身汉社会为主的社区如何演变成一个成熟的家庭式社区的动因和结果。对华裔移民尤其是自1965年以后移民美国的中国移民的人口特征，及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定量分析，探讨影响移民个体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对华人的聚居区族裔经济（enclave economy）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剖析，探讨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潜质以及聚居区劳动力动态的性别问题。对近10年来华人移民的种族隔离程度与居住模式从集中到分散到再集中的特征和演变过程的定量分析，评价古典同化理论的适用性和现实意义。

我的博士论文借鉴和验证了当时新兴的社会学理论，即“聚居区族裔经济”（enclave economy）理论。这个理论由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等学者提出。聚居区族裔

经济理论的立论观点是,在一定条件下,少数民族聚居区可以成为促进移民上向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平台”或“动力”,而不是古典同化论所宣称的是阻碍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陷阱”或绊脚石。

首先,我们要区分“聚居区族裔经济”(enclave economy)和“族裔经济”(ethnic economy)这两个貌似相同的概念。在美国移民社会学领域,族裔经济和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两个重要理论一直争议不休。“族裔经济”理论最早由社会学家博纳西奇(Bonacich)、莫代尔(Modell)和莱特(Light)等提出¹。“族裔经济”的概念泛指少数民族群体成员从事的经济活动,包括任何移民或少数民族的商家业主拥有并经营的企业(或雇主和雇员属同一族裔群体的企业)。莱特和他的同事后来在更高层次上重新表述了这一概念。根据他们的重新定义,“族裔经济”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所有权”。指的是族裔群体成员所拥有和经营的企业以及企业控股权,既包括雇主也包括同族的雇员和不付酬劳的家庭成员。二是“控制权”。指的是族裔群体成员所控制的雇工渠道和就业网络,也包括通过这些渠道和网络把同族成员引导进入非同族成员所拥有和经营的企业和行业,以及主流劳务市场的某些行业以及政府的公共部门。因此,族裔经济的概念的双重特性囊括了企业所有权的族裔性以及企业雇工渠道和就业网络的族裔性。对每个族裔群体的企业来说,它是一个中立的、不一定与本族裔文化有内在联系的概念²。莱特一派认为,族裔经济不仅包括“中间人”少数民族的商家企业(middleman minority businesses),也包括聚居区里的少数民族商家企业,还包括由同族成员控制的雇工渠道和就业网络的一些主流行业。根据这个概念,无论一个族裔群体的雇主与雇员比率高低与否,均具有各自的族裔经济。像一些有着很高的自雇率的族裔群体,如犹太人、日本人、韩国人、华人、伊朗人和古巴人等,他们都有自己的族裔经济。而一些自雇率较低但雇员在某个行业的比例较高的族裔群体,如非(洲)裔黑人、墨西哥裔人和拉美裔人,由于他们控制着某些行业或公共部门的雇工渠道,因此他们也有自己的族裔经济。族裔经济与族裔社区和族裔文化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

从族裔经济这个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可以解释不同的少数民族群体如何通过本族群的族裔资源运作和社会排斥机制而产生出不同的社会流动模式和结果。二是可以解释不同的少数民族群体如何通过本族群的雇工渠道和就业网络而打入主流经济,从而导致不同的经济整合结果。然而,当一个概念的外延过于宽泛,以致可以包罗万象时,其解释力也就相对稀释了。例如,聚集在本族裔社区中的同族企业与分散在其它族裔社区中的非同族企业,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严格的说,前者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业主(enclave entrepreneurs),后者被称为“中间人”少数民族经济的业主(middleman minority entrepreneurs)。同样道理,由同族人拥有、并雇用同族人的企业,与那些由非同族人拥有、而管理者和雇员都属于同一族裔群体的企业,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种状况被称之为“行业种族划分”(有人直译为“族裔利基”ethnic niching),或“行业种族隔离”。尽管族裔经济的概念有助于解释某些社会学现象,如弱势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不均,社会流动结果的差异等问题,但以此来解释移民或少数民族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时,这个概念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概念则不同。它虽然是族裔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类别,但却是一个内涵相对集中的概念,特别强调族裔经济与聚居区和同一族裔文化这两个因素互动的内在联系。波特斯和他的同事借鉴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最早提出了聚居区经济的

¹ Edna Bonacich, “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1973, pp. 583-594); Edna Bonacich, and John Modell, *The Economic Basis of Ethnic Solidarity: Small Business in the Japanese-American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Ivan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usiness and Welfare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Black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² Ivan Light and Stavros Karageorgis, “The Ethnic Economy,” pp.647-669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48-649.

理论概念¹。与族裔经济这一宽泛概念相比，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概念并不宽泛，而是很有针对性。波特斯一派认为，衡量一个族裔群体是否已经发展了自己的聚居区族裔经济，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第一，该族裔群体内必须有相当大比例的自雇业主，即创业者和企业家阶层。第二，它的服务对象不仅仅限于本族裔的成员和社区，还须满足主流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第三，它的经济活动的多元化程度较高，不仅仅包括限于族裔社区内且有族裔文化特色的商贸活动和服务业，还包括相应于主流经济核心部分的商贸活动，各类知识密集型和高科技行业和制造业。第四，族裔成员以共同的族裔性和族裔文化价值观作为雇主与工人，业主与顾客，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日常关系和互动的社会基础，以共同的族裔性淡化阶级意识和内部冲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聚居区族裔经济需要一个特定的区域，即需要在一个地理空间和族裔人群集中、以及没有过多官僚机构掣肘的族裔社区才能形成。聚居区族裔经济在早期的发展中，尤其需要一个族裔集中的地域环境来承载，因为聚居区内的族裔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信息、信任和其它的社会资源）一般较其它区域更为丰富²。

在最初的概念中，聚居区经济包含了结构和文化两个层面。从结构的层面看，作为族裔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与主流经济的结构——核心经济与其劳动力市场和边缘经济与其劳动力市场——有异有同，它包含了经济活动和经营方式的多元化。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它酷似主流经济的核心行业和边缘经济行业的一些主要特征，既包括传统的小生意或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生产单位，又超越了传统小生意和家庭经营模式的限制。同时也包括一系列超越传统框框的多元化经济活动，如与核心经济相关的高科技专业产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可以看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组成部分与主流经济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有重叠之处。但它更多地会受到本族裔社区社会结构的制约。在一个特定的族裔聚居区内，经济活动受到族裔社区中各种族裔社团，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借贷和信用社以及同乡会和教会等的控制和协调。

从文化层面上看，聚居区族裔经济受两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族裔性的凝聚力（bounded solidarity）和被族裔性所强化的信任机制（enforceable trust）³。这两种文化因素是族裔社区赖以支持和制约的机制，即以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标准去认可和支持有益的经济活动或制裁越轨的经济行为。而同一族裔群体的成员，无论是雇主或工人、业主或顾客，他们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基于互利互惠的原则，超越了传统经济意义上的雇用契约的金钱关系。

总而言之，聚居区经济是族裔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聚居区”这个形容词不仅仅用于修饰或丰富“族裔经济”这个概念，而更重要的是突出聚居区族裔经济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这个概念对于我研究如唐人街那样的成熟的族裔社区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不同的族裔聚居区有着不同的经济潜力，这种潜力无论对于个体或是群体，都有可能为他们最终融入主流社会创造出多条可供选择的有效途径。

族裔聚居是国际移民社会适应的一种独特形式。我对唐人街的研究与以往相关研究的不同点在于对族裔聚居区的基本认识，我认为移民聚居区因族裔性的不同而不同，它不完全是新移民为了生存而暂栖的避难所，或者是移民过渡到主流社会的一个临时性的落脚点。无论如何，这绝不是陷阱。它与一般的贫民区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成为移民上向社会流动的“平台”。我研究唐人街，不但从族裔聚居区的角度来对族裔经济进行定量分析，检验现存的理论，还从族裔文化和移民本身的视角出发对此进行定性分析，构建新的社会学社区理论。在具体

¹ Alejandro Portes and Robert L. Bach, *The Latin Journey: Cuban and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Kenneth Wilson and Alejandro Portes, "Immigrant Enclaves: 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Experience of Cuban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1980): 295-319.

² Alejandro Portes and Robert D. Manning, "The Immigrant Enclave: Theory and Empirical Examples," pp. 47-68 in S. Olzak and J. Nagel, eds., *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1986).

³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Gaining the Upper Hand: Economic Mobility among Immigrant and Domestic Minor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5 (1992): 491-522.

的操作中，我围绕以下三个主题来探讨：一是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结构；二是聚居区族裔经济对族群成员社会适应的影响；三是居住隔离与空间融入的动因和结果。

三、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结构

纽约的唐人街位于曼哈顿区的下东城，是一个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沧桑的华人移民聚居区。二十世纪70年代以前，移民纽约的华人跟其他欧洲移民一样，大多数都先在唐人街落脚，然后逐渐地移居别处。早在二战结束后，华人就已经开始出现分散居住的迹象，特别是第二代的华裔年轻人纷纷搬出唐人街。以超越唐人街的散居模式为主导的居住模式，则是1970年以后才出现并日益显著的。但是，即使后来华人大批地从老唐人街迁出并开始迁入华人从前不曾涉足的其它城区，他们仍然倾向于在新社区里聚居。

十九世纪60年代，当大批华人劳工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西岸时，东岸的纽约华人人数很少。186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当时纽约市仅有120名华人居民，只占美国全部华人总数（63,199人）的0.2%。1882年《排华法》的通过和实施，迫使大批华工向东迁移。第一批东迁纽约的华人移民聚居于曼哈顿区下城东南区的三条老街——勿街（Mott），柏克街（Park）和多姚街（Doyer）¹。在19世纪80年代末，纽约市的华人人口开始成倍增加，并很快的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唐人街。相比之下，美国华人的总人口在同期却下降了16%。虽然纽约市的华人人口在20世纪初期曾一度减少，但随后数十年间却稳定增长。二次大战期间撤消《排华法》后，尤其在1965年通过移民法修正案以来，纽约市的华人人口开始急剧地增长。

美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全市华人人口从1960年的三万三千人激增至2010年的四百九十万，五十年中华裔人口翻了将近十五番。华人在唐人街核心区（以14个人口普查区划分）居住的人数，从1970年的不足三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七万多人。在这14个普查街区中，其中华人占多数的普查街区有七个，华人占25%至49%的街区有3个。人口普查统计通常低估华人的数量，因为不少非法移民不愿跟统计局合作而被忽略不计。根据统计数字推测，在唐人街及其周边居住的华人人数大约是官方人口统计数字的两倍左右。现在的老唐人街的街道两旁，依然伫立着一幢幢没有电梯的民房和改建的老式建筑。唐人街依然是以居住拥挤不堪而著称，90%以上的居民都租房住。这些房子大都非常破旧简陋。

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曼哈顿的老唐人街并没有经历过像“同化论”所预言的那种族裔社区逐渐衰落直至消失的现象。倒是邻近的小意大利区和犹太人区衰落了、消失了，被唐人街所吞并。唐人街不但没有缩小，反而由于大批华人新移民的进入而重获新生。新移民把生命力带进唐人街以及唐人街四围那些正在急剧衰败的街区。结果，唐人街的人口和地域范围成倍增长。据《纽约时报》1985年的新闻报道，过去属于犹太人聚居的曼哈顿下城东南区的一座犹太神学院的楼宇，现已成为华人的一座基督教教堂。在那里的一座空置的犹太教教堂现已成为华人的佛教庙宇。原来曾是一座犹太学校的校址，现已成为华人投资兴建的两幢住满了华人的公寓大楼。唐人街是纽约市市区内人口最密集的居民区，它四面扩展，发展到曼哈顿下城东南部的整个区域，包括曾一度完全属于犹太人和波多黎各人的聚居区。就连小意大利，现在也只不过是残存于两个街区范围内的遗迹而已，而且当中还穿插着不少属于华人的商业和公寓楼宇。过去，曾以堪奴街来划分唐人街与小意大利之间的边界。那时，唐人街的居民不敢跨越这条街界，就连过去那边散步都不敢。如今，这两个族裔社区已经没有明显的边界线了。华人不但随心所欲地跨街过巷，而且还到那边去设立商店，购买或租用楼宇和住宅。

¹ Bernard P. Wong, *A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Ethnicity and Survival Strategies* (Singapore: Chapman Enterprises, 1979).

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的涌入，对唐人街的住房和商用楼宇的需求量非常大。结果导致使整个族裔社区不断外扩，一直向北伸展至第14街。住房和商业用地的需求不断增长，大大刺激了唐人街华人房地产业的发展。华人的房地产公司和有钱人看好在那里的投资回报，开始在唐人街周围购买产业。虽然价格昂贵，但是房地产投资仍然非常强盛。因为人们预测到，由于需求量大，唐人街及其附近的房地产的租金不会比曼哈顿最抢手的黄金地带的租金低，因此房地产物业即使短期转手交易，也能赚一大笔钱¹。根据纽约市房地产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14个人口普查街区的范围内的唐人街中心地带，大部分商住用地和楼宇，产权都属于华人所拥有（其中商用的83%，住宅的90%）。在小意大利区以及周围的地区，曾经一度完全属于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所拥有，如今，在全部商住用地（602块地）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华人所拥有。1975年以后卖出的全部商住用地中，将近一半的买家是华人。

二次大战前，老唐人街大多数居民都是从中国南方传统侨乡来的广东人。近年来，又有大量越南华人搬到唐人街。他们大都能说流利的粤语，与广东人有很多共同的文化特征，他们大多是历史上从中国两广地区移民到越南。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不少讲闽南语的华人开始搬进在唐人街居住。这些闽南人多是非法移民，由于文化和方言不同，加上广东人对他们的刻板偏见，他们无法跟广东人混住一起，于是在曼哈顿大桥下的东百老汇大街的三个街区里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聚居区。现在唐人街的华人移民虽然来自不同地方和文化背景，但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新移民，教育程度很低，英语水平很差，靠打工维生，收入低微，生活清贫。很多华人移民之所以甘愿忍受蜗居在潮湿脏乱的小鸽笼公寓里，是因为他们期望日后能有机会能搬出唐人街。事实上，很多人都实现了这个愿望。唐人街作为一个族裔聚居区，确实为许多贫困和低技能的新移民提供了栖身之地。但是唐人街并没有沦为贫民区。虽然有大量弱势少数民族群体集中居住于此，但真正能搬离唐人街的大多是华人，而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移民也没有因为生活贫困而精神颓丧，自暴自弃。

唐人街不但经久不衰，而且充满活力，究其原因，应该归功于强大的聚居区族裔经济。对于很多华人移民来说，虽然唐人街居住和生活环境的不好，但是有得有失，他们可以在那里比较容易地找到住房和工作，获得各种基本的生活服务。随着新移民的不断到来，外资的不断涌入，华人的族裔经济在唐人街得以不断的发展。在《排华法》实施期间，华人的经济活动局限于餐饮业和洗衣业。在1950年代期间，中文工商黄页电话簿里列出了在唐人街中心区有300多家餐馆和茶餐厅，到80年代末增长至800多家，雇用了近两万名华人移民。这些餐馆不仅为当时单身汉社会的华人移民服务，也为游客提供异域风情的中餐饮食，华人的餐饮业至今还是华裔经济的两大支柱行业之一。华裔经济的另一支柱行业的洗衣业在1970年代后就被制衣业所取代。20世纪20年代，纽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华人从事洗衣业，而到了1970年代，洗衣业开始明显萎缩，大多数洗衣店关闭，从业人员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制衣业，1970年代末制衣业开始发展，在鼎盛时期光唐人街里就有500多家华人经营的制衣厂，雇佣了两万多名华人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女工。到了1990年代中期，制衣业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而波动起伏，很多制衣厂撤出了唐人街。但对于女性移民工人来说，制衣工依然是最适合她们的职业。据估算，唐人街约有五分之三的女性从事制衣业。与此同时，唐人街华裔经济的其它行业也蓬勃发展，除了传统的零售服务业如中药铺，杂货店、食品店，礼品店、珠宝店、发廊和美容院以外，还有专业性服务行业如银行、金融投资、信贷、保险、房地产公司、律师、会计事务所、旅行社、职业介绍所、中西医、牙医、眼科诊所，还有进出口贸易公司，物流公司和批发公司等等，应有尽有。

社会学家林建正（Jan Lin）用双轨模式来形象地描述交织在纽约这个后工业化的国际大都市之中的华人经济的发展。族裔经济的低端轨迹在下城区（downtown）即向唐人街方向清晰可见，

¹ Peter Kwong, *The New Chinatown* (New York: Hill & Wang, 1987).

这里主要由“血汗”工厂和陈旧简陋的低层楼房构成，以无福利保障，低薪水和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街边小贩、夫妻店以及贫民窟般的生活环境为特征。而族裔经济的高端轨迹朝着上城区（uptown）即与唐人街相反的方向发展，以资本密集型的金融业、跨国商贸以及以知识密集型的专业服务行业 and 现代旅游业为特征¹。对于解释族裔经济的发展，这个二元分析架构很有创意。但是对于解释族裔聚居区对移民社会适应的作用，这一分析架构尚存不足。我想再补充一点，唐人街的族裔经济是纽约大都市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唐人街与其它城市贫民区不同之处，在于它自身具有很强大并与大都市经济接轨的聚居区族裔经济。这一聚居区族裔经济中包括低端和高端两条轨道双向而不是单向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唐人街族裔经济的二元发展模式与主流经济的二元结构——核心与边缘部分——有类似之处，它既包含核心部分和高端轨道的特征，又包括边缘部分和低端轨道的特征。

对于唐人街的经济结构，我认为用“保护型”和“外向型”的二元经济特质来描述更为确切一些。保护型经济源自于唐人街或华人聚居社区的内部，带有强烈的族裔色彩和自给自足的性质。保护型经济中的行业，不仅包括劳动力密集型和传统的低端行业，如餐饮业、零售业和服务业，还包括知识密集型和专业性较强的高端餐饮业、零售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的主要经济元素——资金、劳动力和消费者，都掌握在华人手里，不仅华人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劳动力以及生产和服务对象都以华人为主。聚居区的消费市场迎合族裔成员的某些特殊需求，而这些需求往往因为消费者受本族裔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限制或偏好而难以在主流市场得到充分满足。由于华人移民人口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多元化，保护型经济中的行业不仅面向住在唐人街内的低收入华人，也面向住在郊外的高收入的中产阶级族裔成员，因而刺激了族裔保护型经济的发展。针对族裔特殊需求的经济活动，本身极具竞争力，一般不受主流经济波动的直接影响。原因是聚居区族裔经济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三位一体，由此形成一种保护机制。

保护型经济看似被限定在聚居区内，但实际上与其外向型经济并行发展，在资本运作和商业活动中不仅与主流经济接轨，而且还跨越国界与世界经济，尤其与祖籍国的经济接轨。外向型行业利用族裔资本和劳动力向主流消费市场发展，基本属于主流经济中边缘部分，既包括主流群体（欧裔白人）所不屑涉足或放弃了的产业和行业，如制衣业，也包括跨族裔的、对外的服务行业如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餐饮和礼品零售等等²。与保护型行业不同，外向型企业没有资金、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三位一体的族裔垄断优势，因此无法有效地控制生产、经营和销售等关键环节。此外，外向型企业的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和面向外族消费者的小商业极易受到外部经济气候的影响，与主流经济的边缘产业有相似之处。例如，1965年之前，唐人街的外向型企业以洗衣业为主。当时纽约市大约有近三千家华裔洗衣店，为非华裔客户服务。纺织业的科技进步和面料的革新以及洗衣机进入家庭，导致了洗衣业的衰败。随后不久，聚居区族裔经济又找到了制衣业这个利基市场，充分利用了当代移民社会经济背景多元化而带来的创业意识和充足的资金，以及大量的低技能和低薪水的移民劳工这些优势。另外，唐人街以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店为标志的旅游业，也是其外向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经济市道不佳，会直接影响外族人口对唐人街消费市场的需求。由于外向型企业必须要依赖于外部的消费市场，因此必须与其他的族裔群体竞争才能分得一杯羹。

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投入再生产的资金。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两大组成部分相互联系形成了一种内部消费和再生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保护型经济的产业使资金在聚居区内部流通，防止资源外流。尽管聚居区内部的竞争相当激烈，有大鱼吃小鱼的现象，也有企业倒闭关

1 Jan Lin, *Reconstructing Chinatown: Ethnic Enclave, Global Chan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2 Lin, *Reconstructing Chinatown*; Jan Lin, *The Power of Urban Ethnic Places: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mmunity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门，但总体上不会影响到族裔经济的发展。原因是聚居区内经济活动有相应的族裔社会组织，如同乡会和商会等的进行协调，按通行的做法，企业易主一般在都族裔网络之中进行，由同族的企业家来接手。举个例子，如果一家中餐馆经营不下去了，总会有另一个更有闯劲的华裔移民来接手，再碰运气。尽管唐人街不少餐馆频繁转手出让，但餐馆的数量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加，丝毫没有衰落的迹象。

另一方面，外向型企业产生的利润和收入创造了商家和企业家再投资的资本，也增加了族裔工人的收入和购买力，使经济资源从主流经济回流到聚居区族裔经济之中。聚居区的外向型企业中，也有工厂倒闭，生意失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聚居区企业家的失败。很多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往往利用外向型企业来积累资本和经验，作为企业发展的长远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当一定的条件和时机成熟后，便可能向保护型经济发展。

然而，由于聚居区族裔经济及其商家和企业家所面临的某些结构性的限制，导致族裔内部的激烈竞争，也存在偷税漏税，违章操作和对同族工人的残酷剥削等问题。其中在剥削同族工人的问题上尤其受到的外界的指责。我认为，这种指责未免过于简单化，有时还带着明显的种族偏见，甚至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因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这些问题并不是某一民族特有的，这些问题是主流经济中的边缘产业内在的普遍问题，而外界对主流经济的指责一般较少，也没有那么苛刻。针对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批评有可能会强化外界对族裔聚居区的负面刻板印象，忽视聚居区族裔经济为社会所带来的福利和对移民社会适应的正面影响。对于那些几乎不会说英文，受教育程度很低，缺乏工作技能和缺少创业资本的新移民来说，正是聚居区经济为他们提供了较为便利的生活条件，熟悉的文化氛围和较多的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为他们建构了一个上向社会流动的平台。

四、聚居区族裔经济对族群成员社会适应的影响

我研究唐人街的第二个主题是探究聚居区族裔经济对族群成员社会适应的影响。为什么某些族裔的移民群体比其他移民群体更倾向于建立和发展自己的聚居区族裔经济？为什么某些族群的成员比其他族群的成员更热衷于自己创业或做生意？族裔经济又如何影响新移民的社会适应呢？尽管理论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比较一致的意见集中在少数民族群体成员能否通过族裔经济的途径，最终达到上向社会流动的目标的问题上。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少数民族经济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现有的文献主要有几种解释。第一，少数民族成员通过族裔经济的途径，为自己创造自雇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以此作为对付可能被主流经济排斥或避开歧视的有效策略。莱特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由于美国在社会和经济上对亚裔的排斥，迫使许多华裔和日裔的移民在各自的族裔社区寻找出路，自己创业，发展族裔经济，结果很明显地降低了华裔和日裔这两个群体的平均失业率¹。迈阿密市的古巴裔聚居地和纽约的唐人街也有同样的发现。这就是说，族裔经济的发展对群体成员的就业机会会有直接的影响²。

第二，少数民族经济的作用犹如缓冲器，可缓冲外国移民与美国本地工人在主流劳动市场中的竞争而产生的矛盾。莱特（Light）和劳慈（Roach）的研究发现，大批移民涌入美国主流劳动力市场，他们并没有抢走美国人的饭碗，相反，他们大多自己创业或受雇于移民新创的企业，为美国的经济注入了不少新的工作机会³。我和波特斯在利用199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分析，

1 Ivan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2 Perez, Lisandro, "Immigrant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Family Organization: The Cuban Success Story Reexamin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 (1986): 4-20; Alejandro Portes, "The Social Origin of the Cuban Enclave Economic of Miami,"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30 (1987): 340-372; Min Zhou,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Ivan Light and Elizabeth Roach, "Self-Employment: Mobility Ladder or Economic Lifeboat," pp. 193-213 in Roger Waldinger and Mehdi Bozorgmehr, eds., *Ethnic Los Angel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探讨移民是否对国内少数民族如非洲裔的工人有负面影响。我们发现，在美国本土出生的非洲裔成年人失业率高与在外国出生的移民失业率低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移民就业的渠道，要么通过自我雇用，要么通过自己族群的族裔经济¹。

第三，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不仅为本族群成员树立起企业家的成功形象和模范榜样，还培养了企业精神，激励更多同族成员成为未来的企业家。在有关纽约市移民制衣工业的研究中，贝利（Bailey）和沃丁格（Waldinger）观察到，当衣厂工人被提升为监工时，他们就可以学到很多经营衣厂的方法。另外，很多小型族裔企业里老板和工人同一族裔，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超出雇用关系。老板利用非正式的学徒制培训工人，而工人则利用与老板特殊的族裔关系去学习和熟悉经营衣厂的各个环节，为将来自己跳出来当老板做准备²。

第四，也是最具争论性的一点，自我雇用的企业家与受他人雇佣的工人在平均收入方面有明显优势。一般说来，自我雇用的企业家比薪金工人的平均收入要高。许多社会学研究家也发现一个自我雇用率较高的族裔群体，它内部两代间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加，子女辈在教育和职业的成就方面均超过父母辈³。一些经济学研究也发现，一个族裔群体的自我雇用率越高，这个族裔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就越高⁴。可是经济学家波哈思（Borjas）和贝茨（Bates）则认为，自我雇用的企业家常常自己剥削自己的劳动，因此他们的平均收入根本不比薪金工人高⁵。

聚居区族裔经济能否给族裔成带来收入方面的优势，这个问题引起极大的争议。波特斯（Portes）和巴赫（Bach）首先提出，在聚居区族裔经济里就业的移民工人，与在主流经济的加工制造业工作的移民工人相比更有收入的优势。具体地说，移民工人的教育水平和其它重要的人力资本指标、如英语程度和工作经验等，在聚居区族裔经济里能得到较高的工薪收益⁶。但是，他们这一研究结果受到质疑。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聚居区族裔经济集中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低收入的小企业，人力资本自然会贬值，因此在那里就业的工人的工薪收益不可能比在主流经济就业的多⁷。罗根（Logan）等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资料，对纽约和洛杉矶大都会区的聚居区族裔经济和主流经济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他们用几个不同的模式去验证，得出的结果是，自我雇用者比受雇者的工作时间相对更长，平均小时工资相对更低。而聚居区族裔经济里的自我雇用者的经

1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Ninet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mmigrants and African Americans," pp. 143-171 in Frank D. Bean and Stephanie Bell-Rose, eds., *Immigration and Opportunity: Race, Ethnicity, and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2 Thomas Bailey and Roger Waldinger, "Primary, Secondary, and Enclave Labor Markets: A Training System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1991): 432-445; Roger Waldinger, "Immigrant Enterprise in the New York Garment Industry," *Social Problems* 32 (1984): 60-71.

3 Calvin Goldscheider, "Self-Employment and Jewish Continuity," Alejandro Portes and Robert Bach, *The Latin Journey*; Alejandro Portes and Leif Jensen, "What's an Ethnic Enclave? The Case for Conceptual Clar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987): 768-771;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Gaining the Upper Hand,"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Nineties," Roger Waldinger, *Still the Promised City? African-American and New Immigrants in Postindustrial New Yor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Robert W. Fairlie and Bruce D. Meyer, "Ethnic and Racial Self-Employment Differences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1 (1996): 757-793.

5 George J. Borjas, *Friends or Strangers: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the U.S. Economy* (Basic Books, 1990); Timothy Bates, *Race, Self-Employment, and Upward Mobility: An Illusive American Dream*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7).

6 Portes and Bach, *The Latin Journey*.

7 John R. Logan, Richard Alba, and Brian J. Stults, "Enclave and Entrepreneurs: Assessing the Payoff for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 (2003): 344-73; Jimmy Sanders and Victor Nee, "Limits of Ethnic Solidarity in the Enclave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987): 745-773; Tarry Hum, "The Promises and Dilemmas of Immigrant Ethnic Economies," pp. 77-101 in Marta Lopez-Garza and David R. Diaz, eds., *Asian and Latino Immigrants in a Restructuring Economy: The Metamorphosi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济效益则比在主流经济里的要更为不利¹。

我认为,这些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数据方面的局限而影响了测量聚居区族裔经济这个概念的准确度。另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本身对族裔经济和聚居区族裔经济这两个不同概念理解不深或混为一谈。我的观点是,如果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量化方面的技术细节上,可能会影响从全局着眼来理解,导致出现学术盲点,不能全面地理解族裔经济和族裔企业家的真正含义及其社会学的意义。少数民族经济最重要的社会学的意义是它为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成员提供了避免失业的机会。它不仅为自我雇用者也为族群内外的其他工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保证了他们有稳定的家庭经济来源,也使族群成员自食其力,享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为族裔群体的个人乃至整个群体的上向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²。

聚居区族裔经济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在现存的实证研究中大多聚焦于比较参与聚居区族裔经济和参与主流经济的结果的差异。在具体操作上,用直线回归模型去测量在两种不同经济里工作的族裔成员的人力资本(教育水平、职业、工作技能和经验)的回报,探究以个人收入为回报指标的结果是否有差异及其原因。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争论颇多。波特斯和键森(Leif Jensen)根据对迈阿密古巴裔男性移民的问卷调查和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发现,相对于在主流经济就业的男性移民,在聚居区族裔经济就业的移民自己创业和经商的机率更大。相对于那些在主流经济的边缘劳动力市场里就业的男性移民,在聚居区族裔经济就业的移民所从事的职业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更为契合,收入也与他们的职业地位更为相符,因而证实了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理论³。但是这些研究结果受到了桑德斯(Jimmy Sanders)和倪志伟(Victor Nee)的质疑,他们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用相似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了迈阿密男性古巴裔移民和旧金山男性华人移民的状况,发现只有在聚居区族裔经济里的自雇者才获得较为显著的人力资本回报,而雇员则得不到相应的回报⁴。

如果只有自雇者才得益于聚居区族裔经济并从中获得与教育和工作经验对等的人力资本回报,那么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就难以自圆其说。面对质疑,波特斯和键森的反应是首先肯定了桑德斯和倪志伟用以比较聚居区族裔经济和主流经济中的收入差异以及比较雇主和雇员的收入差异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继而指出他们的错误在于曲解了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概念。波特斯一派的学者认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族裔企业相对集中于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即族裔聚居区内,族裔企业既雇用住在聚居区内的同族工人,也雇用住在聚居区外的同族工人。如果按照劳动力的居住地(place of residence)的概念来定义是否涉足聚居区族裔经济,就会失去其本意。居住地的定义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没有把住在聚居区外的同族裔的中产阶级人群包括进去,这一群人搬离了或从没涉足过自己的族裔聚居区,但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继续依赖聚居区族裔经济创业或就业。而低层和较为贫困的阶层却仍然集中住在城市中的族裔聚居区内。以居住地来衡量一个人是参与族裔经济还是主流经济,势必导致数据偏差(参与族裔经济的中层人士的比例会比实际的少很多),因而造成不同的分析结果。由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局限性,波特斯等学者又提出

1 Logan et al., "Enclave and Entrepreneurs."

2 Robert L. Boyd, "Black and Asian Self-Employment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37 (1990): 258-274; John Butler, *Entrepreneurship and Self-Help among Black Americans: A Reconsideration of Race and Econom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Ivan Light, George Sabagh, Mehdi Bozorgmehr, and Claudia Der-Martirosian, "Beyond the Ethnic Enclave Economy,"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Gaining the Upper Hand," Booker T. Washington, *The Negro in Business* (New York: AMS Press, 1971).

3 Alejandro Portes and Leif Jensen, "What's an Ethnic Enclave? The Case for Conceptual Clar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987): 768-771.

4 Jimmy M. Sanders and Victor Nee, "Limits of Ethnic Solidarity in the Enclave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987): 745-767.

了以劳动力的工作地（place of work）的概念来定义是否涉足聚居区族裔经济，分析结果验证了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理论¹。

我认为无论是按工作地还是按居住地来定义聚居区族裔经济，都有一个共同缺陷，两者虽都与地理范围相关，但却都不能够较为准确的测量族裔企业的所有权和企业工人的种族构成这两个重要因素，因为人口普查数据没有详细的信息来帮助区分以工作地或居住地定义的族裔经济里所实际包含的非族裔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就会低估了聚居区族裔经济和主流经济的真正差别，高估了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真正规模。为了找出问题的症结，我也参加了这场争论，也采用同样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除了用从居住地和工作地这两个指标来定义聚居区族裔经济，我还加了第三个指标：族裔集中的职业（industrial sector）。我所感兴趣的是用不同的统计指标来测量聚居区族裔经济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回报问题，通过不同角度的分析来验证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理论²。

我用居住地作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定义来对男性移民的收入回报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在聚居区族裔经济以内还是以外的劳动力来说，人力资本都有显著的正向的回报。但出乎意料的是，大学教育程度对在主流经济的自雇者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聚居族裔经济的自雇者却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与古典同化论的预测相反，英语语言能力和美国国籍对于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从业雇员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主流经济的从业雇员却没有显著的影响。

如果用工作地作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定义来对男性移民的收入回报进行分析，我的结果显示，大学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对在族裔经济的雇员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英语水平却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在主流经济从业的移民男性雇员，大学教育程度对其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英语语言能力和工作经验却没有显著的影响。此外，如果用职业的种族构成来定义聚居区族裔经济时，教育程度和英语语言能力对于在聚居区族裔经济的雇员的收入会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工作经验却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对于主流经济的雇员，大学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和英语语言能力都对收入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总的来说，以纽约华人移民为例，人力资本的三个主要变量（教育，经验和英语能力）以及美国国籍等变量，不仅可以预测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男性雇员的收入，也可以预测聚居区内男性雇主的收入，因此进一步验证了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理论。

然而，聚居区族裔经济对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如何呢？在族裔经济的现存文献里对于女性移民的研究犹如凤毛麟角，极少提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男性劳动力是就业市场的主体，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男性。而后来的研究仍然聚焦与男性，则是为了保持前后研究的可比性。实际上，这是很没道理的。女性的就业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不断上升，她们无论是在主流经济还是聚居区族裔经济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女性移民占了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一半，顶了“半边天”。因此，正如我们对男性移民的研究起点一样，很有必要研究聚居区族裔经济对女性移民的影响。于是我采用了同样的有关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三个定义和同样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女性移民雇员。结果发现，无论如何定义聚居区族裔经济，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英语水平和美国国籍等主要变量都没有对女工的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要肯定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积极功能，就有必要对这个结果进行更深入和更仔细的分析解读。在现实中很可能有这样的现象，由于妇女顶了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半边天，族裔经济对男性移民所带来的正向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女性移民的付出作为代价的。要合理地解释这种现象，以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分析也许不太适用，可能要从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结构以及族裔与主流经济的关系上对女性劳动力作一定性分析，例如，女性在哪些具体行业中就业？这些行业对劳工素质的要求如何，是否有男女隔离的现象，是否有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其次，也可能要从移民的族裔文化价值观和动机

¹ Portes and Jensen, "The Enclave and the Entrants: Patterns of Ethnic Enterprise in Miami before and after Mari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1989): 929-949

² Zhou, *Chinatown*.

等方面来深入探讨引起性别差异的原因。

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参与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女性劳工明显地受到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和不同程度的剥削。但是,很多女性移民,本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她们的配偶又大多是低薪工人,光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几乎不可能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女性通常会以家为重,把家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利益和个人的职业发展放在第二位,养家糊口比个人发展更为紧迫和重要。研究唐人街的女性移民时,我作了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较为刻意地站在她们的立场上来考虑她们的就业状况。尽管女性移民在结构和文化上处于不利地位,但我认为,她们不是被动的和等待救助的受害者和弱者,而是积极的、主动掌握自己命运的强者。在唐人街里,妇女是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源。但在族裔经济的劳动力市场中,她们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男性移民不同。因此,以男性为中心的现有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架构,不适合分析她们的工作经历,解答她们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从文化族裔学的角度出发,把女性放在她们的家庭中来考察。女性移民参与唐人街族裔的经济,不仅是在新移民适应时期为了维持家庭基本生存的问题所作的权宜之计,而且是为了帮助家庭成员最终共同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整体性的长远策略。唐人街的女大多在制衣行业里当车衣工,从业前对这类工作的性质和待遇都很清楚,她们知道车衣工人薪水低,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且无福利待遇。这样的工作当然很不理想,但大部分的女性移民进入了这个行业,为的是最终能让整个家庭脱离贫困。但许多劳动过程的细节是定量的统计资料所不能反映出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只能从一个方面来反映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本质,但不能全面反映出雇主和雇员的族裔特性以及企业中种族构成的详细信息,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些移民明明知道族裔经济比不上主流经济,也拼命地往里钻。在这里,定性的田野调查则可以弥补定量研究的局限。

我在纽约唐人街的田野调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作用。第一,唐人街创业的机会和可能性较大。在唐人街,华人移民的美国梦包含三个梦想,其中之一就是自己当老板(另外两个梦想是拥有自己的房产和子女能上名校读书)。对很多华人移民来说,当老板即有名又有钱,社会地位比打工族更高,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还可以把握自己的前途。随着华人经济的发展,在唐人街里的那种创业精神也日渐增强,形成一种文化,大家都觉得有朝一日自己做生意当老板是很有可能的事。一位在唐人街开店的梁先生说:

“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唐人街有越来越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提供了很多创业的机会。很多唐人街的工人都很卖力地打工,想攒钱当老板,因为他们看到有很多的机会。否则的话他们就没有动力工作了。我店里有好几个雇员都先后辞职,离开后自己开店了,做类似的生意,他们在我这打工时偷我的师,现在成了我的竞争对手。我倒不在乎,生意就是会有竞争的嘛。”

第二,当控制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移民年限,唐人街族裔经济的男性移民的人力资本回报并不亚于主流经济的回报。先前的研究假设认为在聚居区内的向上社会流动不需要教育水平是错误的。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族裔经济大多是低工资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而唐人街经济的发展,其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出从前。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学历很低,也很难在唐人街族裔经济的高端层面上找到好的就业机会,也很难获得满意的成果。赵先生大专毕业后在唐人街开了一家制衣厂,他切身感到良好的教育在企业经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现在唐人街的制衣业竞争非常激烈,如果你不懂行,英语不好,教育程度不高,那你成功的机会就很小。我读了三年大专,我太太也拿了个服装设计的大专文凭。在我们创业和经营企业时,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认为如果有了良好的教育,你的经营计划就会做得较好,管理水平就会更高,对生意的前景和发展就会更有眼光。良好的教育还可以使你降低经营成本,更会谈判讲价,更加灵活机动。总之,如果你的头脑不够灵活,你的企业就很难在竞争

中生存。我相信在生意场上，有经验和高教育才能有成功的机会。”

第三，唐人街族裔经济不仅为族裔成员提供就业和创业的机会，还提供很多无形的好处。例如，熟悉的语言文化环境，找工作较为容易，没有种族歧视的困扰，老板是同种同文的人，工资虽低，但可以用母语与老板沟通，还可以通过加班来多赚一点钱，工作时间也比较灵活，有自己创业的可能和机会等等。总的来说，聚居区族裔经济中的同族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他们相互依存，于双方有利。这种关系不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简单化地解释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有其共同的族裔性去维系并且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对族裔企业的雇主来说，他们生意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比较好雇到大批为了能实现美国梦而奋发努力、宁愿忍受低工资、低待遇的同族工人。经营小生意和小企业，只有降低工资成本，才能保持雇主的市场竞争力。对族裔企业的雇员来说，由于教育水平、英语能力和工作经验，甚至移民或公民身份等重要社会经济特征的缺陷，他们即便在主流经济找到工作，也大多是低薪和条件待遇差的工作，而还没法跟非华裔的老板沟通和争权利，所以这类工人还是选择在唐人街里打工。

对于女性移民来说，她们集中在唐人街的制衣业和其它一些低端的企业和服务业，除了跟她们自身的教育程度、英文水平进入工作经验等因素有关之外，还与她们传统角色有关。其一是，移民妇女不像白人中产阶级的妇女可以呆在家里相夫教子。她们的丈夫大多是低收入的工人，丈夫的一份工资不足以养家，所以妇女也要出来工作挣钱养家。对于这些低学历、低技能、不懂英语又需要工作的妇女，制衣厂的工作是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制衣厂不计较她们的学历、工作经验和英文程度，都可以给她们安排全日制的或半日制的工作。虽然大部分妇女在移民前并没有操作过缝纫机，但是她们边干边学，因为这些操作技术简单，要求不高。经过短时间的熟悉过程，许多人都能成为有经验的缝纫机操作工人。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全职工作的妇女仍然对家务劳动负有全盘责任，所以在职的妻子或母亲往往在选择工作时，选取能让她们有时间照顾家务和子女的那些工作。餐饮业要求严格的上班时间，特别是要上夜班，因此，不适合于妇女。制衣工作则不需要固定的上下班时间，许多华人制衣承包商还为工人们提供弹性工作时间和弹性工作地点，以此作为对低工资的一种补偿方式。工人们可以在上班时间请假去接送上学的孩子或哺育婴儿。她们甚至可以跟老板协商，让她们把婴儿和小孩带到车间里。总而言之，在个人条件和工种相等的前提下，在华裔的企业里和在主流经济的企业里打工会有很大的区别。低工资对所有的工人来说可能都不是好事，但对在聚居区内工作的人来说，她们的劳动报偿不仅限于每周收到的薪水支票，还包括上述提到的其它好处。从女性移民的切身利益去看，唐人街的族裔经济是她们的唯一的就业机会。正如车衣工人陈太太在受访时指出的：“如果唐人街没有制衣厂，我只好返回‘唐山’（中国）了。”移民妇女之所以愿意接受较次的工作条件和低微的薪水，不是因为她们不了解劳工法和政府法定的最低工资，而是因为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本身的局限性。对于这些移民妇女，得到一份工作与得到合理的工资是两回事。为了多挣钱，补贴自家和娘家的经济，她们把得到一份工作看得比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更重。妇女去干低薪工作表面看来好像是心甘情愿，实际上却是迫不得已，因为她们挣的不是可有可无的私己钱，而是必不可少的养家钱。正是因为妇女的这种以家庭利益为重的精神和努力，使得许多华人移民家庭提早实现美国梦。

我研究纽约唐人街女性移民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她们后来的状况如何，我知之甚少。2007年春我到纽约出差时，在地铁里偶然遇到我当年在唐人街衣厂访问过的一位的女工，还到另一位女工的家串了门，写下了如下记录：

“2007年4月，我到纽约开会，下榻曼哈顿的中城区的一家酒店。那天是星期天，我抽空坐地铁到布鲁克林区去拜访我的一个亲戚。上世纪80年代中，我在纽约作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那个亲戚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在唐人街制衣业当老板和打工的老乡作访谈对象。在地铁上，我碰到了住在我亲戚家附近的张太。张太已快60岁了，拄着拐杖走路。她告诉我，因为

长年在缝纫机前工作，她的腰背和膝盖都受到了严重劳损。她现在还在继续车衣，不过已经开始考虑退休了。她的两个女儿都已大学毕业，在纽约市的白领职场上工作，她家的房贷也已经还清了，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在张太的帮助下，我还去拜访了住在同一街区的赵太。赵太的房贷也已经还清了。赵太还告诉我，她每年秋天都要到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各地去旅游。想当年她们年轻的时候，整天没日没夜地在车衣，度假旅游这个话题从来都没有提过。在这些勤劳、自豪，脚踏实地、勇于实现梦想的华人女工面前，我真真自愧不如。”

五、居住隔离与空间融入的动因和结果

我的唐人街研究的第三个主题是移民居住模式的变动和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居住模式同化论（residential assimilation）提出质疑。经典同化论的立论依据是：（1）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聚居和隔离是一种暂时现象，他们的最终归宿是丢弃族裔特性（ethnicity）和文化，直至完全同化于主流社会。（2）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在于文化和结构方面的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包括：语言、宗教、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结构方面的原因包括：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和社会地位等。（3）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主流文化的熏陶，与主流（白人）族群的接触和交往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少数民族移民群体最终会融入白人族群。即使肤色不同，但主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指标将会基本达到一致。居住隔离状况是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指标之一¹，同化与居住隔离有着直接的反向关系，即同化程度越高，居住隔离程度就越低。居住隔离程度是相对于白人族群而言的。例如，移民最初聚居，自我隔离于族裔聚居区，是不得已的一种权宜之计，也是一种为适应新环境而采取的有效对策，以便使族裔群体成员在同化过程的早期得以生存，克服自己的不利条件及种种外界的约束。因此，种族的居住隔离（尤其是与欧裔白人族群的隔离）只是暂时的，当群体成员改善了自己在社会经济地位，吸收了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之后，就会搬离族裔聚居区，融入到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或都市社区里，与白人族群的种族距离就会缩小。

同化论是根据对欧洲裔移民群体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西欧的北爱尔兰移民，南欧的意大利移民以及东欧的犹太人，他们抵美时因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的不同而被白人社会视为“异类”或“另类”，倍受歧视和排斥。如今经过两三代人之后，却都同化成了清一色的“白人”。在同化论一派的学者看来，欧洲裔移民群体的同化，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²。可是，把同化论应用于当代亚裔和拉美裔的移民群体，或是在美国土生的非洲裔群体身上，却显得不适合。道格拉斯·马塞（Douglas Massey）和南茜·丹顿（Nancy Denton）在1995年的合著出版的《美式种族隔离制度》一书中，以大量的实证数据和定量分析挑战同化论³。他们发现，并不是每个少数民族族体的成员都可以向社会主流的白人族群同化的，不同族群之间的同化程度不同的原因也有很大差异。一些研究新移民社会适应的结果也显示，移民上向社会流动的成功与否因族群而异，不同族群所走的路径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异，并不一定沿着同化论所预测的单一的和单向的模式行进。例如，当族裔聚居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区内部也可能产生推动移民上向社会流动的动因，族裔成员也可以在自己的族裔社区内努力奋斗而取得成功。也就是说，他们的成功不一定要以摒弃族裔特性、文化和社区为前提。

此外，由于全球化和国际移民的多元化，中产阶级的新移民聚居郊区（ethnoburb）的形成和

¹ Stanley Lieberson, *A Piece of the Pi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² Richard D. Alba, *Italian Americans: Into the Twilight of Ethnic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5); Herbert Gans,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 America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³ Douglas 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 "Trends in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Blacks, Hispanics, and Asians 1970-198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987): 802-825; Massey and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族裔聚居区移民的迁出，并不完全是移民本身经济身份地位提高，受主流文化影响和族裔之间互动的结果¹。我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对纽约华人居住的迁移，尤其是居住再隔离状况的动因进行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华人新移民的居住模式是由几个独特因素的合力影响所致：一是当代的中国国际移民的独特性，包括家庭式移民，新移民人口的激增，族裔文化纽带和情缘关系，二是华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族裔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当代华人国际移民模式跟早年大不一样。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家庭式移民。新移民的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对房屋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唐人街地少人多，住房拥挤，与四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少刚到唐人街的新移民对居住环境的差劲常常感到震惊。例如，有一位移民来美国与女儿团聚的中年妇女回想起她刚到唐人街女儿的住所时的情景说：

“我真没想到我女儿一家会挤在这样的房子里。我女儿马上就要生第一个小孩了，她和老公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我到纽约时，我女儿还要在那个房间里腾出地方给我住。他们弄来了一张双层大床，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怀孕的女儿和她老公睡在上铺，我睡下铺，小孙子出生后，我便和他一起睡在下铺。比起我在出国前住的三房一厅，这里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大量的移民涌入唐人街，使之不断地向外扩张发展。但老唐人街在曼哈顿的黄金地带，虽然族裔房地产靠着大量的外来资金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大多是商业和高级公寓楼，中下阶层的新移民无法承受。于是在地铁可到达的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号称“卫星唐人街”的新华人社区。其中有两个非常出名的新唐人街，分别是皇后区的法拉盛和布鲁克林区的日落公园，华人又称它为八大道，取其“发”财兴旺之意。

法拉盛位于皇后区北部，被一度称为卫星唐人街、第二唐人街或小台北。原来是中等收入的美国白人的社区。那里原有的居民主要是犹太裔、爱尔兰裔、德裔和意大利裔。1960年，那里97%的人口是白人。在70年代以前，由于种族歧视，有色人种很难搬进来居住。五十年代时期，在法拉盛比较富裕的街区曾经发生过阻止华人搬进该社区居住的事件。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法拉盛开始改头换面，新唐人街开始呈现雏形。跟老唐人街不一样，这里的新唐人街住有多个不同的族群。九十年代时，那里的白人只占社区总人口的24%，而亚裔占41%。在亚裔人口中，华裔占41%，韩裔占38%，印度裔占15%。与住在曼哈顿下东区老唐人街的居民相比，法拉盛的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教育和工作成就更高，平均家庭收入更高，贫困人口的比例较低。与全美的华人国际移民趋势相似，法拉盛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三个地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与其它地区的华人移民相比，台湾移民的教育水平明显较高，大多从事专业工作。台湾移民最早搬进法拉盛，他们很难也不愿意入住老唐人街，主要因为语言、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的差异，那里以广东人和广东文化为主。况且，台湾人有充足的教育和经济资源，能够建立自己的族裔聚居区，既远离唐人街，又可以通过便利的地铁和公共交通来往唐人街。随着台湾移民搬进法拉盛区，其他大陆华人也接踵而来。

布鲁克林区的日落公园也是在1980年代开始成型的，被称为第二唐人街，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八大道，原来是中下层的白人工人阶级社区。街道两边是早期欧裔移民居住的两层楼房和红砖平房。这里地理位置很好，有几条地铁线到老唐人街，坐地铁只需要半个小时。上世纪60年代时，这些早期的欧洲移民和他们后代逐步搬到郊区，留下了很多空的住宅和店面。随着白人居民逐渐搬离这个社区，少数民族和新移民开始进入这个社区，先是多米尼加人、波多黎各人，然后是阿拉伯人和华人。和法拉盛一样，日落公园也是一个新兴的多族裔的移民社区，但是这里的族裔构

¹ 族裔聚居郊区是地理学家李唯提出的概念，详见：Wei Li,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an Urban Ethnic Community from Chinatown to Chinese Ethnoburb in Los Angeles*. Ph.D Dissertation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7).

成与前者不大相同。1990年时，这个地区的人口种族构成是：三分之一是白人，4%是黑人，51%是拉美裔人，亚裔占10%，而亚裔人群当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华人。二十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华人数量增长了320%，而白人的数量下降了26%。

与法拉盛的唐人街不同，日落公园更像是老唐人街的缩影和延伸。日落公园离唐人街很近，为移民提供了廉价的住房和方便。那里居住着刚来美国的新移民，也有一部分从唐人街搬出来的移民，他们大多数都是收入中下等的劳工阶层。从老唐人街搬来这里的移民中，有一部分是因为经济收入提高了，还有一些是因为老唐人街太拥挤，也有一些害怕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子女被拉入街头帮派。因为周围邻居都是普通劳工，那些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不愿意住在日落公园，但他们会考虑买房子来出租。对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不太高的移民来说，他们在日落公园买的房子，有一部分要分租给别人，通常的租客是同族裔的家庭，这样才能付得起高昂的房贷。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妇女的一家几年后就搬出了唐人街，在布鲁克林区的日落公园买了房子，并把房子的一部分出租给另一家新移民。很多移民都像她一样，从唐人街租房然后到城里的其他中下阶层的街区买房，买了房后以租养房。租户大多是同族的新移民。这说明一种新的华人移民聚居模式：搬出老唐人街，又搬进了新唐人街，与跟传统的居住同化模式有根本的区别。

华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是造成纽约华人特殊的居住模式的另一个原因。一个族裔聚居区的形成，人口数量是关键的因素。但聚居区的社区建设需要有坚实的族裔经济基础。许多在城里和郊区的新华人移民聚居区，如纽约的法拉盛和洛杉矶的蒙特利亚公园等，最初都是由台湾移民创立的。台湾移民大多拥有雄厚的人力和金融资本以及其它资源。他们教育程度高，有与现代经济相吻合的文化素养，技术专长，工作和管理经验，还有较为丰富的资金，能在短时间内扎根于当地社会，并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中发展华人的族裔经济，由此吸引更多的同族移民，建成新型的移民聚居区。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兴起的第二唐人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拉盛在20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人口和经济都严重衰退的社区。根据法拉盛发展公司的报告，在20世纪80年代，法拉盛的房价突然猛涨了一倍，商铺空置率也在70年代末的7%降至80年代的1%，社区的中心商业区迅速向四面扩展，新的写字楼拔地而起，新的零售商店及其他商业在社区的中心重新恢复了生机。经济复苏主要归功于来自台湾的资金和移民。台湾移民和跨国台湾企业投资的银行，房贷信用社，房地产公司和一系列的专业服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社区商业中心的地铁站周围，沿着商业主街明街（Main Street）和附近的街道，中餐馆、菜市场、中药房和快餐店等各种中式店铺，林林总总，鳞次栉比，俨然一派欣欣向荣的唐人街的景象。法拉盛很快地发展成为以华裔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型的商业中心。华裔经济的发展也使这个社区成为新华人移民的聚居区，这意味着新移民不必首先落脚曼哈顿的老唐人街，然后再往外搬，住在唐人街外的华人也不必非得上老唐人街去吃中餐，购物或参加华人文化和社会活动不可。不过，法拉盛和老唐人街之间还有很多联系。很多住在法拉盛的华人移民依然会到老唐人街去工作、购物和参与文化活动。

纽约的另一个新唐人街，布鲁克林区的日落公园的兴起也是由于族裔经济的发展。1970年代的日落公园跟当时的法拉盛社区一样，是正在衰落的社区。也是借助于华人移民的房地产业和商业的兴旺而逐渐恢复活力，华人移民利用外资和家庭的积蓄投资房地产，买房置业，并发展商业和服务业。华裔资源的引入，使越来越多的华人新移民甚至不太富裕的移民家庭搬到了日落公园，他们有些买屋，有些租房。买房者一般也会出租部分房间，以租养房。这样便不断地吸引了更多从老唐人街移出或刚到的新移民。大多数住在日落公园的华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或是香港的广东人。还有部分是从福州来的无合法居留身份的移民，他们大都租住在华人房主的地下室。

随着大量华人涌入日落公园，华裔经济也沿着第八大道与39街和65街之间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早的华裔商业可以追溯到1986年香港移民曾新梅在第八大道上开的凤凰超市。从那以后，华裔商铺和企业和服务性行业如餐馆、杂货店、美容院、中药店、诊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

等等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除此之外，制衣厂也开得越来越多。到了90年代初，这里以及有大约三百多家商铺和二百五十多家制衣厂。虽然日落公园唐人街的经济的发展比不上法拉盛，族裔社区组织的基础也不如老唐人街那样牢固，但日落公园还是能满足新移民在工作、住房和养育后代等方面的迫切需要。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纽约华人的居住模式所做的定性研究时，发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结果：第一，随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职业和收入等水平）的提高，英语能力的增强，移民时间的较长和家庭境况的改变（结婚和生小孩），华人移民更倾向于搬出唐人街，搬到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社区去。这一结果表明，居住模式与社会经济地位息息相关，与古典同化论所预测的结果一致。第二，在唐人街以外的华人移民的居住模式虽然呈分散状，但是移出纽约市，搬到郊区与白人为邻的不多，而更多的是迁移到城里原来是以白人为主、后来演变成以有色人种为主的社区。这样一来，即便离开了唐人街，住在其它市区的华人所遭遇的居住隔离程度依然很高，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依然较低，对唐人街和族裔经济的依赖性依然很强。这些结果跟古典同化论所预测的相反，居住分散以后不但没有融入白人中产阶级社区，反而又形成新的族裔聚居区，使族裔居住隔离程度居高不下。

事实证明，古典同化论未必适用于解释和预测纽约市华人移民的居住模式，社会经济指标也不一定是一个可靠的测量指标。我从对华人移民的田野访谈中发现，对大多数移民来说，买房置业，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纽约市外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买房并不是他们最理想的选择。他们的首选是在市内其它社区，如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买房子。这个选择不仅受社会经济地位、英语水平高低以及移民时间长短的影响，还受族裔因素的影响。古典同化论忽略了受族裔性限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因素。首先，对于新移民来说，在何处定居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是是否靠近亲戚朋友，是否容易找到工作，是否方便日常生活和上下班。除此以外，针对华人移民大多不愿意在不熟悉的房地产市场中找房子，华裔房地产商通常会为他们在唐人街以外一些华人比较集中的社区提供买房和租房的信息。由于有同族裔的房地产市场为依托，加上很多已经买了房的华人在自住的房子里出租房间，社会经济条件不佳的华人新移民无需像其他族裔的新移民那样，不得不蜗居在城里的贫民区中，而可以入住较好的中等收入社区，成为同族屋主的租户。其次，对于新移民来说，以老唐人街为中心的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也对他们的居住地选择有很大影响。无论居住在哪个城区，他们都得考虑上下班交通是否便利。现在华裔经济已经从曼哈顿的老唐人街辐射到华人较为集中的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通过纽约市的地铁和公共交通连成一片。新移民无论是住在曼哈顿，还是住在城里的其他社区和近郊，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不得不在聚居区族裔经济企业里工作。

我对纽约华人移民居住模式动态的研究结果，应该可以用于预测未来少数民族移民居住模式的演变过程。我认为，华人移民社会的居住隔离与再隔离现象大多是基于华人自己的选择，未必会带来不利影响。华人移民聚居区族裔经济和华裔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为华人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独特的居住同化模式，这种模式产生的结果与本土少数族群的非自愿的种族隔离结果不同，与古典同化论的直线型同化模式也截然不同。当然，我通过实证分析和田野考察得出的这一结论，目前还不是定论。我对纽约以及美国其它城市的华人移民居住模式的研究仍处于探索之中，还需要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评估华人的居住流动模式的动因与结果，解释不同族裔群体之间不同的居住隔离的结果。

六、结论

纽约唐人街是全美最具特色的族裔聚居区之一，以其独特鲜明的族裔社会文化和经济特色，

赢得了华人移民的认同。这一社区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因为新移民源源不断的迁入，更重要的是它为移民在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逐渐适应、并最终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通过三个不同的侧面：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结构；族裔经济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移民的居住模式，运用不同的提问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唐人街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对纽约大都市的华人社区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和访谈调研，并对美国人口普查的有关资料和大量数据做了详尽的定量分析，从而提出了与主流学派全然不同的新观点。我发现，华人移民善于利用本族裔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寻找和自创机会与出路。唐人街很自然地成为华人移民集体奋斗的一个重要基地。由此而形成的聚居区族裔经济，为不少新老移民创造了在美国立足的基本条件以及就业和生存的机会。我还发现，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大大地促进和巩固了社区的社会组织结构，增强和丰富了社区的力量，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为族裔成员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我的结论是：唐人街充满生机和内在的活力。它具有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以适应新形势和人口多元化的要求，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其主要的功能在于为华人移民，特别是那些不懂英文和劳动技能低的新移民提供了主流社会所无法提供的生存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也使华人移民得以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避免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出现邯郸学步的困境。从而为他们在美国安居乐业，并最终融入主流社会提供了一条代价较小且切实可行的途径。

然而，肯定聚居区族裔经济为移民的社会向上流动提供有利的选择，并不意味着要忽略族裔成员、尤其是低技能新移民劳工在唐人街内外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较大这个事实。在聚居区族裔经济所提供的很多工作岗位都是薪水低，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劲的。在外人看来，这些华人移民劳工似乎是受到了同族资本家的严重剥削。这种观点的假设有二：一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族裔经济的业主都是剥削成性的资本家。二是主流经济的工作岗位对移民劳工开放。但实际上，许多华人业主本身也是工人，许多族裔企业的产生和运行必须依靠大量现成的族裔劳动力。而劳工因为文化和结构性的障碍被排斥在主流经济之外。为了自身和家庭得以生存，他们只能通过族裔经济所提供的机会去打工挣钱。从而使族裔经济得以发展。雇主和雇员之间相互依赖，在主流经济不可能体现的劳动力价值在族裔经济里得到体现，剥削问题存在，但其根源不一定在族裔经济内部。

在现实生活中，唐人街的确有不少新移民经历着痛苦的下向社会流动（downward social mobility）。新移民对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不熟悉，加上语言不通的问题，容易产生心理恐惧，害怕种族歧视，也曾在主流职场中碰过壁，因而感到很难在主流经济职场中找到工作。有些从前社会地位较高的新移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留在族裔聚居区内，从事跟他们的教育和技术水平不相符的低层次工作。例如，胡先生从香港移民来美国，在唐人街的一家书店当职员。移民以前，他有金融专业的大学文凭，在一家大银行有份高收入的工作。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在曼哈顿金融区的华尔街找工作时，他叹了口气说：

“在这里你还能做什么呢？英语说得不好，也不知道唐人街外面的世界，没人看你的教育和学历，能找到的每一份的工作都离不开唐人街。我找到这份工，还是靠我的一个朋友，他刚好认识这里的老板。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沮丧，觉得这份工很掉份。可是别人却觉得我很幸运，可以得到这样一份干净舒适的白领工作。我想我应该满足了。现在我相通了，喜欢上这份工作。当你为逃避1997而移民的时候，就必须要有心理准备，移民就要失去一些东西。你总不能要甘蔗两头都甜吧，对吗？”

胡先生看得很开，心态调整得很好。而李先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李先生在移民前是广州一所著名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我访问他的时候，他58岁了，在唐人街的一家食品加工厂里工作。他愤愤不平，对现状非常不满。不过，他的一些感受和胡先生讲的也有不少相似之处：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唐人街来做豆腐。我在中国的时候辛勤工作一辈子，有名有望，有成就感，而我来到美国，由于英语不好，不可能继续教书。但要找工作，给我介绍的全都是些低级的工作。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做豆腐的工作。大家都说，你年纪大了，做这个能挣点钱，也挺合适的。我想，这份工真糟糕，但我不得不做啊，家里有三个小孩，都在读大学，我要打工，起码供到他们毕业为止。”

一年以后，李先生回中国原来的大学教书去了。他跟大多数移民的想法不一样，对于他来说，在唐人街工作跟美国梦一点也沾不上边。

可见，唐人街也有其负面。聚居区中的华人移民常常受限于文化和结构性等不利因素，为此付出了代价。例如，族裔经济的企业大多薪水偏低，聚居区内房价偏高，居住拥挤。再者，因为同族裔的原因，雇主和雇员之间建立了许许多多有形和无形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网，有一定的族裔义务和责任约束，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使他们难以理性化地去追求最大的经济机会，由此又强化了族裔的职业和居住隔离。无论如何，聚居区的利弊得失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计算，也不能完全按照主流社会的标准来评判。

我对唐人街最初的研究表明，移民的输出社会和接收社会的各种广泛的社会力量，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促进了移民的适应。我的结论是：唐人街里的居民虽然大都生活贫困，缺乏一技之长，新移民的英语也不流利，但这并非传统语义学上城市贫民区。与此相反，唐人街深具发展潜力，为移民创造了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切实有利的条件和机遇。虽然现在大部分华人新移民不再需要利用唐人街做跳板（事实上，很多移民都直接到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或是族裔郊区去住了），我依然坚持我在80年代末所得出的结论，唐人街的华人社区和华人族裔居住的郊区依然为同族人提供了切实的支持和关键的立足点，使他们有机会与同族人重新建立联系，重新建立起有利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社区组织和人际关系网。唐人街为大多数华人移民，尤其是处于中下层社会经济地位的移民，确确实实地提供了一条能实现上向社会流动的渠道。

* * * * *

我研究纽约唐人街的博士论文在1989年初完成，随后我把博士论文加以修改补充，出版成书，名为《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力的城市聚居区》（美国天帕大学出版社1992年英文版）。1995年，《唐人街》的中文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出版发行。《唐人街》一书出版了以后，在美国学术界掀起了新一轮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性质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功能和作用的激烈辩论。有些学者认为我的唐人街的理论有创意，对现存移民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尤其是移民族裔社区与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作出了的重要贡献。也有一些学者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指责我推行文化沙文主义，美化少数民族的精英阶层，为族裔资本家唱赞歌，鼓吹剥削有功，强化模范少数民族的刻板形象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苛刻的批评，我坦然相对，尽量从中找出并汲取一些可能深藏其中而有启发性的观点。

至今为止，在涉及移民社会适应、少数民族经济、华人国际移民、移民居住模式和都市社区，城市人文地理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唐人街》的观点仍在被广泛地引用，该书还被用作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有关课程的必读书。《唐人街》可以说是我最得意的论著，因为这本书既是我的处女作，也为我后来从事的移民社会学和亚美研究学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我最近还出版了《当代华人社会》的英文版和《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的中文版两部著作¹，对我近20年来对美国华人社会研究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对于我唐人街的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¹ 周敏，《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6 年）；Min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教授、著名移民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学会前任会长波特斯博士曾作以下评价：

“过去二十多年来，移民社会学和移民经济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移民社会学中形成了新概念，新假设和新理论。……然而，美国对亚裔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仍大多局限于描述性地罗列某个族裔群体或社区之历史和变迁，而较少注重从社会学的视角展开实证研究和理论提炼。正是在此方面，周敏的学术研究填补了空白。自涉足社会学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她潜心研究华裔移民和其他亚裔移民在美国的各种经历，以大量的事实和严谨的方法来充实和修正现有的理论框架。她以认真严谨的态度来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并对现有的资料进行系统的重整和分析，从而得出新的理论成果。她独具慧眼地运用了移民社会学及族裔研究学等学术领域的最新理论和方法来提出科学的假设，并用可靠的实证数据来推理和论证，进而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因此，周敏不仅丰富了世人对美国亚裔历史和经历的了解，而且为研究移民如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¹

我认为自己对唐人街的研究很有意义，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我的一些同事还把我戏称为“唐人街大姐大”（the Chinatown lady），但我从来都未曾把这项研究当作我的事业的“里程碑”。在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侧重点逐渐转向族裔方面，尤其是亚美社区的研究。有些朋友善意地警告我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成员，以少数民族和本族裔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可能会有“局内人”而不够客观之嫌，容易使自己边缘化，妨碍我成为真正有分量的社会学家，对我的学术前途不利。不过我自己从来都不是好高骛远之人，我的追求是认认真真地致力于每一个新项目，切切实实地制定每一个可行的目标，踏踏实实地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论 文】

分层同化论： 新移民第二代研究的理论突破²

周敏³

“分层同化”（segmented assimilation）的概念是我和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在1993年共同发表的一篇题为《新移民第二代：1965年后移民子女的多元同化过程与结果》的论文中首先提出来的⁴。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寻求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用来解释美国1965年后的国际移民子女，亦即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以及探究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和族裔差异的原因，以弥补经典同化论（classical assimilation theories）的不足。这一理论概念提出以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携手合作，构建理论模型并尝试用新的统计方法来量化和测量这些理论模型，使其经得起实证数据的进一步推敲和论证。有些学者则提出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以完善这一新的理论。还有一些学者把这一理论设为稻草人，偷梁换柱，

¹ 引自波特斯为周敏的《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一书所写的序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² 曾刊于周敏《美国社会学与亚美研究学的跨学科构建》第3章。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³ 周敏（Min ZHOU），社会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⁴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30 (1993): 74-96.

强词夺理地攻击并试图推翻这个理论。尽管这个概念有被滥用、误解或歪曲之虞，分层同化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被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广泛采用，成为在移民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领域中研究移民社会适应、种族和族裔的族群差异的一个主要理论之一，对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和公共卫生等其他研究领域的也有非常显著的应用意义，其影响力还超出美国国界，成为研究其他移民接收国的移民同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本文旨在阐述分层同化论的立论前提和主要观点，通过讨论亚裔移民子女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机会以及分析越裔难民第二代在美国成长的案例来阐明这个理论。

一、经典同化论的理论回顾

分层同化论建立在对经典同化论的借鉴和批判之上。在有关移民社会适应问题的文献中，经典同化论是社会学主流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在学术界享有主导地位，左右学术思潮和实证研究的时间长达大半个世纪之久。经典同化论的立论基于三个主要假设：（1）新移民融入接收国的主流社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同化过程，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既有同化的意愿，也享有同化的平等机会，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融入主流社会；（2）新移民的原有的文化和行为模式是落后的，同化的过程意味着移民必须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和行为模式，才可能学会新的文化和行为模式，达到同化目的；（3）同化过程一经开始，将不可逆转，直到完全被同化为止。

经典同化论的前提是，接收国社会只有一个核心或主流文化，那就是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多数民族的文化和制度结构，在美国，这个多数民族就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的欧裔白人。同化过程的最初阶段会产生一个文化“边缘人”（marginal man）的现象，即新移民一方面受主流文化牵引过来，另一方面又被他们自己原有的文化拖拽回去。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认为，这个两极拉扯的过程，意味着一个良性的族裔关系循环，从相互接触开始，因而竞争，然后磨合，直至整合。受本能的因素（自然的竞争）和社会力量（沟通与合作）所影响，不同族裔身份的移民通过与多数民族群体成员的交往和与主流社会制度的不断接触，逐渐放弃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接受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通过几代人的刻苦耐劳、努力工作，最终完全融入主流社会¹。

帕克强调，移民同化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同化的程度可以用社会和文化异质性来测量，即移民群体与主导社会的核心群体的差异的不断降低。但他却忽视了一些重要社会结构因素如种族分层制度的影响。其他经典同化理论的学者在帕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种族和族裔社区及其子系统等各种制度性的因素，对同化的速度起重大作用。根据华纳（William Lloyd Warner）和斯若勒（Leo Srole）的观点，少数民族群体的同化困难重重，因为少数民族所处的不利地位与某些族裔特性直接相关。他们认为，随着语言能力和文化的适应，少数民族群体与核心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上流动机会的差异会经过几代人而消失，但是某些较大的、有色人种少数民族群体——尤其是非裔黑人——的上向社会流动机会，很有可能仍然由于社会的种族等级制度的制约而难以获得并实现。因此，这些学者认为，移民群体的母语、肤色和宗教是社会中的核心族群对少数民族的接受程度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一起互动，决定了各个族群完全同化的结果和速度²。华纳和斯若勒用族群内部的族裔特性与外部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来解释同化过程的复杂性，对帕氏理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正和完善。

米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用更为复杂的7个层面的理论模式来解释同化的过程。这7

¹ 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1928): 881-93.

² William Lloyd Warner and Leo Srole. *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个层面分别为：文化融入、结构性整合、婚姻、身份认同、态度认同，行为认同和公民性同化。戈登认为，移民的同化过程从文化融入开始，这是最基本的第一步，移民要融入主流社会，首先要从语言、宗教和价值观的认同入手。然而，文化的完全融入，如英文流利，皈依基督教和认同基督精神等未必会自动导致其它层面的同化。由于居住模式的种族隔离和缺乏社会互动，不同移民族群之间的差别依然相当明显。少数民族的完全同化从根本上将取决于核心群体对他们的接受程度。相反，结构性的整合（如融入主流社会的各种制度机构，迁移进核心群体成员居住的中产阶级社区，或与核心群体成员通婚等）是最根本的同化层面，犹如石拱门顶上最关键的一块拱心石，只有结构性的整合，才能最终促成其它层面的同化。至于不同族裔群体的具体同化过程如何，以及产生变化的原因，虽然戈登语焉不详，不过他预测，最终结果必定是不同民族的移民群体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失去他们自己鲜明的族裔特征，与核心群体成员不断交往甚至通婚，并作为核心群体的一员而进入主流社会的制度之中，而他们本来的族裔身份不复存在¹。

按照经典同化论推论，根深蒂固的族裔特征，如母国的文化，母语和族裔聚居区，以及抽象的族裔特性，都构成阻碍同化的不利因素。但这些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随着代际的延伸而逐步减少。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后代主要通过英文来交流，在生活技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越来越接近美国的核心群体。虽然在文化层面上可以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未必肯定能够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并置身于其中。无论如何，新移民要先摒弃自己原有的文化，才有可能从边缘的地位开始向上流动。二十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之间，曾经备受种族歧视的东、南欧裔移民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同化过程，成功地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与当时的核心族群（即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的西欧白人移民群体）融为一体，取得了“非拉丁裔白人”（non-Hispanic white）或“欧裔白人”的族裔身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结构性整合的层面上，一些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华裔和日裔群体成员尽管饱受法律和社会排斥，尽管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接受程度还相当有限，但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的硬指标，如教育程度、职业成就和收入水平等的考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非拉丁裔白人群体，结构性的整合方面毕竟已经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然而，另一些本土少数民族群体却还没有按同化论所预测的那样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实证研究揭示出一些与经典同化论相悖的反常现象。第一个反常现象是挥之不去的代际种族劣势。根据经典论，同化的程度与在美国居住的时间成正比，本土出生的后辈比国外出生的移民的同化程度要高，即移民子女（第二代）的同化程度比他们父辈的要高，移民的孙辈（第三代）也比第二代要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种族因素严重地影响同化。比如，控制了来源国的因素和家庭背景因素，少数民族群体在美国居住的时间越长与社会适应程度越低，这些测量社会适应程度高低的统计指标包括移民孩子在学校的成绩，他们对前途的期望，以及他们的在校表现。对于来自一些国家的移民来说，第一代的贫困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减缓，而是延续到第二代。此外，族裔群体之间在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的差距也会延续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相比之下，对于非拉丁裔的白人美国人来说，教育水平与职业成就基本成正比，而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波多黎各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事实并非如此²。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结果各不相同，也与移民从祖籍国带过来的经济、社会和人力资本和有关，而这些移民的族裔资源决定了

¹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²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én G. Rumbaut,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Marcelo Suárez-Orozco and Carola Suárez-Orozco, *Children of Immig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dward E. Telles and Vilma Ortiz, *Generations of Exclusion: Mexican Americans, Assimilation, and Ra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Philip Kasinitz, John H. Mollenkopf, Mary C. Waters, and Jennifer Holdaway, *Inheriting the City: The Children Immigrants Coming of Ag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移民初始定居的地方，譬如，是在富裕的中产阶级郊区定居还是在城市的贫困区落脚。当代移民的特征之一是出现了中产阶级群体，然而，仍有相当多的移民孩子生活在城里的贫穷社区，讲一口不标准的英语，在那些贫民窟里，移民和他们的孩子经常面对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而鲜有机会接触到中产阶级。他们每天接触到的大多是土生的或外来的少数民族成员，而鲜有机会接触到主导社会的非拉丁裔白人族群成员，这些都是阻碍同化的因素。

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所指出的“第二代的衰落”现象¹。甘斯描述了三种第二代可能遭遇的境况：教育驱动（education-driven）的社会流动，遗传性（succession-driven）的社会流动，通过族裔途径来改善社会地位（niche-improvement），这三种境遇与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族裔群体的社区资源有关。他的分析表明，移民家庭的资源丰富与匮乏直接影响子女的成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移民孩子比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更难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因而在职场上也较难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他们的居住和教育条件。住在贫民区的小孩往往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融入和同化模式，一方面，他们向往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部分地接收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如种族平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按个人的意愿行事。既不愿意接受他们父母的职业观，不愿意像他们父母一样逆来顺受，吃苦耐劳，接受较差的工作和薪金待遇，也不愿意抱怨主流社会对他们的不平等待遇。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漠视，还受到学校、同学和媒体的强有力的影响，他们创出独特的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对着干。此外，他们在服饰，约会和性行为的个人选择等方面为所欲为。这些在城市贫民区长大的年轻人的流行文化和观念是典型的美国本土亚文化，是在其父母的祖籍国基本上不可能接触到的。由于受到青少年亚文化和观念的影响，这些移民孩子对生活的物质期望要比他们的父辈高的多，而父辈又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去满足他们的意愿。因此，有些孩子便会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实现他们自己较高的期望，以至与主流社会形成冲突，陷入高危行为，无心向学，参加帮派，以至于参与犯罪活动。还有些小孩会放弃，辍学，过早未婚生育，靠政府福利混日子。虽然大部分小孩想通过教育走出贫困，但也困难重重。不过，在贫民区的公立学校里，移民子女当中成绩顶尖的佼佼者也不乏其人，在获得各种荣誉和奖励的名单中移民的孩子占有很高的比例²。甘斯认为，这些不同的模式是移民子女在试图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难免遇到的坎坷和困难，这些坎坷和困难不仅是主流社会所造成，也与移民族裔社区的一些内在因素有关。

另外的一个反常现象是当代移民同化过程中的各种奇特的结果。一方面，在美国发展最迅速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大量外国出生的工程师和其他高技能专业人才担任了企业和公司的关键的技术职务，有些人甚至成为股东和业主，成为经济实力较强的中产阶级一部分。但他们中间却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完成文化层面的同化，如在语言和行为模式等方面还带着浓厚的外国人色彩。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少数族裔开办的商业银行、豪华的高级餐厅和大型连锁超市与传统的信用社，咖啡厅和茶餐厅，以及夫妻店混杂在一起。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为移民提供了各种社会上向流动的路径。在富有的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里，富裕的移民带着雄厚的资本到那里置业安家，直接进入白人中产阶级社会，打破了传统的台阶式逐步向上的社会流动顺序。

上述的这些异常现象说明了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理查德·阿尔巴（Richard Alba）和倪志伟（Victor Nee）是最热衷于同化论的学术代表人物³。他们认为，上述的异常现象不过是因为经典同化论无法预测到当代社会的结构和国际移民趋势变化而出现的个别现象。他们

¹ Herbert Gans, "Second Generation Decline: Scenarios for the Economic and Ethnic Futures of the Post-1965 American Immigran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5 (1992): 173-191.

²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Growing Up American: How Vietnamese Children Adapt to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98).

³ Richard D. Alba and Victor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Assimilation and the New Immig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指出，持续性的大规模国际移民限制了接收国社会吸收和整合移民的“喘息空间”，使族裔聚居区由于大量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而得以补充和延续。此外，“沙漏时钟型”劳动力市场结构日趋明显。其一端是大量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高薪工作职位，另一端则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低薪工作职位。这种经济结构增长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流动阶梯的几个关键台阶的消失。对于新移民，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低，无一技之长的移民，尤为不利。他们要从社会最底层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少了几个关键的台阶势必造成困难。虽然这些结构的变化为同化设置了新的路障，但由于其他体制性的改革，如公民权利以及保护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立法，移民政策的改革，以及多元文化论、民权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兴起，重塑了接收国开放的社会环境。尽管仍然存在种族歧视和不利的经济条件，当代新移民和他们的代辈将会比从前的移民要更为容易融入美国社会。因此，他们坚信，既然同化论能够圆满地解释 20 世纪之交时欧裔移民的同化过程，应该也适用于解释当代新移民的同化过程。

阿尔巴和倪志伟重新定义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概念。他们认为美国主流社会“是由法律的建制与实践所形成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核心制度结构和组织，淡化、甚至削弱原属族裔身份特征的影响”¹。因此，主流社会不仅包括居住在富裕城区和郊区的白人中产阶级，也包括住在城里贫民区的低下劳工阶层，还包括从前遭到排斥的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他们认为，所有移民及其后代最终将会这个主流社会所接纳、被同化，但未必像经典同化论所预测的循着单一的方向，朝着单一的目标。他们的新同化论（neo-classical assimilation theory）是个宏观理论，用于解释新移民、尤其是来自欧洲以外的有色人种移民群体和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移民群体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和结果。然而，尽管他们定义的主流社会包括不同的阶层，但是他们衡量的成功，仍然是指融入和同化于中产阶级，而不是融入于劳工阶级或者下层社会。

二、分层同化论的诠释

与阿尔巴和倪志伟提出的新同化论相比，分层同化论是一个受默顿（Robert K. Merton）的结构功能主义影响而提出的一个中层社会学理论。与新同化论不同，分层同化论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定义较为狭义，特指是受种族分层和阶级分层制度影响的社会体系，不包括美国社会的边缘化区域和人口。分层同化理论抛弃了经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指出：不同的移民群体不一定要按照同样的方式，即以白人中产阶级的理念主导的方式，向主流社会融入。但分层同化论也推断移民的同化过程的复杂性和将会导致的不同结果，但区别在于，分层同化理论聚焦于解释为什么来源国的不同会引起移民群体和个人社会适应结果的显著差异，为什么来自某些国家的移民族群会相对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而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族群则更容易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更具体地说，这一理论把移民文化适应和社会整合的两个关键层面的同化过程，置于充满着族裔不平等和种族和阶级居住分离的主流社会的大背景之中来考虑，从而推论同化过程会循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并可能导致各种不同的、而不是单一的结果²。

从分层同化论的视角来看，当代移民及其后代有三条主要的社会适应路径。第一条是**传统的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即移民通过不断的文化适应和经济整合，随着时间推移自然而然地进入美国主流中产阶级的社会结构中。这是一种较为熟悉的传统模式，如同经典同化论所预测的一样，移民群体会逐渐地割裂原有的族裔纽带，抛弃原有的价值观、行为规范与行为模式，最终融入以非拉丁裔白人为主导的核心文化和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导的主流社会，完成向上同化（upward assimilation）。第二条路径是**向下同化**（downward assimilation），即移民在文化适应和经济整合的

¹ Alba and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p. 12.

² Portes and Zh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过程中，因结构性的障碍而直接融入美国主流的边缘地带，如贫民窟。沿着这条路径行进的过程中，移民群体的一部分成员融入了本土边缘社会亚文化，也有的成员结合本土亚文化和外来文化而重建一种混合型的移民边缘社区亚文化，这两种亚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核心文化格格不入，通常对陷入社会流动阶梯底层的族群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三条路径是**经由族裔社区，通过有选择性的文化同化而最终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一向上同化途径有保留地吸收主流文化，同时刻意保留本族群的族裔特性（如价值观、行为规范和准则），重建族裔社会网络和社区组织，创造族裔资源，以利移民能够利用这种族裔的优势而成为中产阶级。

问题的关键在于，移民群体将会融入到接收国社会的哪一个社会阶层，是什么原因使之融入到那个社会层。根据实证研究，分层同化可以通过一系列可观察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来测量，如教育程度、就业状况、收入和是否拥有房产等等。对于移民的子女来说，向下同化的指标包括辍学，早孕，被捕或判刑等，这些变量可以有效地推断出他们将来的低学历、低职位、低收入和低购房率的前景。引起这些结果的可能性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个人的因素和结构性的因素。主要的个人因素包括教育程度、英语水平、出生地、抵达美国时的年龄以及在美国居住时间的长短。结构性的因素包括种族地位、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居住区域。经典同化论的模型也考虑这两组自变量。经典同化论的观点认为，学历高、英文好、在美国出生或很小就来到美国、在美国居住时间长、肤色较浅、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良好，以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之外的中产阶级社区居住等等，这些有利条件应该有助于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而分层同化论则认为，这两组决定因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两组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来影响结果。强调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是分层同化论与经典同化论的一大区别。

另一大区别是分层同化论强调移民群体迁出背景（context of exit）与迁入背景（context of reception）之间的互动关系¹。这两组因素是群体层面的因素，也与上述讨论的两组因素进行互动。移民群体迁出背景包括如下的可测量的因素：移民在祖籍国已经享有的社会地位，移民前已经拥有的资源（如资金、知识和职业技能等），以及移民的途径、动机、愿望和行为。迁入背景包括如下几个与接收国有关的环境因素：移民群体的族裔特征在接收国种族分层制度中的地位，接收国政府的移民安置政策，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条件，公众对该移民群体的态度和接收程度以及在接收国已经存在的族裔社区的实力和影响。其中最后一个因素最为重要，移民抵达接收国时，有无同族的族裔社区存在以及族裔社区的强弱，对移民的社会流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分层同化论认为，不同的社会流动结果是由不同群体独特的迁出背景和迁入接收国的背景的互动所决定的。由于移民群体的迁出背景和迁入背景因素不尽相同，移民群体的文化模式、同化策略、生存环境、社会关系和以及可控制的资源都是带很强的族裔特性的，而族裔特性既可为移民个体的发展提供发展的机会也可带来结构性的限制。这些移民群体层面因素的影响力远远大于移民个体层面因素。

移民群体迁出背景与迁入背景之间的互动导致移民或难民群体不同的同化路径，进而可以解释移民群体在新家园的社会流动的成功与否，为什么族群之间有显著差异。例如，为什么在同一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居住同一街区，就读同一学校的情况下，亚裔（来自中国或韩国）移民的子女比拉丁裔（来自墨西哥或中美洲国家）移民的子女的学习成绩更为出色？影响学习成绩的因素各种各样，答案要从这些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其中有一个环境因素在华裔和韩裔群体中是共通的，那就是族裔社区的课外辅助教育系统，其中包括非营利的族裔语言学校和营利性的课外补习和提高班，考大学准备班和咨询服务以及重在发掘孩子智能和提高大学入学竞争力的一

¹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én G.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系列课外文体活动¹。这一套完整的族裔课外辅助教育系统，不仅是因为华裔和韩裔移民的迁移背景，即移民群体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而且也因为这两个族群在祖籍国所遭遇的相同经历，即竞争激烈的一考定终身的教育制度。相比之下，在拉丁裔群体中缺乏这类族裔教育资源，墨西哥裔或中美洲裔的移民社区虽然与华裔和韩裔移民同住一个街区，但他们没有自己的聚居区族裔经济，也没有自己的族裔课外辅助教育系统，他们的孩子只能靠公立学校和社区非营利组织的非常有限的教育资源，因而他们的课外环境和活动与亚裔小孩的差别甚大。此外，与华裔或韩裔移民居住在同一街区的墨西哥裔或中美洲裔移民的孩子，基本上被排除在华裔或韩裔的课外辅助教育系统之外，无法利用其他族裔的社区资源。有关族裔课外辅助教育系统，我将在下一节剖析具体案例来更详尽的阐述。

现有大量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已经充分论证了分层同化论的可信度和合理性。来自不同迁移背景的移民群体不可能以同一路径融入接收国主流社会。当代移民的第二代有可能通过不同的路径，或向上、向下、或横向地同化于接收国的种族和阶级分层制度中。应当强调，向下同化只是分层同化论所预测的几个可能的结果之一。奇怪的是，分层同化论往往被误解或有意歪曲为只关注和预测向下同化的可能性，因而被指责为对新移民第二代持过于悲观的态度。我认为，如果要驳倒分层同化论，认定新移民第二代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来自哪个种族身份，迟早都会融入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的，那么就必须用实证资料推翻以下两个假设：（1）各个移民群体的向下同化的指标（如高中辍学率，少女未婚怀孕率，违法被捕率等）没有显著的差异。（2）不同族群的同化结果的差异是随机分布的，与移民的族裔特性和独特的同化模式无关。

我在对美国 1965 年后的移民第二代进行实证研究时，基于分层同化论去探究两个中心问题：一是聚焦于族裔聚居区来探究族裔社区这一中观层面的结构因素对移民社会流动结果所起的作用。二是强调族裔特性和文化如何与其它宏观层面的结构因素的互动关系来解释族群差异。以下我将以两个个案——亚裔新移民第二代和越南裔第二代——阐述分层同化论的应用问题。

三、亚裔新移民第二代在美国成长：机遇与困境

（一）亚裔新移民第二代：在成功的背后

亚裔移民美国的历史要长于大部分东欧裔和南欧裔的移民。最早大批移民美国的亚裔是华裔，始于 1840 年代，其次是日裔，始于 1900 年代初，再次是菲律宾裔，始于 1920 年代，在 19 世纪初也有韩裔和印度裔移民，但人数较少。由于美国政府实施 1882 年的《排华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排亚法案，亚裔移民人数占总移民人数不到 3%，亚裔社会的发展非常地缓慢。直至 1965 年美国移民法改革之后，亚裔社会才开始改观。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人口以递增速度增长。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140 万增长到 2000 年的 1190 万，2010 年增长到 1732 万，占美国总人口的 5.8%。1970 年以前，亚裔移民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和菲律宾。华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是两个最大的亚裔族群（2012 年这两个族群的人口分别为 400 万和 342 万），其次是印度裔（318 万），越南裔（174 万）韩国裔（171 万）和日本裔（130 万）。另一个特点是来源国多元化。除了六大族群，还有来自 20 多个其它亚洲国家或族裔的群体，如柬埔寨，老挝，老挝苗族，泰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的移民，人口接近两百万。

国际移民是亚裔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将近 60% 的亚裔美国人在外国出生。当代亚裔移民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通过不同的移民途径。有亲属移民，也有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和劳工移民，还有为了躲避战争，躲避政治或宗教的迫害或摆脱经济困境等的难民。华裔、菲律宾裔

¹ Min Zhou and Susan S. Kim, "Community Forces, Soci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The Case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Immigrant Communiti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76 (2006): 1-29.

和印度裔美国人中有相当大部分是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大多数来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裔的移民都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美国，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低教育、低技能的贫困劳工。然而，如果用主要社会经济指标来测量，亚裔群体总体的平均水平比美国人口平均水平要更为出色。以教育水平为例，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亚裔25岁以上成年人的拥有大学本科和本科以上学历的百分比是美国所有族裔群体之最，占49%（全美：28%；其中非拉丁裔白人：31%；非裔：18%；墨西哥裔：9%）。不过，亚裔群体内部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例如，在印度裔成年人中，69%拥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其中37.5%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在华裔成年人中，51%拥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其中25%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相比之下，在越南裔成年人中，18%拥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其中7%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在老挝苗族成年人中，11%拥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其中4%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2009年印度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的中位值是98970美元，华裔的是80643美元。而越南裔的家庭收入的中位值是56279美元，老挝苗族的是45611美元（全美家庭收入的中位值：61082美元；其中非拉丁裔白人：68205美元；非裔：39757美元；墨西哥裔：39754美元）¹。

由于历史上对亚裔的法律排斥，由于亚裔社会的发展是当代国际移民潮所驱动的原因，美国的亚裔社会是以1965年以后抵达美国的移民为主体的社会，新移民第二代从80年代末才开始成长起来（日裔美国人除外，日裔现在已经出现第四代了）。2010年，大约59%的亚裔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称为第一代（也包括移民小孩，即1.5代）。30%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国出生，称为第二代。第三代（本人和父母均在美国本土出生）以上的亚裔美国人仅占10%左右。在21世纪初，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新移民第二代大部分都还很年轻，他们的父母在外国出生，大多是在最近30年才移民美国的。但是，似乎很少人会担心这些亚裔移民的孩子能否成功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父辈移民美国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二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教育成就十分显著。事实上，大多数亚裔移民的孩子，包括那些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出身的孩子，都能在学校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在职场上和生活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美国媒体把亚裔誉为“模范少数民族”，民间大众和许多公众人物甚至学界的一些学者把亚裔的成功归结为族裔文化价值观（如重视家庭，教育，刻苦耐劳精神和未雨绸缪等）的影响。从表面上看，“模范少数民族”反映了现实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幻象。我的观点是，亚裔移民以及他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子女，生活在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这种分层不仅仅基于阶级地位，还基于种族地位。新移民第二代的成功，不仅仅由于他们有了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微观层面的文化因素必须跟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结构因素互动才对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分层同化论可以解释这些不同层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亚裔新移民第二代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迁出背景，其中包括移民素质的筛选性（immigrant selectivity）以及族裔社区的作用。亚裔移民不是一个单一的族裔群体，而是一个由多个族裔群体组成的多元文化群体。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移民历史，迁出背景，家庭背景和族裔社区资源，这些因素影响和决定了亚裔移民孩子的教育成就。跟其他族裔的移民孩子一样，亚裔移民的孩子也有可能通过不同的路径，向上、向下或横向同化，融入阶级分层和种族分层制度森严的美国社会，也会产生社会流动结果的亚裔内部的族裔差异。

首先，美国亚裔社会由于存在不同的阶级，导致了社区内部的不同经济状况，使亚裔美国人的社会流动前景和方向变得复杂难测。中产阶级的移民一来到美国，就能找到一份高薪的职业，有能力在郊区买房安家，过上较舒适安逸的物质生活。而劳工阶层的移民或国际难民却不得不从事低薪的工作，生活贫困，只得在城市中心贫民区租房。他们的子女不得不面对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和城市中心贫民区恶劣的居住环境及其所带来的结构性的问题，如贫困集中，住房拥挤，

¹ 美国联邦统计局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http://factfinder2.census.gov/faces/nav/jsf/pages/index.xhtml>。

帮派泛滥，治安恶化，青少年对抗文化和校区较差等等。

另外也有一些悖于常理的趋势。一些在祖国已经是中产阶级的移民在迁移后面临下向社会流动，他们移民美国之后，社会地位反而由于自己没有对口的工作技能或学历，英语能力较差的缘故而降低，因此不得不与劳工阶层的移民或美国社会贫穷潦倒的少数民族一起打工为生，挤在贫民区生活。但又有些在祖国属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移民可能会通过家人、朋友或族裔就业网络的帮助，落户到以移民为主的中产阶级族裔聚居郊区工作和生活，有些则在同族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当住家管家。此外，由于人口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一些移民群体的聚居区族裔经济繁荣发达，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同族成员创造了机会和有形或无形的利益，使他们有条件实现上向社会流动。另外一些移民社区则因为缺乏同族的族裔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无法创造这样的机会。因此，阶级分层的结果未必就会自然而然地在移民第二代中得到复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能保持好的学习成绩，而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也能摆脱学习成绩不好的困境。

第二，种族因素通常与阶级因素产生互动，对第二代亚裔美国人的影响远大于他们的父母之辈。一方面，尽管亚裔移民之间存在着差别，但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他们的文化和移民历史如何不同，他们在美国社会都会被视为一个族群。另一方面，尽管美国社会较为开放，亚裔移民的教育水平、职业位置和收入水平高于平均值，种族主义仍然存在，种族刻板印象仍然影响亚裔群体。虽然亚裔美国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仍被视作“外国人”，遭受诋毁谩骂和人身攻击。此外，亚裔美国人所受到教育回报也不平等。他们往往需要异常高的考分才能进入名校，需要付出多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与白人相当的职位和收入。他们意识到，跟其他人做得同样好往往是不够的：“你一定要非常出色，你必须加倍努力，做得更好。”还有，亚裔的专业人士常常会碰到玻璃天花板。例如，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工作勤奋、能力超强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但却不是称职的经理或主管。

美国亚裔具有双重的刻板形象，既是“模范少数民族”又是“永久的外国人”，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刻板形象，第一代移民颇不以为然，但他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子女却非常在意，也是他们要争取自身权益的一个出发点。移民第二代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对新家园所提供的机会心怀感激之情，还能忍气吞声，暗自吞下不公平待遇的苦果，强忍种族歧视的痛苦，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应该与其他的美国人平起平坐，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因此他们对不公的现实比较敏感，会有意识地抵制不平等的种族分层制度的压迫。一方面，他们会与主流社会的制度对着干：可能会有意识地组织和参与反现实制度的青年文化活动，可能对现有的主流文化和学校的教育制度采取对抗的态度，也可能会把种族自卑感内化成一种集体性的自我认知，即族裔力量（minority power），并以强化这种与主流社会大相径庭的族裔特性。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跟自己的移民家庭对着干：可能会觉得他们父辈的移民文化过于老套，父母对他们的期望不合时宜，也可能脱离他们的家庭和族裔社区的支持和控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貌似争取权益的表达方式和行为，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境况下反而会阻碍而不是促进他们的上向社会流动。

第三，移民家庭对他们子女的生活和成长影响极大。尽管亚裔包含有多个不同的族裔群体，但不同族裔移民的子女都有一些相似的家庭经历。第一代移民通常都对子女抱有很高的期望，他们的子女则用优秀的学习成绩和找到好的工作来作为报偿，使父母脸上有光。很多父母移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子女能有更好的机会，尽管代价是他们可能会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向下流动。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有限，无法帮助子女的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但他们认定教育是最可靠的融入主流社会的途径。因此，他们不仅仅给自己的子女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在学校中成绩优异，他们还提供各种物质手段以确保他们的学业成功。他们通常会搬到良好的公立学校系统的社区，把子女送到课后补习班，包括母语学习班，课业辅导班，以及各类课外活动班等等，花时间查找

详细的学校资料，以及为子女选择学校和专业。

虽然父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子女，但子女们却有不同的看法。许多移民子女对父母的祖国缺乏关联和感情，因此，他们不可能把太平洋另一端的一个陌生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参考坐标，他们以自己出生或成长的国度作为自我评价的出发点，他们在意这个国家和环境对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脑筋死板，思维老套，不入流，且过于严格。于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成为代际关系之间的冲突。不过，他们也经历过一些父母作为新移民在美国的奋斗过程，他们因而对父母也有一种独特的敬畏的感情。此外，他们生活在经历过民权运动而变得更加开放的美国，也可为融入主流的美国社会，而这正是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而言之，机遇和困境并存。第二代亚裔美国人的成长，要经历移民和种族化的心路历程，跨越两个不同的社会过程。一方面，虽然不同的族裔特性和传统文化的界限随着代际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不清（由于迅速的文化同化和种族通婚），第二代移民依然常常会受到移民传统的影响和限制。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种族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种族划分使阶级的影响力和代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少数族裔成员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来克服主流社会所强加的不利条件，因此，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族裔性作为团结一致的基础，共同克服困难，抓住机会，显得尤为重要。在分层同化理论的框架中，族裔社区对创造有形和无形资源起到关键的作用，深刻地影响到移民子女的同化过程。对于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尤为重要。如果说贫穷社区对本地出生的少数族裔儿童会有负面的社会后果，那么，移民家庭和族裔社区如何才能引导青少年避开与贫困有关的负面影响，迁出市内的穷区？看来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利用超出家庭界限的族裔社区的社会资本，这一点正是我等所提出的分层同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二）多层次社会整合模式：越南难民子女在美国成长的社会学研究

在 1990 年代初，我与当时在路易斯安纳州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班克斯顿（Carl L. Bankston）合作，共同开展了一项有关越南难民子女在美国成长的社会学研究，合著了题为《在美国成长--越裔青少年如何适应美国社会》一书，也与他合作发表过一系列有关论文¹。虽然这项研究是探究居住在新奥尔良市东部的一个贫穷都市社区的越南难民子女同化过程的一个个案研究，但对于解释族裔社区与移民同化的关系和建立分层同化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引起我对新奥尔良市东部的越裔难民社区兴趣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我们的观点是，新奥尔良市东部是一个由于 1970 年代白人大逃离（white flight）而迅速衰落的、贫困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非裔黑人高度集中的都市社区，越裔难民从 1975 年越战结束后被集体安置在那里，社区继而从非裔黑人社区演变成非裔和越裔两大族裔并存的社区。住在那里的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越裔家庭比非裔家庭的平均收入更低。在那个社区的公立高中里，只有非裔黑人和越裔学生，基本没有白人学生。最为突出的是两极分化，越裔青少年既被称为“全优学生”，又被称为拉帮结派的“坏孩子”。这种流行的二元看法似乎前后矛盾，其实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在那所高中里，学习成绩全优的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越裔，而社区里的青少年的帮派活动中，越裔的也甚为猖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越裔难民第二代的同化产生如此矛盾的结果呢？这就是最

¹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Case of Vietnamese Youth in New Orleans Eas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8 (1994): 775-799; Carl L. Bankston III and Min Zhou, "The Social Adjustment of Vietnamese American Adolescents: Evidence for a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8 (1997): 508-523;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Growing Up American: How Vietnamese Children Adapt to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Family Pressure and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Daughters of Vietnamese Refuge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9 (2001): 133-151.

初我有兴趣探讨的问题。

越南裔移民是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以国际难民的身份几经辗转才被安置在美国的。是当代美国最大的难民群体之一。美国军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东南亚的军事介入和行动，导致了越南人和其他五十多万的印支难民移民美国。越裔难民归化美籍后又迅速建成家庭移民链（family-chain migration），资助亲属移民，因此族裔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4 千多人，急增至到 1990 年的 62 万人，而在 2010 年，越裔人口达到了 174 万人，越南难民的孩子因而成为最新的新移民第二代。1990 年，18 岁以下的越裔未成年人口有 52% 在美国出生，27% 在五岁之前移民美国，17% 在 5 岁至 12 岁之间抵达美国，只有 4% 在 13 岁至 18 岁之间抵达美国。这个越裔群体中，有只有 39% 的人英语流利，25 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 17% 的人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990 年的美国有 20% 的成年人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989 年越裔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接近全美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的 3 万美元。但是越裔的贫困率为 24%，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有 25% 的越裔家庭靠政府福利救济为生（全美平均为 7%）。

1990 年代初居住在新奥尔良市东部的越南难民，主要是来自越南农村、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他们那时大多数都是刚移民到美国不久。通过一个天主教的慈善机构的帮助，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集体地被安置在城中一个最贫穷的社区。当时那个社区的居民中非裔黑人占 46%，越南人占 43%，白人和其他族裔占 11%。1990 年，这个社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值为 17000 美元，贫困率是 37%。显然，越南难民在美国的新生活是从社会的最低层开始的，如果这些越南难民的子女要在美国实现上向社会流动，无法依靠家庭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而达到此目的，因为他们的家庭基本没有这些物质资源。然而，他们有可能通过家庭和自己族裔社区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来克服这些困难。大部分的家庭别无选择，只能大家抱团，相互依赖，相互帮助。一方面通过越裔天主教会寻求社会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教会的帮助指导下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社区，族裔群体的成员与教会之间彼此之间形成了紧密相连的社会关系，用集体的力量去适应美国社会并努力取得成功。大多数越裔孩子在条件较差的公立学校中就读，但也能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他们的教育成就并非来自于单独的家庭的帮助，而是得益于族裔社区的社会资本。不过，也有一部分越裔青少年高中辍学，加入街头帮派热衷出轨行为，介入犯罪活动。

我们运用分层同化论发展出一个多层次社会融合模型，用以解释个体、家庭和社区如何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如何影响青少年的教育取向和社会适应结果以及今后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我们认为，学生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成绩，并非仅仅与文化价值，个人努力以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有关，也与各种不同层面的结构因素和分层社会融合有关。图 3.1 展示了我们提出的在理想状态中的多层次社会融合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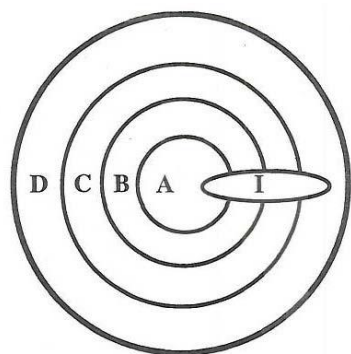


图 3.1：多层次社会融合模型：理想状态¹

I：个体；A：家庭；B：族裔社区；C：居住街区；D：接收国主流社会

¹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Growing up American*, p. 204.

如图 3.1 所示，椭圆形代表移民个体。在理想的状态中，核心圈以及各层外围圈成正圆型。核心圈 A 代表移民家庭，最小的社会单位；包着核心圈的是族裔社区，中层亚社会；包着族裔社区的圈是居住街区，中层社会；包着居住街区的最外围的大圈是接收国的大社会，主流社会。虽然每一社会层都有各自一套价值体系，如公众认可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社会流动目标，但各社会层的价值体系与主流社会的基本一致。为移民的同化提供方向和社会支持与社会控制。以利于他们最终融入主流社会。在这种理想状态下，移民个体与家庭整合，移民家庭与族裔社区整合，族裔社区与地域方位上的居住街区整合，通过多层的有机整合，移民个体最终融入主流社会。也就是说，若要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一方面取决于个人与家庭相互适应，另一方面取决于居住街区与主流社会的相互适应。

如果居住街区与主流社会没有冲突，即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市区街区或郊区，族裔社区的作用会显得可有可无。可是在现实中，许多移民城市的居住街区，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本土少数民族或移民聚居的街区，是一个偏离主流社会的社会层，是接收国大社会的一部分，但又是一个被主流社会遗弃的、体现了种族和阶级交错的（少数民族和低收入贫困阶层集中的）边缘化社会。对于置于这种边缘化社会环境下的移民群体来说，由于贫困的家庭缺乏对个体的引导和物质支持，可能会导致在同化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所在街区与主流社会的差异过大。居住那里的移民小孩，可能自然地被当地青少年亚文化的吸引，反叛家庭而融入到边缘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光靠家庭的力量是不够的，而族裔社区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移民家庭和族裔社区可以联手，引导青少年绕开边缘化的社会层，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如图 3.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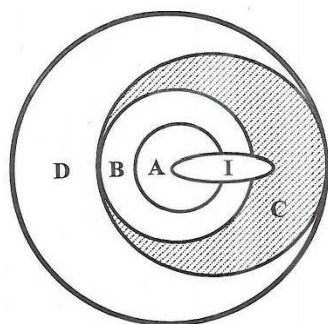


图 3.2: 多层次社会融合模型：现实状态¹

I: 个体; A: 家庭; B: 族裔社区; C: 边缘化了的居住街区; D: 接收国主流社会

我们在对新奥尔良东部对越裔青少年的社区研究发现，越南裔的家庭和社区具有与美国主流社会相同的一套价值体系。有明确的上向社会流动目标、期望值和行为规范准则，即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刻苦勤奋而取得中产阶级的地位。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越裔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案例的共同特点就是个人与家庭脱节或家庭与族裔社区脱节。有越轨的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的越裔青少年大多来自单亲家庭，或者是与族裔社区联系极少的家庭。这些青少年居住街区的边缘社会的不良文化所吸引，模仿当地不良青少年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并建立自己的帮派与本土帮派打斗争地盘，危害社会治安，本人无心向学，通过邪门歪道谋利。与此相反，学习成绩好的青少年大多来自双亲家庭，与族裔社区和族裔天主教堂有紧密联系。我们观察到，这些青少年经常被灌输要尊老爱幼，勤劳肯干，听父母话等等。在越裔社区里这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家庭都是如此。在这种族裔社区环境中，不少家庭生活生活在自成一体的圈子里，受外界的不良影响较小，这些经常上教堂的家

¹ 同上。

庭和青少年，不容易受到其它不良因素和当地青少年亚文化的诱惑。此外，这些青少年感到周围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都经常关注他们，很难能做出轨的事而不被发现。

这项研究的成果证明，多层次社会整合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越南难民的孩子能够在不利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而有些则走上歧路。要成功地对下一代灌输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需要移民家庭与坚持传统道德规范的族裔社区的紧密结合。因此，同化的不同结果，取决于移民子女如何与家庭和族裔社区相互整合。同理，同化的不同结果也取决于移民子女所在的族裔社区或居住街区的社会环境及其如何与主流社会的整合。相比住在同一街区的本土非裔黑人，越裔青少年之所以学业成绩更为优秀，教育成就更为显著，在很多程度上取决与越裔社区所提供的社会资本。

2003年，我们重返新奥尔良东部的越南裔社区，再次对越裔青少年的态度和行为变化趋势进行了调查，并把最新搜集的数据与在1990年代初所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了对比又有了新的发现¹。10年后的新一代越裔青少年大部分在美国本土出生，与90年代的青少年生长在不同的族裔背景下。我们发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依然存在，但“全优学生”的人数比10年前明显减少，而越轨违法的“坏孩子”的人数却在增加。此外，我们发现较为富裕的越裔家庭纷纷迁离，困在原来社区的贫困家庭对族裔教会和族裔社区的依赖性减少，因为他们随着抵美时间的推移，更加依赖政府和其他非营利机构的救济。跟10年前相比，尽管在美国居住的时间更长，对美国社会更为熟悉，越裔家庭反而不能引导孩子充分利用族裔网络和族裔社区的社会资源。随着本族裔中产阶级的外迁，位于新奥尔良东部的越南裔社区更为边缘化了，住在那里的低收入越裔家庭与越裔社区的整合程度比十年前要低。这些发现表明，对于生活在低收入街区的越裔青少年来说，青少年对抗亚文化和违法犯罪行为变得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早些年媒体报道的“越裔全优学生”的事迹还不时出现，但已经越来越少了。越裔青少年的家长也开始面对其他低收入社区所出现的类似的问题，如逃学、辍学，吸毒、早孕和参加帮派组织等。正如一位在越裔聚居区居住的居民在接受访问时说，“在这个国家住久了，很难保持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我们的孩子认为越南是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我们很难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传给他们。”即使仍然存在完整的家庭结构和越裔社区，要想维持过去那种高度整合的族裔联系，也确实是越来越难了。

我们从对新奥尔良东部的越南裔社区前后的两项研究中发现，同化或融入美国社会既非全是正面的经验，也非全是负面的经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新移民或难民群体的社会文化适应过程可能会伴随着很大的困难，因为在美国社会成长的第二代与他们父母的成长环境全然不同。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很快在白人中产阶级郊区安家的人来说，社会流动和同化的过程会相对顺利，因为这个过程大体上是水平方向的流动。

在这里，我们借用两个相关的古典社会学概念来解释上述的社会现象：一个是科尔曼（Coleman）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另一个是涂尔干（Durkheim）的规范整合的概念²。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能够为同一社区的成员带来有利结果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培养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价值系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和规范），还包括社会网络，尤其是对儿童成长有利的小孩与小孩之间、父母与父母之间以及父母与自己小孩之间和小孩与同伴的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根据科尔曼的观点，社会资本既存在于家庭内部，也存在与家庭之外的社区。价值系统有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但要在下一代实现，光靠父母传递是不够的，还

¹ Min Zhou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2006. "Delinquency and Accultur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Decade's Change in a Vietnamese American Community." Pp. 117-139 in Ramiro Martinez Jr. and Abel Valenzuela Jr., eds., *Immigration and Crime: Ethnicity, Race, and Violen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² 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95-120; 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E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 By John A. Spauld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897/1951).

需通过社会网络来传递。换句话说,传统的价值系统和紧密的社会关系在任何社会环境中对于小孩都会有产生影响,但其对于上向社会流动的影响可能会因社会资本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亚裔移民家庭所共有的一些的文化特征,如和睦家庭和尊重长辈等,对孩子将来无论在美国社会的哪个阶层生活和工作都会有利,对于那些生活在不利于学业进步的边缘社会环境中的家庭,坚持这种族裔文化和传统显得更为重要,而支持家庭去强化族裔文化和传统要靠雄厚的社会资本。

对于移民第二代,族裔社区提供了一个社会资本形成的环境。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相互提供帮助,也有利于推动家庭与社区的整合关系,致使移民父母之间和孩子之间经常在族裔社区中进行交流互动。在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族裔社区内,父母和孩子会各自通过这些交流互动来分享相关的经验。于是族裔社区就可能成为一个缓冲地带,既缓和本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也缓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家庭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族裔社区也可以通过不断地交流和沟通,适当地改变传统的族裔文化模式,使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易于接受,成为新的行为准则。

然而,每个族裔群体的成员参与族裔社区活动和介入族裔社会网络的频度和深度都各不相同。如果说一个族裔群体内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会影响群体成员的同化过程,那么从逻辑来说,这种影响取决于族裔成员对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以及对社会关系的维系程度。因此,族裔社会关系的维系与族裔身份认同是相互关联的。个体越是认同自己的族裔社区,就越有可能会遵守族裔群体的行为规范而不渝矩。当然,族裔社区也有可能对族裔年轻人的同化起到阻碍作用,尤其在族裔社区物质资源薄弱或族裔社区对抗主流社会的情况下。此外,族裔社区环境也可能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资本的概念也可以看作是涂尔干久负盛名的规范整合理论的翻版。涂尔干认为,个体行为应该看作是个体的社会整合程度的结果。个体在群体中的整合程度越高,群体对个体的控制机制就越强。在解释移民的同化过程时,孩子越是融入自己的族裔群体中,就越是容易遵守群体的行为规范,抵制群体所不齿的行为准则。在考察族裔特性是有利于形成社会资本或是不利于形成社会资本,十分有必要去研究融入这个族裔社区如何影响年轻人的同化过程。

四、结论

对于不同族群的移民第二代来说,在美国成长的经历各有异同,有些经历了天衣无缝般的顺利过程,有些则经历了充满坎坷的磨难。美国土生土长的亚裔,通常都积极地接受和认同美国文化价值和行为模式,希望与美国主流社会融为一体,自我认为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渴望被主导社会的白人族裔和美国公众所接纳。然而,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摒弃自己原来的族裔身份,但是,他们总是在“模范少数民族”与“永久的外国人”之间徘徊。在某些场合下,他们仍然会被视为“没有被同化的外国人”。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他们又可能会因为显示出自己的族裔身份而被认为是完全适应了新环境而融入了主流社会。在这些亚裔年轻人努力地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的漫长过程中,他们的上向社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迁出背景和迁入背景两组结构因素的互动,如他们的家庭移民前在祖籍国的社会地位,父母在移民前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本族群体在接收国的种族地位,他们自己在新家园的地方社区成长的社会环境,本族裔社区的强弱以及他们在适应过程中所重建的文化模式,包括价值观,行为模式,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等。另外,接收国社会对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所提供的机会也并非绝对平等,即便移民群体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机会,由于族裔群体在和迁出背景和迁入背景的不同,不仅会致使他们不能平等地把握机会,还会在同化的过程中遭遇到不同的结构限制,进而造成族裔差异。

多向分层同化论认为,接收国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种族分层和阶级分层制度森严,移民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经历同化过程,既有在富裕的、以白人中产阶级主导的郊区,也有在以

多元少数民族共同聚居的中产阶级郊区，还有城市中心区的族裔聚居区和贫民窟。这些不同的迁入环境并非总是有利于移民后裔的成长，有些环境即使适合第一代移民，也未必适合他们的子女。而融入美国社会所经历的不同社会环境和自愿或被迫选择的不同路径，对同化的多元结果——上向、下向或平向社会流动——都有可能影响甚大。对那些原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移民来说，下向流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流动，不如说是原地踏步，因为他们已经在最底层了，这种下向流动结果是新移民第二代的向下同化。据此，分层同化论可以让我们提出或继续思考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一些族裔的移民群体会陷入向下同化的路径，甚至长久地、世代地被困在社会底层，而另外一些族裔的移民群体则能够避开这种悲剧性歧途？

【论 文】

跨国主义的实践与移民祖籍国的发展： 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社团的比较¹

阿列汗德罗·波特斯² 周敏³

摘要：无论在经济学或社会学学界，以往有关发展学（development studies）的研究大多注重跨国资本流动和投资行为等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强调行政制度和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过去有关国际移民的研究不仅将人口跨国移动这一现象归咎于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也同时视之为影响国家不发达的结果。近年来对于移民国际汇款的研究开始注重微观的理论视角，强调移民个体和家庭的能动性。然而，这种在研究视角上的转变对于研究国际移民与祖籍国发展的关系显然是不足的，因为它并没有考虑到移民群体自身所产生的组织和结构方面的效应，也没有考虑到在移民社团组织与祖籍国政府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促进发展的合力。本文的目的旨在深入探讨这一论题。我们通过最近刚完成的对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两大移民社团的比较研究，描述移民与祖籍国——墨西哥和中国——的地区及国家层面的密切互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对国际移民与祖籍国发展的因果进程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提出研究移民跨国主义的中层理论架构。与此同时，本文还讨论了此项研究在实践和决策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国家发展，跨国主义，移民社团组织，国际汇款，墨西哥，中国

一、导言

以往对于国际移民的研究大都着眼于输出地或祖籍国的“推力”（push）以及居住地或接收国的“拉力”（pull）的宏观因素，将人口跨国移动这一现象归咎于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也同时视之为影响国家不发达和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社会不稳定的负面的结果。一般而言，国际移民研究大多将移民个体作为分析基本单位。例如，古典经济学把个体视为是决定迁移行动和过程的主要决策者，而社会学以及新移民经济学则优先考虑家庭因素，把由个体组成的家庭作为

1 本文曾刊于《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1年第13期，1至29页。

2 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男，社会学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

3 周敏（Min ZHOU），社会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真正影响国际迁移的主要因素。反之，国际移民对祖籍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研究的¹。例如，对于移民国际汇款的研究注重微观的理论视角，强调移民个体的能动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关于移民跨国主义的研究也强调了这一理论取向，许多新流派把跨国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了移民个体与家庭上，通过对不同个案的分析，发现跨国活动的不同种类和形式以及接收国的移民社区（expatriate communities）与生活在祖籍国的亲友之间持续频繁的互动与联系的规律，包括移民定期汇款，定期两地往返并参与故乡的各类活动，以及与故乡亲友通过不同渠道进行交流²。

然而，以往对跨国主义的研究只强调移民如何融入接收国主流社会，不仅忽略了移民两地持续互动以及移民与故乡藕断丝连的关系对祖籍国发展的影响³，也忽略了影响移民与发展这对关系的第三个重要的行动主体——社团组织。以最近一项针对移民跨国主义的定量研究为例，该项研究把焦点放在移民家庭的户主上，用问卷访谈的方法考察了他们涉及祖籍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由此产生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其中一个发现是，持续参与跨国活动的移民个人在族裔群体中的比例并不高。一般仅限于年纪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在社区中较有威信以及在职业上有所建树的男性已婚移民。此项研究同时发现，移民个人的大部分跨国活动都是通过同乡会或类似的社团组织以及在祖籍国家乡的分支组织来进行的⁴。实际上，个人或家庭对祖籍国的影响离不开社团组织。此外，移民来源地家乡的民间组织和各级政府部门，也大多通过海外社团组织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移民个人为祖籍国发展做贡献的意愿和行动。既然社团组织这么重要，就有必要以组织作为分析单位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围绕移民跨国社团如何影响祖籍国的发展这一中心议题来探讨以下几个有关问题：移民社团中到底有多少是跨国组织？跨国社团产生的动因是什么？跨国组织社团倡议和发起的组织活动有哪些主要类型？涉及的范围有多广？社团的跨国活动是如何被祖籍国看待的——是接纳和支持、还是拒绝和反对，对祖籍国有何影响？

二、移民跨国主义研究

无论在经济学或社会学学界，以往有关发展学（development studies）的研究大多注重跨国资本流动和投资行为等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强调行政制度和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在过去，学界和政界倾向于认同有关国家发展是资本积累和投资的结果的古典经济学观点。而最近，学界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国家发展是制度完善的结果⁵。最频繁、输出移民最多的祖籍国通

1 Brinley Thoma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George Borjas, *Friends or Strangers: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the U. S. Econom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8); Oded Stark, *The Migration of Labour* (Cambridge, UK: Basil Blackwell, 1991).

2 Nina Glick-Schiller and Georges Fouron, "Terrains of Blood and Nation: Haitian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1999): 340-66; Eva Ostergaard-Nielsen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Receiving State: Turks and Kurds i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Global Networks* 1 (2001): 261-281.

3 Steven Vertovec,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and Modes of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 (2004): 970-1001; Patricia Landolt, Lilian Autler and Sonia Baires, "From 'Hermano Lejano' to 'Hermano Mayor': The Dialectics of Salvadoran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1999): 290-315.

4 Alejandro Portes, William Haller, and Luis E. Guarnizo,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Immigrant Adap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002): 278-298; Guarnizo, Luis, Alejandro Portes, and William Haller, "Assimil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Determinants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Action among Contemporary Immigra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2003): 1211-48.

5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过建立与海(国)外侨民相关的政府机构和项目来加强政府与移居国外的侨民之间的关系与沟通,这些祖籍国在涉侨政策的研究上比学界已经先走一步,在国家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方面以发展为目标,但结果却往往不尽人意,与预期结果背道而驰。人口外流,尤其是专业技术移民的流动引起的人才流失——所谓的“脑力外流”(brain drain)或“脑力枯竭”,被认为是国家不发达的一种症状而非原因¹。可是,关于国际移民如何影响国家发展的问题,无论在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有关发展的文献中鲜有被关注²。

然而,移民国际汇款的急剧增长改变了传统的观点。官方报告显示,全球移民汇款总额从1980年的433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000亿美元³。2008年,全球发展中国家所接收的国际汇款高达3360亿美元,其中印度(490亿美元),中国(480亿美元),墨西哥(220亿美元)和菲律宾(200亿美元)成为收取移民国际汇款的大国⁴。曾几何时,许多移民输出国的政府发现,海外侨民为祖籍国带来的硬货币的总量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这些国家所接受的外国援助,而这些硬货币的总额甚至可以与国家通过商品出口所赚得的外汇媲美⁵。世界银行联合其他国际机构一起分析汇款流,并试图将这些汇款纳入生产性投资中。对于一些移民输出国来说,每年的侨汇在国民总收入中越来越显重要。侨汇收入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商讨外债时的抵押条件⁶。

与此同时,移民输出国政府还发现,除了国际汇款本身的直接经济效益,侨胞热衷于家乡的慈善事业并由此带来了数百万计的美金的金钱和物质捐赠。此外,侨胞还会将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回乡,教授乡亲如何经商、办工厂和发展地方工业⁷。这种汇款的大量流入实地输出国政府不断地意识到与海外侨胞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为了维持、鼓励、引导侨汇和捐赠,祖籍国的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推行涉侨优惠政策。然而,政府一般不会单独地与个人进行合作,而更多的是通过移民社团与其精英或代表展开合作。在当今学界发现移民社团在跨国主义进程中的作用的同时,许多移民输出国的政府也把关注的重点从侨民个人转到社团组织之中。在此之前,跨国主义超越移民个体这种现象早已被学界从组织网络或社会网络的角度探讨过⁸。

University Press,1990); Peter Evans, "Development a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Pitfalls of Monocropping and the Potentials of Deliber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 (2004): 30-52; Karla Hoff and Joseph Stiglitz, "Modern Economic Theory and Development," pp. 389-460 in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G. Neier and J. Stigli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 Alejandro Portes, "Determinants of the Brain Dra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0 (1976): 489-508; 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 *Labor 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 Marina Ariza and Alejandro Portes "La Migración Internacional de Mexicanos: Escenarios y Desafíos de Cara a un Nuevo Siglo," pp. 1-51 in *El País Transnacional*, edited by M. Ariza and A. Portes (Mexico DF: IIS/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Press, 2007); Landolt et al., "From 'Hermano Lejano' to 'Hermano Mayor'."

3 Gammeltoft, P. "Remittances and Other financi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The Center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Copenhagen, March 2002); Luis E. Guarnizo, "The Economics of Transnational Liv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 (2003): 666-699.

4 World Ban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12,"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Team,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April 23, 2010. [<http://remittancesgateway.org/index.php/factbook>] viewed on May 1, 2011.

5 Douglas S. Massey, Jorge Durand, and Nolan J. Malone, *Beyond Smoke and Mirrors: Mexican Immigration in an Era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2); Alejandro Portes, Cristina Escobar, and 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 "Immigrant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1 (2007): 242-281.

6 Raul Delgado-Wise and Humberto Marquez Márquez Covarrubias, *The Reshaping of Mexican Labor Exports under NAFTA: Paradoxes and Challenges* (Zacatecas, Mexico: University of Zacatecas,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6); Guarnizo, "The Economics of Transnational Living."

7 Anna Lee Saxenian, *Local and Global Networks of Immigrant Professionals in Silicon Valley* (San Francisco: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2002); Anna Lee Saxenian,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 Luin Goldring, "The Mexican State and Transmigrant Organizations: Negotiating the Boundaries of Memb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7 (2002): 55-99; Jose Itzigsohn, and Silvia G. Saucido, "Immigrant

目前关于国际移民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的研究文献还是十分欠缺的，有待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现有跨国主义的文献一般倾向于对各种国际汇款（remittances）的研究，而忽略了以社团组织为基础的更为广泛的互动形式的研究。无独有偶，有关跨国主义的文献仍停留在以个人或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描述性的个案研究，却没有重视以社团组织为基本单位的分析性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对移民社团与输出国政府日益频繁的沟通给予足够的关注。此外，并非所有祖籍国政府都鼓励或者参与到侨民的跨国活动中去的。国家力量比较弱或者办事效率不高的移民输出国仅限于允许国际汇款的流入，而并不积极支持或参与侨民及其社团的跨国活动。不过，近年来由于海外侨民为祖籍国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因而赢得了许多移民输出国政府的关注并把积极地支持和参与侨民跨国活动提到议事日程和决策过程中。同时祖籍国与侨民之间的联系也为移民群体在接收国新环境的适应和融入提供了新视野。在本文以下的几个部分，我们将讨论并比较两个个案，旨在探讨移民社团如何影响国家发展以及社团跨国活动所带来的启示。

三、研究方法

移民社团组织日渐明显的重要性促使我们对它们开展了一项系统性的实证研究。这个项目的研究重点在于深入了解美国主要移民群体社团组织的数量，种类，产生的原因以及活动方式和范围。在此之前，曾经有过一些相关的个案研究，为我们这个项目提供了充实的素材和理论根据。例如，格尔玲关于墨西哥裔移民联合会的研究以及兰朵尔特等人关于萨瓦尔多裔移民社团的研究¹。不过，迄今为止，对移民社团组织的调查仅限于个案的定性研究，面不够广，推广性不强，对社团组织的种类和功能变化更加鲜有知晓，更谈不上定量研究了。而我们的研究在调查设计上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列出各主要移民群体的社团组织清单以了解社团的种类和发展现状。我们首先借助族裔群体聚居的主要大城市的电话黄页、社区通讯录和社团网页列出清单，对社团的数量和种类进行整理。我们还有赖于移民输出国驻美的使领事馆工作人员，社区精英以及专业线人的帮助和提供的其他社团机构的信息来完善清单。我们发现，每个移民群体的社团组织都很多，种类五花八门，有大有小。大型的社团一般有相对充裕的活动经费，拉美裔移民群体这类的社团组织大多由的联盟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组成，而华裔群体则大多由传统同乡会、宗亲会和堂会组成中小社团有一些能够经营很久，可大部分都是昙花一现。

第二步是对在社区知名度较高而且较稳定的社团的侨领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以了解社团运作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特别针对那些仅在居住国范围活动的和那些参与跨国活动的社团组织进行比较分析。在此过程中，我们按种类、规模和历史抽取样本，从每个移民群体中挑出三十至五十个社团组织作为问卷访谈的对象。我们假设那些最庞大最稳定的社团组织是最有可能在祖籍国实施发展计划并且最能够展开跟祖籍国政府的对话的。

第三步是田野调查，我们到移民输出国实地考察并访谈当地的有关政府官员，这些官员负责与侨胞社团以及美国相应的当地组织部门保持联系。在祖籍国的田野调查有双重目的：第一，检验受访的移民社团侨领所提供的关于在家乡的项目和活动的报告是否真实；第二，通过祖籍国的视角来完善一幅跨国主义的图景，即移民跨国活动对于祖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本文的重点在于系统地比较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的社团组织，他们来自有雄鹰之称的墨西哥和有巨龙之称的中国。在当今的美国，墨西哥移民是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移民群体，而且

Incorporation and Sociocultural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 (2002): 766-798; Ostergaard-Nielsen, “The Politics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 (2003): 760-786.

¹ Goldring, “The Mexican State and Transmigrant Organizations”; Landolt et al., “From ‘Hermano Lejano’ to ‘Hermano Mayor’.”

这些移民对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自 1994 年通过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美国和墨西哥的经济唇齿相依。墨西哥成为为美国市场生产汽车与其他工业产品的重要平台¹。而华裔移民也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移民群体，是亚洲移民之冠。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也是相互依赖。在制造业和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中国是墨西哥的主要竞争对手²。在过去一百多年间，这两个国家同样经历了大量移民美国的过程。在过去三十年，他们同样对外开放经济，寻求外国投资和贸易。我们假定二者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水平以及在美国的移民历史和社团组织种类有所相似，这样就可以系统地比较两国移民社团组织的功能及其对于祖籍国发展的影响。

四、美国墨西哥裔移民跨国社团组织

上面提到，墨西哥裔移民是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族裔人口超过了一亿两千万，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在海外。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目前现状来看，墨西哥都储备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其强大的北边邻国，尤其是以季节性的流动为主。1964 年“布拉塞洛计划”（Bracero Program）的终结，导致了这种季节性劳工流动通过非法的渠道被重新激活，以至无证移民和非法入境迅速增长。如今，大约一半以上的墨西哥移民是无证移民³。

一般而言，墨西哥裔移民大多集中在美国西南部，三分之一聚居在加州，20%在德克萨斯州。中西部是他们的第二选择，有 7%的人口住在伊利诺斯州。近些年来，墨西哥裔的劳工移民已经逐渐向东部转移，在农业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寻找工作机会，从而逃避西部和西南部的边关收紧和反移民浪潮。现在，大量墨西哥裔人口开始出现在他们历史上未曾踏足过的地方。一些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例如纽约、新泽西、佐治亚和南北卡罗纳多州都接收了大量的墨西哥裔移民⁴。

1. 墨西哥移民社团组织

在很多重要方面，墨西哥移民社团组织与其他拉美裔的移民社团组织有所不同。墨西哥裔移民人口不但比来自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所有移民群体的总和要多的多，而且绝大部分的墨西哥裔移民都是来自农村⁵。墨西哥裔移民对自身祖籍地的传统忠诚比其他拉美裔移民要强得多。他们的社团组织与家乡的社团组织的发展不仅是相呼应的，而且比其他移民群体的社团发展更为长久化和多样化。还有一个显著的指标能说明这种差异：当其他拉美裔移民社团组织采取不定时的举行联欢会，靠抽奖、跳舞等活动的形式来筹款支援家乡建设的时候，墨西哥裔移民通常会定期捐款给他们的同乡会，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祖籍地履行传统责任（西班牙语为 *cargos*）的延续。表

¹ Harvey Shaike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exico: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9 (1994): 39-72; Delgado-Wise and Covarrubias, *The Reshaping of Mexican Labor Exports under NAFTA*.

² Susana Iranzo and Alyson C. Ma, “The Effect of China on Mexico-U.S. Trade: Undoing NAFTA?”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2006. [http://www.sandiego.edu/peacestudies/documents/tbi/iranzo_ma_TBI.pdf] access on May 1, 2011.

³ Passel, Jeffrey S. 2009.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Immigration Trends,”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Center fo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March 26 [<http://cmd.princeton.edu/papers.shtml>] access on May 1, 2011; Douglas S. Massey, “Borderline Madness: America’s Counterproductive Immigration Policy,” pp. 129-138 in *Debating Immigration*, edited by C. M. Swa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⁴ Robert C. Smith, *Mexica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Worlds of New Immigrant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Fran Ansley and Jon Shefner, *Global Connections, Global Receptions: New Latino Immigration to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009).

⁵ Wayne Cornelius, “The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of Demand for Mexican Immigrant Labor: New Evidence from California,” pp. 115-55 in *Crossings, Mexican Immigration i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edited by M. Suarez-Orozco (Cambridge: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Ariza and Portes, “La Migración Internacional de Mexicanos”; Patricia Arias, “Mexico’s Rural Agenda: Themes and Dilemmas,”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Center fo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April, 2008.

一是三个拉丁美洲裔移民群体中的移民社团组织的清单（我们的研究还包括了多米尼加和哥伦比亚移民群体的社团）。从表中可以看到，墨西哥裔移民社团组织不但数量繁多，而且很多都是属同乡会类型的（占三分之二）。相比而言，多米尼加裔的同乡会只占 3.5%，哥伦比亚裔的只有 2%。同乡会联合会一般是以来源地（州际）划分，墨西哥裔社团组织有 4%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而其他两个族群却没有这类型的社团组织。

2. 祖籍国的影响

祖籍国的国家因素是影响移民跨国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墨西哥联邦政府在跨国场域（transnational fields）中表现强烈而积极。联邦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成立海外墨西哥人事务办公室（西班牙文为 Instituto de los Mexicanos en el Exterior，缩写为IME），递属于外交部，IME是国家力量达到顶峰的标志。2002年IME还成立了一个由来自北美142个移民社团的代表所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一些移民比较集中的墨西哥州（在中国称侨乡），例如萨卡特卡斯（Zacatecas），提倡在全美建立他们的同乡会联合会。萨卡特卡斯的州长，以及该主要城市的市长，州立委频繁地访问洛杉矶、休斯顿还有其它乡亲较为集中的美国城市并与移民社团组织建立密切的关系，当然，那些社团的精英分子也会定期回访墨西哥和侨乡各地。萨卡特卡斯州是积极支持和推行政府的1+3计划（tres-por-uno），曾经是1+2计划（dos-por-uno）。通过这个项目，移民社团组织每捐献1美金给墨西哥的公共事业，他们的联邦、州和市政府都要配套给予4倍的投入¹。据萨卡特卡斯州州长阿玛利亚·加西亚（Amalia Garcia）介绍，1+3计划已经支持了州内超过1000个发展项目。移民捐赠的资金都用在了修建课室、操场和道路中去了。最近估算大概有六十万萨卡特卡斯人住在美国，约占萨州人口的40%。这个1+3计划是将国际移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人口流失）转化成为促进地区发展的积极力量。加西亚州长还制定实施了“返乡人”（西班牙裔语为Para los que Regresen）计划，给萨州籍移民送回萨州念书的小孩提供奖学金²。

表一：美国拉丁美洲裔移民社团组织的类型

类型	族裔			总百分比 %
	哥伦比亚裔 %	多米尼加裔 %	墨西哥裔 %	
公民/文化组织	47.30	30.00	6.82	16.23
其它文化组织	10.16	15.29	0.54	3.66
经济组织	4.44	2.35	0.70	1.52
同乡会	1.90	3.53	63.80	47.04
同乡会联合会	0.00	0.00	4.26	3.10
州/省际同乡会	0.32	1.18	8.68	6.48
国际慈善组织（如 Lion Clubs, Rotaries, Kiwanis 等）	6.98	3.53	0.00	1.58
来源地慈善组织	3.17	0.00	0.00	0.56
政治组织	7.93	10.00	0.46	2.70
专业行业协会	8.89	14.12	0.70	3.44
宗教组织	1.59	1.18	0.23	0.56
社会服务组织	2.86	17.06	3.26	4.51
体育型组织	0.63	1.76	10.00	7.55
学生组织	3.81	0.00	0.54	1.07

¹ Goldring, “The Mexican State and Transmigrant Organizations”; Guarnizo, “The Economics of Transnational Living”; Rodolfo de la Garza and Miriam Hazan, *Looking Backward, Moving Forward: Mexican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as Agents of Incorporation and Dissociation* (Claremont, CA: Tomas Rivera Policy Institute, 2003).

² Jude Joffe-Block, “Immigration Viewed From the Other Side,” *Berkeley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10): 18-20.

总百分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总受访社团数	315	170	1,290	1,775

资料来源：移民社团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Immigrant Organization Project, 2008)。

而在其他移民输出的州和县市，如哈利斯科州（Jalisco）和米却肯州（Michoacán）都采用了萨州的模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墨西哥移民社团组织的集中地，洛杉矶、休斯顿和芝加哥发起建立同乡会联合会。现在在很多新的墨西哥裔移民的目的地城市，在那里的墨西哥人也效仿了这种联合会的组织形式，以便于与来源地政府互动（移民个人和组织直接受到墨西哥领事馆与来源州政府的帮助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在纽约的墨西哥裔移民主要来自普埃布拉州（Puebla），因为历史上墨西哥裔移民不聚在纽约，那里的墨西哥裔移民大多是新移民和非法移民，他们在墨西哥领事馆和来源地州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组织起来，在纽约市建立了一个的普埃布拉社区（Casa Puebla）。又如，自1994年起，瓜纳华托州（Guanajuato）的州政府已经帮助和支援了在美国的14个州墨西哥裔移民建起了45个瓜纳华托社区，其中有五个在美国东岸¹。

更重要的是墨西哥联邦政府在跨国场域中的表现。这表现在针对移民慈善捐赠所提供的匹配项目，例如近期的1+3计划（tres-poruno program），在美国许多城市的墨西哥裔社区，建立了为墨西哥人服务的图书馆、咨询机构以及语言培训中心（培训英语和西班牙语）。在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联邦政府还为墨西哥裔移民建立了一个拥有55个法律顾问单位的网络，并加强了IME对墨西哥移民在法律辩护上的援助。此外，墨西哥政府在使领馆里设立了“健康窗口”，给墨西哥裔移民提供了免费基本医疗服务和医学资讯。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决定这些跨国移民组织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是祖籍国政府对其移民社团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中，这种国家赞助极其少，而在墨西哥却很普遍。墨西哥社团组织得到来自祖籍国官方的赞助是哥伦比亚和多米尼亚社团组织的十倍²。这再一次反映出墨西哥政府深深地卷入其海外移民社区中间。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跨国社团组织成员的特点，这一点所有拉美裔移民群体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移民社团组织都是由年长的、教育良好并且较有威信的移民担任他们的领头羊。如表二的数据显示，大约有一半的常规成员都是40岁或以上的，而且至少拥有一个大学文凭。相反，只有五分之一或者更少的人是三十岁以下，拥有高中以下文凭的。然而，对比哥伦比亚和多米尼亚的社团组织，墨西哥社团组织相对更加能吸引年轻人，而且他们的成员中，高学历和低学历的人各占一半。总体而言，这与墨西哥裔移民人口中总体上年轻化和低人力资源化的特点相一致；同时反映了，贫穷的墨西哥移民对于农村老家的长期牵挂，这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加入了同乡会。此外，近70%的拉丁社团组织成员都在美国生活了十年或以上，其中有一半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墨西哥裔的移民社团组织中再一次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地方，从非法移民中抽取的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当中，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多于无证居民。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包括墨西哥裔移民在内的所有拉美裔移民中，更倾向于参加这些跨国的、政治的或者其他活动的，往往是那些在他们各自社团中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成员，那些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居民以及拥有合法地位或美国公民身份的移民。我们还发现，现在的移民都一般都希望在接收国的主流社会和劳动力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考虑集体目标的实现。而通过社团组织进行跨国活动，可以帮助移民在经济、文化与社会融入美国，而移民那种对祖籍国的发展作贡献的动机与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的。

¹ Cristina Escobar, “Migracion y Derechos Ciudadanos: El Caso Mexicano,” pp. 231-274 in *El País Transnacional*, edited by M. Ariza and A. Portes (Mexico DF: IIS/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Press, 2007).

² Escobar, “Migracion y Derechos Ciudadanos: El Caso Mexicano.”

表二：美国拉丁美洲裔移民社团组织成员的背景特征

	哥伦比亚裔	多米尼加裔	墨西哥裔	总百分比
年龄				
30 岁以下 (%)	12.1	11.1	24.8	15.2
40 岁以上 (%)	53.2	53.8	33.6	48.3
教育程度				
高中肄业 (%)	7.4	29.7	28.7	20.9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	52.3	50.5	27.0	45.7
职业				
劳动密集型蓝领职业 (%)	18.0	26.4	40.1	26.6
专业白领职业和业主 (%)	49.8	61.5	36.0	50.3
英文程度				
不谙英文 (%)	11.9	18.7	5.0	12.4
英语熟练 (%)	64.2	49.7	60.9	58.5
移民合法地位				
非法入境者 (%)	6.3	3.5	27.9	10.7
美国公民 (%)	56.3	48.5	38.4	49.1
在美居住时间				
少于五年 (%)	10.1	5.8	10.4	8.7
多于十年 (%)	68.9	66.8	69.5	69.3
因社团事务而往返祖籍国的频繁度				
从来没有过 (%)	6.7	3.6	30.0	11.5
每年至少三次 (%)	40.0	35.7	20.0	33.3
总数	315	170	1,290	1,775

资料来源：移民社团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Immigrant Organization Project, 2008)。

由此可见，墨西哥裔移民的跨国主义是与众不同的，这种差异不仅追溯到国家因素，墨西哥各级政府的介入对移民跨国实践的影响不可忽视。还追溯到其独特的移民历史，移民背景及其社会融入状况：美国墨西哥裔移民主要来自农村或原著民的村落，这些移民抵美后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体力工作。这些身份卑微并处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底层的移民不可能建立诸如莱昂斯俱乐部 (Lions clubs) 或者基瓦尼斯俱乐部 (Kiwanis clubs) 这些由哥伦比亚移民所建立的移民社团组织¹；他们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也使他们无法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的社区。不过，他们组织社团的意愿却丝毫没有减弱，而依靠着对家乡那种传统的忠诚和责任感联合起来，与他们的家乡保持着延续的和积极的联系，非法移民或无证居民虽然从来不去想去领导同乡会，但他们还是积极参与，将辛辛苦苦赚到的血汗钱贡献到同乡会中去，为家乡建设出力²。

3. 变动中的墨西哥裔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

墨西哥裔移民的跨国实践的效果可通过以下两个案例说明。案例一：过去十年间，来自萨州的圣胡安特洛同乡会会长阿曼多·费尔南德斯 (Armando Fernandez) 已经为他的家乡圣胡安特洛筹集了许多美金，以支持当地的公共设施建设。作为一个住在加州的土木工程师，费尔南德斯与其他同乡移民联合组成了一个协会以便更好地帮助建设家乡。他们最先开始在一所费尔南德斯以前上过的小学进行资助，而后还做了许多其他的捐赠。“我非常依恋我的家乡”，他说，事实上，

¹ Portes et al., “Immigrant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² Goldring, “The Mexican State and Transmigrant Organizations”; Bryan R. Roberts, Reanne Frank, and Fernando Lozano-Asencio, “Transnational Migrant Communities and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1999): 238-66; Maria A. D’Aubeterre, “Aquí Respetamos a nuestros Esposos’ Migración Masculina y Trabajo Femenino en una Comunidad Nahuatl,” pp. 513-546 in *El País Transnacional*, edited by M. Ariza and A. Portes (Mexico DF: IIS/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Press, 2007).

他已经是他家族中第四代经历跨国生活的移民了¹。

案例二：来自格雷罗州的圣米格尔（San Miguel Comitipla）同乡会，其成员大多是低技能的劳工和无证移民，主要聚居于纽约。这个同乡会的第一个跨国成就是在家乡的镇中央广场上建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凉亭。接着同乡会成员将镇上的教堂翻修一新，后来还买了一个大钟放在教堂的塔上，并陆续整修及用砖瓦重铺了通往广场的公路和街道。为了完成这些工程，移民经济上的支持和当地志愿者的劳动是缺一不可的。这个同乡会的下一个大工程就是扩建广场，以容纳镇上每年的从各地来的朝圣者，大约需耗资 8 万到 26 万美金。圣米格尔市的市长描述了跨国事业开始的情形：

“1985年前后，我们的小镇受益于这些工程。他们出于宗教原因修缮圣地亚哥的圣所，这里有许多移民资助者帮助我们；我们买了很多路灯，引向圣所——这条路是朝圣游行队伍的起点。今天，有赖于在美国移民的支持，我们的建设更近一步了：教堂的外观更好看了，神坛用金叶翻修；现在，我们期待来自市政府和我们在美国的同胞给我们更多的资助，重建这里的学校²”。

如前所述，墨西哥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全国上下参与其发展工程。在 IME 下辖的咨询委员会每年组织两次会议，与会者由从美加的移民社团组织中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的。通过美加两国的墨西哥委员，IME 提出了更加深入的倡议，就是保证移民在祖籍国所拥有的公民权和选举权，维护他们在海外的利益，促进其与祖籍国的持续联系。大量的国际汇款流入，以及同乡会及各种协会对家乡的贡献成为了推动政府持续参与国家建设的核心和推动力量。

五、美国华裔移民跨国社团组织

中国是美国所以移民群体中的最大的祖籍国。中国有13亿人口，为全球人数最多的国家，散居在海外的华人社会（diaspora），包括华人移民及其后裔，估计达到四千八百万，同样是居全球第一。而这些海外华人中大部分都集中在东南亚。而美国华人社会则是在亚洲之外最大的华人社会，也是接收华人移民最多的国家。现在美国华人人口达到三百六十多万，其中三分之二是国外出生的第一代移民，是除了墨西哥以外，在美国的最大的非欧洲裔移民群体³。

华人自十二世纪以来就开始向海外移民。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华人才开始成批地移民美国，这是由于美国当时开发西部，急需开垦金矿、修建铁路和开拓农业的大量劳动力。这种大规模的从中国进口劳工一直持续到 1882 年《排华法案》建立之后才停止⁴。当时，中国劳工，或者再宽泛一点说还有日本劳工，动摇了墨西哥农民在美国农业上的地位，一下子形成了强力的竞争对手。在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墨西哥和中国劳工几乎覆盖了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的许多地方⁵。

许多华人移民并不像早期的墨西哥移民那么居无定所或者季节性逗留，尽管他们也持同样的寄居者心态，主观上并不想永久定居下来，而是想尽快实现他们的“黄金梦”，然后衣锦还乡。但他们都不得不在美国停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了反抗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法律上的排斥，他们

¹ Joffe-Block, “Immigration Viewed From the Other Side.”

² 2005 年，在墨西哥格雷罗进行的 CIOP 项目的田野调查。

³ Min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⁴ Sucheng Chan *This Bitter 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⁵ Mario Barrera, *Race and Class in the Southwest: A The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io Garcia, *Desert Immigrants: The Mexicans of El Paso, 1880-192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大多聚集在大西岸和东北岸的大城市的贫穷社区中，为了生存一方面干着最卑贱的苦力活儿，另一方面也组织起来自治自助。这些族裔组织严密的单身汉社区是美国许多城市当代唐人街的雏形，尤其是在加州和纽约¹。

华人移民之所以有跨国主义研究的价值还在于移民来自特定的来源地。早期出去的华人移民并不是来自全中国各地的，而是主要来自两个南方省份——广东省和福建省。广东，既是中国人人口第二稠密的省份，也是华人移民的最大输出地。而且，广东还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唯一向美国输出移民的省份。其中超过一半的海外华人华裔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广东祖籍。移民到北美的主要广东省的五邑地区（现在的江门市）²，还有珠江三角洲周围的农村地区。福建在历史上是中国第二大移民输出地，约有九百万海外华人和华裔是福建籍的。福建移民美国比较广东移民晚，虽然十九世纪已有福建人来美，但人数众多的移民抵达美国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们当时大多都是通过所谓的“蛇头”偷渡过去美国的³。福建籍的北美移民主要来自连江、常乐、福清以及省会福州等地。

1. 传统的华裔社团组织

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二战之前，美国华人移民主要聚集在西岸的大城市唐人街以及其他主要城市，如纽约和芝加哥。因为《排华法》和种族歧视的缘故，华人社区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隔绝，但是他们并没有切断对于祖籍国政治与社会事务和家乡亲人的关心。当时大部分华裔人口是由第一代移民和男性劳工组成，在 1890 年代美国华人社会的男女比例是 27 比 1。这些人口中超过 60%集中在加州，他们大多从事洗衣业、餐厅业、雪茄和靴子制造业、农业、家政业以及提供卑微的服务业⁴。他们依赖宗族社会网络建设族裔聚居社区——唐人街，在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唐人街的产生是为了共同抵御无所不在的外在敌视，实现自给自足和自我管理。在老唐人街里，有三种主要的传统社团组织：宗亲会，会馆，以及商会（也俗称为堂会）⁵。

家庭和宗亲观念在早期华工中间尤为强烈。原因是许多华工来自同一村落，且由于不懂英语，人地两生，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唐人街遂成为各种不同宗亲会成立与发展的重要基地。这种宗亲关系和组织一直到排华阶段才逐渐得以制度化。宗亲会多以同一姓氏，血亲或宗族为核心。中国传统的家族概念本来就很宽泛。在美国，这一家族概念被进一步拓宽了，超出了同一姓氏、同一祖宗和同一村落的范围。只要姓氏相同，一般可称为同一宗族。因此许多宗亲会亦吸收一些非血亲或非同宗的成员。一些人数较少的姓氏甚至联合起来成立宗族组织以提供相互协助和对成员安全的保护。宗族组织的规模小到 20 至 100 人，大到几百至上万人。

地域性的会馆又称同乡会，一般比宗亲会规模要大，属于乡土或地域性组织。通常由来自同一地区，讲同一种方言的成员组成，并冠以移民来源地的省、县城镇及乡村的名字，如福建会馆、台山会馆、中山同乡会等。由于跨越了宗族和村落，会馆成员人数一般比宗亲会多。一些人数较少但方言相近的区域，往往联合起来组成较大的会馆。

堂会（又称帮会）与宗亲会和会馆有所不同。“堂”不以血缘，地缘和宗亲关系为基础，而重视结盟起誓，重义气和堂规。一些小的氏族和弱势群体为防止受到较大的宗亲会和同乡会的胁

¹ Chan, *This Bitter Sweet Soil*; Min Zhou,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²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又称作五邑侨乡，包括了五个县级市：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与新会。19世纪赴美国的华工大多源于此地。

³ 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⁴ Chan, *This Bitter Sweet Soil*;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⁵ Richard. H. Dillon, *The Hatchet Men: The Story of the Tong Wars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2).

迫，便自愿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更有力量的社团，称之为“堂”。堂会成员以兄长相称，对外英勇打斗，以维护堂会利益。堂会一般广招朋党，因而吸引一些小的氏族和弱势群体，以及各行业的业主和雇员，其内部的结构、人员、财力和活动隐秘，人多势众，且财力和武力均较为雄厚。堂会也担负商会的职能，在唐人街中自划地盘，控制社区内部的经济事务¹。最为著名的有萃胜工商会、安良工商会和协胜公会等。

老唐人街在十九世纪末中华会馆（CCBA）建立之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组织化生活。中华会馆的前身是著名的六宗亲团（the Six Companies），1880 年后期出现于旧金山的唐人街。中华会馆扮演着族裔保护伞和唐人街自治“政府”的角色，将各宗亲会、同乡会和堂会联合起来²。每个唐人街都有中华会馆或叫中华公所。例如，1883 年在纽约成立的中华公所联合了 60 个社团组织；洛杉矶中华会馆在 1889 年建立，联合了 27 个社团组织。中华会馆的主要功能有，调解内部纠纷和冲突，制定社团成员的行为规范，以及对外代表华人社区，为族裔群体和个人的权益与主流社会进行抗争。最近十几年来，这些中华会馆的成员各自都为其成立 100 周年办了庆祝活动。

因为美国的排华政策不允许女性移民，华人既无法携家眷移民也很难在美国本土成家，这就使得当时的华人归国之心和关切祖国之心更为强烈。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佳，但他们还是定期寄钱回家支持他们的父母和妻儿，并通过宗亲会与会馆，筹款资助家乡的建设。事业有成的商人也会经常往返中美两地，在家乡建房置地，投资产业和商业。因此，在二十世纪之初，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这种传统的跨国活动形式中。与此同时，中华会馆以及一些比较大的宗亲会，会馆和堂会都会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尤为突出的是筹款支持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皇朝——清朝。孙中山在青少年的时候随家人移居夏威夷，为了祖国的民主革命事业而放弃了医生职业，于 1894 年在檀香山建立了作为国民革命海外基地的兴中会³。

总而言之，在老唐人街内，谁也不可能忽视华人社团的存在，因为许多传统的社团组织在唐人街里拥有物业并声称拥有唐人街辖内路段的控制权。当今唐人街的主要中心地带，街道两旁都容易注意到刻有社团的名字的建筑楼宇，楼顶还挂着祖籍国的国旗（1980 年以前大多挂中华民国国旗，1980 后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社团不断地增多）。这些社团今天跟往日区别很大，其功能随祖籍国和接收国的大环境的变化而在不断的变化。

2. 新华裔移民社团组织

美国的华裔人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跌至八万五千人，而后几十年都一直徘徊在十万人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的局面直到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才得以改变。第一个事件是美国在 1965 年进行了移民法的重大改革，国会通过了《哈特-塞勒法案》，废除了 1924 年通过和实施的配额限制移民法，放宽移民入境，确立了以家庭团聚为主，技术人才移民为副的两大优惠政策。第二个事件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结果在中国再次引发了三十多年持续不减的移民潮，移民人数一直以几何递增的速度攀升，移民美国的华人人数从 1960 年代的十万增至 1990 年代的五十三万。美国华人的总人口也随之不断上升，从 1960 年的不足二十四万增至 2010 年的三百八十万。

但是跨二十一世纪初的移民潮不同于一个十九世纪的以华工为主的移民潮。虽然目前华人移民人口中仍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无证移民，而且主要来自福建农村，但当代华人移民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移民法许可的两个途径合法移民美国，一是由亲属担保的家庭团聚签证，二是由雇主担保的

¹ Ko-Lin Chin, *Chinatown Gangs: Extortion, Enterprise, and Ethni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Kwong, *The New Chinatown* (New York: Hill & Wang, 1987).

² Chia-ling Kuo,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New York's Chinatown: The Role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7).

³ Him Mark Lai,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AltaMira Press, 2004).

专业技术工作签证。新改革的移民政策不但允许移民的父母、配偶和子女移民取得移民签证，而且还强化了国际移民家庭链（family-chain），为移民美国开拓了新的渠道。与此同时，华人移民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就开始“脑力外流”，先是在二战后，继而是六十、七十年代从台湾流入美国，后来是八十年代以后从中国大陆流入¹。这种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潮经历了有三波。第一波脑力外流的人数相对较少，主要是由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外交人员构成。1949年国民政府战败迁都台湾，美国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当时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华人因此滞留，当时有几千人以战争难民的身份获得永久居留权。第二波脑力外流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间，主要由台湾人构成。当时国民党政府成大批地派送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的大学学习深造，还有不少中产阶级家庭送子女出国留学，他们学成以后大多数留在美国工作，通过雇主担保移民。第三波脑力外流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和美中建交后，中国政府放宽留学政策，大量向国外、尤其西方先进国家派送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1978至2008年间，中国派送超过将近80万留学生，其中有一半到了美国。还有不少自费留学生。但这些留学生当中仅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学成回国。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国会特许六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及其家属获得永久居留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美国国会进一步改革移民法，放宽了H-1B工作签证和技术移民，使美国公司雇佣高级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更为便利，这无疑又加速了移民输出国的脑力外流。举例说，2002年，美国发放了将近一万九千个H-1B签证给在美找到工作的硕士以上学历的中国留学生，同年有一万八千位中国籍的高精尖专家和技术人才获得永久居留权²。

与早期的华人移民不同，新移民体现了来源地、社会经济背景和居住地的多元化。当代的华人移民，不再限于来自广东的农民，也不仅仅限于来自社会经济底层的人士。他们抵达美国后也不再受困于唐人街，他们的定居模式多样，大多数在郊外的中产阶级社区落脚，还建立了华人聚居郊区（ethnoburbs）。新移民的华人组织生活当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华人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华人移民社团组织，这当中的许多社团组织是在老唐人街以外成立的。

3. 跨国华人移民社团

美国华人社团的发展非常快，但是目前尚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数字。最近我在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这几个华人移民的主要聚居城市所进行的一项移民跨国活动研究，编辑了一个华人社团清单。这个清单是根据这三大城市所在的中文电话黄页、社团网页以及与中国政府和使领馆的访谈中收集的，总共有 1370 个社团，是一个不太完整的清单（如表三所示）。据中国领馆官员的估计，光南加州的华人社团组织就超过两千个，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虽然搜集有限，但是表三已经反映了各种类型的华人移民组织，其中包括规模最大的、历史最长以及最稳定的社团。

如表三所示，传统类型的社团组织诸如宗亲会、会馆和堂会占社团总数的 40%，依然是当代华人移民社团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地域性会馆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许多会馆已经超越了宗族和村落的地理界限，将不同地区甚至不同省份的成员也囊括进来。除此之外，不少现代类型的社团组织正急速发展。譬如，专业团体占总数的 11%。例如，美国的华人科技协会（国家级的，拥有 15 个地区分会），华美医师协会（纽约为总部，分布在新英格兰、加州、芝加哥和休斯顿），华人软件工作者协会（加州硅谷），南加州华裔教授学者协会（洛杉矶）等等。当代华人移民的职业结构呈多元化，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比例，尤其在高科技领域更是出类拔萃，华人社团又快又多且活动频繁。华人专业团体一般属于向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登记注册、正式成立的非营

¹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en G.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3rd e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² Portes and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利组织，通常都有自己的网页。他们会在上面发布各领域的信息，如科学，工程设计，医学和财经。这些社团成员从几十到几千人不等。许多专业社团是跨国的，跟家乡政府部门，不管是国家级、省级还是地区级的，都有较密切的关系。他们也会分别在美国和中国举办年会或其它会议。

表三：美国三大华人聚居城市在册华人社团统计（2009 年）

种类	数量	百分比
传统宗亲会、同乡会、堂会	546	40
专业协会	146	11
校友会	142	10
文化组织	195	14
商会	74	5
政治组织	83	6
宗教组织	63	5
文体娱乐团体	66	5
社会服务组织	38	3
教育组织	17	1
总计	1370	100

资料来源：移民社团比较研究：中国部分。

校友会的发展也是华人社团的一大亮点，与传统的华人社团组织不同，校友会大多是以中国高等院校为单位成立的，很少以中国中、小学为单位成立的，这反映了当代华人移民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过去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农村，教育程度较低，许多人连中学都没念，二战前美国的华人社会也有校友会，但为数不多，那些校友会多数是以来源地的乡小学或县中学为基础的。新型的校友会旨在建立成员网络并且在成员中交换信息，他们的跨国活动主要是去支持各自的母校。

新发展的华人社团组织中还包括各类的商会，与过去唐人街的堂会不同的是，新的商会依赖传统的网络和跨国活动去开拓他们的事业。这些民间的商业社团组织大多参与跨国活动，且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较为广泛，他们意欲与美国经济政治融合。受访的侨领指出，他们站在全球经济的前沿，将自身视作“变革的推动者”（agents of change），并作为美国“通往太平洋沿岸的大门”而存在。这些商业社团组织希望能够促进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团结与交流，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也旨在保留和崇扬中华文化。

从表三这份清单中，我们挑选了其中 55 个知名度高，信誉卓著而且有定时活动的社团组织作为访谈对象，挑选的标准是基于两个假设，一是这些社团组织的规模一般有较强的能力与祖籍国的地方和中央政府建立对话，并参与跨国活动。二是这些社团的侨领一般有良好的信息渠道，熟悉本社团的特点与情况以及所在地其他社团的情况。我们以电话和面谈方式对这些社团的侨领进行了访谈，经过资料的汇总和分析，我们可总结出几个有意义的发现。第一，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社团具跨国的特征，与祖国家乡的各级政府保持联系；也有些社团组织更是为了跨国这个目的而建立的。第二，尽管跨国社团众多，但真正跨国的频率和活动内容各有很大差异。第三，跨国社团的成员不一定直接参与跨国行动，真正参与的社团成员仅占少数。一般说来，直接参与跨国行动者以已婚，已入美国籍，并在事业上已有所成就的男性中年成员为多。第四，跨国社团组织的跨国活动的影响有实质性的意义的，也有象征性意义的。

从实质性的层面看，华人移民社团组织的主要影响在于帮助移民适应和融入新家园的生活，进而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具体的说，社团组织为成员提供联谊的场所和机会，帮助成员建立社会网络，保持和重建与祖国和家乡的联系。这种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也间接的帮助移民创造和积累金融和人力资本。华人移民都有他们各自的“美国梦”，如拥有自己的住房，自己当老板，送子

女上名校，要圆这些梦不能光靠个人的努力，还需要丰富的社区资源。多种多样民间社团的产生不仅强化了华人社会的创造了良好的社区族裔环境。此外，跨国移民社团还协助成员在祖国寻找商机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协助成员为祖国经济发展做贡献，协助成员为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出力。从这个意义上，社团组织的跨国活动也可以理解为帮助移民立足美国，落地生根。从象征性的层面看，社团组织为成员提供了体现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平台。例如，侨领的身份不仅得到新家园社区的认可，也得到祖国各级政府认可。

4. 祖国的影响

1976 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逐渐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政府 1978 年开始实施经济改革开放的国策，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简称“国侨办”）以及相应的各省市的侨务办公室随之重新恢复其职能。从前对海外华侨华人不信任，将其视作潜在的特务或叛国者，现在则欢迎他们回国投资、置业和创业，并将其视作经济改革“支持者”、“推动者”和“先锋”¹。1989 年 5 月，国务院重申了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经济尤其在引进外资和先进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还放宽了留学生政策，从八十年代严格要求留学生回国到九十年代鼓励留学生来去自由，认为归国不是“报效祖国”的唯一途径²。

与此同时，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侨联”）也在文革后重新恢复。侨联于五十年代初成立，是与侨办平行、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群众组织。侨办和侨联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了相应的办公室，里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领国家薪水的公务员，他们的职责是处理与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及其在华亲属的有关事务，并与海外华人移民社团密切联系以促进华侨华人的跨国活动。除了在本国做好侨务工作，中国各级侨办和侨联的官员会定期到美国访问，加强与美国华人社会的双向联系，而这些访问活动一般由美国各个城市主要华人移民社团组织及其侨领来协调和接待。在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月一日的国庆日，中国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和四个领事馆（纽约、三藩市、洛杉矶和休斯顿）举行庆祝活动，设宴招待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华人移民社团组织的侨领、华裔企业家和专业人士。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持续增长，也导致国家侨务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从八十年代强调引资和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强调引智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海外华人的投资跨越地域的局限，从家乡向外围地区以及扩展，特别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带动了沿海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国家为了维持这种发展趋势，通过各级侨务部门的通力合作，定期出资举办各类专业性和商业性招商引资引智会议，各级党政领导人还亲自会见与会代表；还出资在中国和海外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各级侨办举行海外华人青少年夏冬令营，还有被政府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工作”的汉语培训项目。如海外孔子学院，到 2010 年六月，在美国的 37 个州已经成立了 64 所孔子学院，而 2005 年全美只有一所³。国家的介入大大加强了海外移民社团组织的网络关系，一方面支持华人社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鼓励移民落地生根融入接收国主流社会，另一方面促进海外华人社会之间及其与祖国之间的科技与文化的交流。总之，近年来祖国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不仅提升了国家形象，也有效地促进海外移民的跨国活动，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5. 变动中的华人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

与墨西哥裔移民社团一样，围绕着祖国国家和政党两条主线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制度，与海

¹ 见 <http://qwgzyj.gqb.gov.cn/qwhg/146/1346.shtml>（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浏览）。

² 见 <http://202.205.177.9/edoas/en/level3.jsp?tablename=1242702622613408&infoid=1253167200778185>（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浏览）。

³ Michael Chiu, “Map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U. S.” *US-China Toda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osted on June 8, 2010). [http://www.uschina.usc.edu/article@usct?map_of_confucius_institutes_in_the_u_s_14774.aspx] Access on May 1, 2011.

外各种类型的华人移民社团组织交织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有形而又有效的跨国网络，影响着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跨国移民社团对祖籍国的贡献除了传统的国际汇款和捐赠，近年来形成了些新模式。一般说来，新模式更多的是社团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而华人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也大多是以组织的形式或通过社团来进行的。同乡会、专业团体协会和校友会和其他民间组织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家乡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其他方面，尤其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和慈善事业等方面，如救灾扶贫，修路建桥、修建学校、儿童和老人文化活动中心，还兴办大学。广东省江门市的五邑大学就是由美国、加拿大、东南亚和港澳侨胞集资兴建的。五邑大学其中一栋主楼叫“十友楼”，如其名，是由十位海外华商出资而建¹。

移民跨国社团对家乡的影响，以往集中在为家乡修路，修桥，办学。现在则更为重视家乡的文化建设，如捐赠村委会办公大楼和公共文化设施，包括文化中心，图书馆，博物馆，老人中心，公园，还有寺庙和祠堂以及文化象征物（门楼、雕像、纪念碑等等）。移民社团的影响还超出“家”和“乡”。例如，社团帮助成员投资祖国经济建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投资高科技产业以及以智能资本为基础的专业行业（如高科技研发，高等教育，商贸中介，教育中介等）。当然，美国华人社团的跨国活动受祖籍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也与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的改变和强有力的物质支持分不开的。

总之，华人社团是美国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华人社会创造和积累族裔资本（包括社会、人力和金融资本）、帮助移民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结构基础。其主要功能乃受祖籍国和接受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华人社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今美国华人移民的跨国活动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组织行为，对组织来说，跨国社团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成员落地生根，而不是落叶归根，个人可以通过组织参与跨国活动，为自己社会上向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提供多一条有效的替代途径。

六、讨论：比较墨西哥和中国跨国主义社团组织

表四显示了墨西哥和中国两国及其在美的移民社会的背景特征，为我们以下的讨论提供依据。如同雄鹰与巨龙，这两个移民大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国政府对各自侨胞的态度都有过较大的转变——从怀疑和视之为敌到信任和视之为友并积极地培养他们对祖籍国的热爱与忠诚。这种态度的转变在中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国家以及各主要省市地方级的侨办和侨联的重新运作，首先重新落实了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华侨政策，把过去没收和占有的房产财产回归侨眷，鼓励海外华人华侨回乡探亲和投资。在墨西哥对移民态度的转变发生在九十年代初，联邦和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鼓励旅美墨西哥裔移民回国作贡献。福克斯（Fox）总统上台后，积极为旅美的墨西哥裔移民来往两国提供服务和便利，在 2002 年建立了 IME 移民事务咨询委员会，将这种积极态度变为行动，将有利与移民的政策转变推向高峰²。

值得注意的是，中墨两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刻意地去创造一种跨国场域。这种跨国场域一般是由移民自身与家乡亲友的密切联系而自发形成并以各种复杂的形式存在着的。但是，政府的介入却极大地扩展了这种跨国场域的范围，强化了它的作用，并扩大了它对祖籍国发展的影响。两国政府都从各自的侨胞对于热爱家乡的情结中和为家乡作贡献的意愿中获得了利益，从而间接地促进了数以千计的移民社团，因为政府一般与社团打交道。从分类的层面上

¹ 位于江门的五邑大学是海外华人出资建成的。该大学于 2010 年 9 月举行了一个关于“国际移民视野下的海外华人与侨乡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会址设在“十友楼”（Ten Friends Building）。顾名思义，十友楼是由旅居香港的十位五邑乡亲同心发起，捐资港币一千万元兴建的。五邑大学的“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也设在此楼。

² Escobar, “Migración y Derechos Ciudadanos”; Natasha Iskander, *Creative State: Forty Years of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in Morocco and Mexico*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看，华人社团的种类繁多，有传统的宗亲会、同乡会、地域性会馆和专业行业协会。而墨西哥裔的社团则以同乡会为主，近年大量涌现的社团也有相当数量的同乡会。正如艾斯科芭提到：

“在美国，墨西哥裔移民社团组织的一个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社团成员大部分来自农村，所以他们的组织类别几乎全都是同乡会 (hometown associations)。这些社团的组织形式大都仿效了来源地的乡或村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¹。

表四：中墨两国及其在美的移民社会的背景特征

祖籍国	中国	墨西哥
人口（2009 年）	13.4 亿	10.6 亿
城市人口比例	42%	67%
人均寿命	74.5 岁	77.4 岁
人均国民总收入（2008 年）	3300 美元	14400 美元
Gini 不平等指数	.47	.47
教育水平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5-64 岁成年人）	3%	16%
高中毕业学历	9%	33%
失业率（2007 年）	7%	3%
成年人就业人口比例	62%	63%
首都	北京市	墨西哥市
美国	华裔移民社会	墨西哥裔移民社会
国外出生的族裔人口（2008 年）	360 万	1270 万
2008 年度获永久居民身份的移民人数	80271	189989
占 2008 年度全美永久居民身份的移民人数的百分比	7%	17%
移民总人数排位（2008 年）	第二位	第一位
在业人口中持专业职位的比例	52%	5%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5-64 岁成年人）	50%	6%
家庭年收入中位数（2008 年）	66118 美元	36004 美元
贫困家庭比例	12%	22%
移民合法身份	大多数合法，少数无证移民	合法和无证移民比例相当
三大移民聚居城市	纽约，三藩市，洛杉矶	洛杉矶，芝加哥，休士顿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人口统计局，国安局²。

在社团组织的更高层次上，两国移民群体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华人移民的社团组织大多实行自治运作和管理模式，这些社团一般都有丰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如中华会馆及其下属组织，各类宗亲会和同乡会，还有许多现代的专业团体、商业协会和校友会都是如此，相对独立于祖籍国政府的控制。可是，自治运作和管理模式在墨西哥移民中比较少，尽管他们在美国的人口众多，他们的社团大多是以乡为主的同乡会，规模较小，资源贫乏。同乡会联盟虽然是移民社团组织中较高级的组织形式，但是联合会或同乡会联盟的建立很多时候都是在祖籍国的支持和领导下成立的³，这些移民社团联盟一般没有任何形式的自治运作，因为他们受制于墨西哥政府，实际上主要功能在于辅助祖籍国政府与海外移民社会的互动，在两地间传达信息，交流对话。此外，墨西哥移民中的专业团体寥寥无几，其他现代的新社团组织也不像华人社团组织那样有深度和广度，成员也不多（见表一和表三）。

¹ Escobar, “Migracion y Derechos Ciudadanos.”

²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03; Public Use Micro data, 2000 Census of Population;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Dep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08 Annual Report;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2001 Revision. New York: 2002; OECD Observer, *OECD in Figures 2009*, Supplement #1, www.oecd.org/publishing; J. S. Passel,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Immigration Trends,” Washington D.C.: Pew Hispanic Center Report, March 2009.

³ Goldring, “The Mexican State and Transmigrant Organizations”; Iskander, *Creative State*.

两国移民社团组织的差异不仅充分地反映了两国移民群体在人口素质上的差异（见表四），还预示着祖籍国政府与海外移民社团互动模式的差异。在这方面，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与侨胞和社团的互动中处于一个较佳的位置，因为移民及其社团相对独立，对祖籍国政府不存在很强的依赖性。他们不仅有丰富资源，还享有合法的移民和公民身份，受接收国法律的保护。而墨西哥裔移民社会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低技能农民背景的非合法移民，在接收国没有公民的地位和权利。因此移民对祖籍国的依赖性比较强。为了更好地与移民沟通和帮助移民，墨西哥政府的介入比较直接、更加积极主动，不仅投入的有形资源更多，而且体现在更多的方面，包括实施“1+3”项目（tres-por-uno program）来鼓励移民为家乡多做慈善和其他福利事业，出资在接收国建立社区学堂（plazas comunitarias）为移民及其后裔提供英语、西班牙语以及高中课程的学习和培训，还给无证移民颁发一种特殊的身份证（matricula consular）以方便他们在接收国的生活（譬如他们可持这种特殊的身份证到美国的某些银行开户）。而中国政府不需要采取这种直接的鼓励措施，除了孔子学院的语言培训外，北美华人移民一般都不需要这类服务，因为大部分华人移民受过良好教育，在美国拥有合法身份和多元的职业。即使同是语言培训也存在很大差异，墨西哥的做法是给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移民教授基本的英文读写技能，而中国的孔子学院的宗旨是向土生土长的华人和外国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

中国政府的介入更多的是辅助，其主要目的不在仅仅在于引资引智，还在于通过强化海外华人和侨胞的爱国之心以及培养与颂扬他们拥有的共同文化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¹。后者是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比如在出资协办世界同乡会恳亲大会和各类国际华人专业年会，主办节日庆典和宴会，资助国家文艺团体出国为侨胞表演，在权威大会上颁发奖项给著名的科学家、企业家和侨领等等。由于华人移民社团组织和中国政府都不是急切需要金钱上的交换，因此荣誉与认同日益成为跨国交流中的“无形财富”。

不过中墨两个国家也存在着相同之处，那就是祖籍国和海外移民社会的合作受到各自共同利益的推动，这种共同利益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社会地位方面的。对政府而言，移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通过个人汇款、投资以及组织化的慈善活动对祖籍国经济发展做贡献，而且他们也是“祖国在海外的脸面”，能够帮助祖籍国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形象与获得相应的地位。而对于移民尤其是移民社团组织的侨领而言，来自祖籍国政府的赏识进一步凸显了他们所在社区和社团组织以及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与合法性。例如许多移民出国之前在家乡默默无闻，并没有受到社会的关注，但可以他们在跨国场域中可以通过社团的领导人的身份或社区侨领的身份在家乡成为受人尊敬、有显赫社会地位的大人物。这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既导致了更多新跨国移民社团组织的涌现，也加强了已有移民社团组织的扩展和团结。

七、结论

如文章的开头所述，以往研究发展学的文献很少关注国际移民跨国活动这一社会现象。即使是现存的有关研究，大体都围绕如下一些主题展开，例如国际移民是国家不发达的原因，或者是结果——国际移民导致输出地区的人口骤降和精英人才的流失和脑力枯竭以及经济衰退²。不过，大量的移民国际汇款改变了这些观点，因为国际汇款可以减轻祖籍国的贫穷状况，提高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也随大流地认为移民国际汇款的潜力有如未开发的

¹ Min Zhou, “Traversing Ancestral and New Homelands: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metown Development in China.” Final project report (Center fo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0).

²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 *Labor 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Sergio Diaz-Briquets and Sidney Weintraub,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Mexico and Caribbean Basin Countri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金矿，认为这些汇款大大地有利于融资，办开发经济项目，以此取代为数不多的国际援助。移民输出国的学界趋向于前一种观点，强调移民出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认为国际移民会造成输出地人口和经济的大幅下降，而且指出国际汇款可能会让祖籍国政府和社会精英推卸消除本国贫穷现状的责任。因此，移民输出国只会强化了社会不平等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而且让国家经济发展滞后，并不能够帮助国家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不发达的问题¹。

一个更为折中的观点则认为，国际移民是否带来负面或正面的后果，依赖于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移民输出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财政实力以及移民类型。永久迁移型的国际移民总体上确实存在着很多负面后果，因为它可以导致输出地人口的严重下降以及人才流失。此外，永久迁移型的国际移民一般举家迁移，其往家乡汇款的动机就不复存在了。而循环迁移型的国际移民则会带来相反的结果，他们会透过定期的跨国活动把资金、信息和技能带回家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输出地政府的积极态度和实际支持，就能够将这些资金和技术用于更合适的渠道，以利家乡发展²。不过，也有部分移民会重返祖国。一般的解释是因为海归者觉得他们在国外的就业机会不佳，或者在那里的生活不如意。在这种情形下，输出国政府很难扭转人才流失的现象，因为较难说服海外侨胞中的佼佼者永久归国³。

进入跨国主义时代后，情况就有所不同。海外移民跨国社团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表明，即使是举家迁移、在国外永久定居的同胞一般都不会完全放弃他们跟祖籍国的联系。如上所述，那些在接收国已经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那些经济上和法律上都得到保障的移民，更倾向于参与跨国活动。现今交通工具的发达和便利，使永久迁移型的国际移民定期往返祖籍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不仅扩展了跨国场域，也有利于他们在跨国场域中施展，使他们身在国外也会参与到祖籍国家乡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来，并为祖籍国汇入有形和无形的宝贵资源。

像墨西哥和中国这样具有敏锐嗅觉的政府早已发现移民跨国主义实践的潜力，所以现今的政府放弃了期望和说服具备专业技术和高级管理经验的人才归国，而积极地鼓励他们（连同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建立和参加跨国社团组织和参与跨国活动。从移民群体的规模上考虑，海外移民的跨国活动所带来的发展潜力是很显著的。如前所述，墨西哥侨乡数以百计的公共事业项目都是来自移民的捐赠。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海外华人的投资是影响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比较两个国家，中国显然拥有更多的优势，因为美国华人移民人口的社会阶层类别更为多样化，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技术人才与企业精英。可以说，中国政府是当代第一个祖籍国加入这种跨国场域的，移民的跨国关系可以在拥有众多资源的中国政府的积极辅助下和移民社团组织的带动下得以有效地培植，并在实践中通过制度将旅居国外的专业技术人才与企业精英往返家乡的行动固定下来。

当然，美国的墨西哥裔移民社团组织有着巨大的潜力还未开发。在绝对人口数量上，在美国的墨西哥裔的人口相当于或者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小国家的人口，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有如巨龙的墨西哥可以利用人口的巨大潜力来改善其侨胞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推动家乡的经济发展。比如，墨西哥裔移民中的专业技术人才的绝对人数也是很可观的，尽管他们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被平均数给淹没了。墨西哥还可以组织和引导墨西哥裔移民的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到家乡的科

¹ Raul Delgado-Wise and James M. Cypher, "The Strategic Role of Mexican Labor under NAFTA: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Economic Integr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610 (2007): 120-142; Stephen Castles, "Understanding Global Migration: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 (2010): 1565-1586.

² Massey et al., *Beyond Smoke and Mirrors*; Alejandro Port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conciling Opposite View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2 (2009): 5-22.

³ Diaz-Briquets and Weintraub,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Mexico and Caribbean Basin Countries*; Cheng and Bonacich, *Labor 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学、教育以及慈善活动中。总而言之，发展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不应该继续把国际移民看成是一个国家落后的标志，也不能低估国际移民汇款和其他正常的跨国活动的作用，更不能忽视跨国社团组织日益复杂的网络以及他们与国家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在任何关于移民祖籍国发展的研究中，我们高度重视移民社团组织的重要性。墨西哥和中国，都正在用各自的方式显示出这种组织的潜力是如何被开发出来的。

【论 文】

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 ——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1]

周敏^[2]，王君^[3]

【摘要】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教育。教育被认为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无论身处西方或东方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子女教育问题对于中国新移民家庭来说都是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的比较分析显示，美国华人家庭面临着种族歧视的结构障碍以及文化和代际的双重冲突，新移民除了依靠自身能力和经济社会背景，还通过华人社区的社会支持机制来缓解家庭内部的矛盾和代际冲突，使移民子女取得教育的成功。而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新加坡，择优录取的教育制度和中国的应试教育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新移民在子女教育上面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制度和结构而引致的机会缺失，他们更多依靠自身的移民的超高端筛选，充分利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跨国家庭资源应对新加坡的考试制度和过早分流带来的激烈竞争和焦虑。本项研究的结论是，海外华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除了新移民由于超高端筛选而有较高起点这个因素外，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有重教育的儒家文化和虎妈式的严管良教，还与多层面的移出环境和移入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和社会支持机制密不可分。

【关键词】中国新移民，超高端筛选，教育期望，文化冲突，代沟，族裔资本

一、引言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教育。传统的中国社会重视读书，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贫苦出身的读书人可以靠自己的才学和“十年寒窗苦”，通过科举制度走上仕途，光宗耀祖。现代的中国社会也同样重视教育，视教育为取得薪酬优厚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阶梯。中国当今的高考制度，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使成千上万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通过考试被大学择优录取，为他们实现个人的职业梦想铺平了道路。在中国，教育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是父母养育孩子的最重要的责任。子女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是衡量父母社会地位的标准之一，也

¹ 本文曾刊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1至9页。

² 周敏（Min ZHOU），社会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³ 王君（Jun WANG），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是衡量育儿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在海外，华人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家传统的孝顺、好学、刻苦、自律通常是海外华人教育子女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不少华人移民父母说自己飘洋过海、含辛茹苦、日夜操劳是为了子女能够顺利地融入移居国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丰衣足食，出人头地。^[1]

海外华人被视为全球最重视教育的族群之一。在当今很多国际移民的接收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华人青少年都在教育领域脱颖而出，出类拔萃，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教育成就。^[2]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移民群体成员及其子女取得向上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较为公平、可预测性强、且卓有成效的途径。教育成就的客观指标，如毕业院校、学历、专业和平均成绩等关系到移民及其子女的职业前景和经济收入，是直接影响移民在移居国生活稳定、融入和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对华人移民家庭来说，子女的教育无疑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议题。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华人移民父母大多对子女的教育给予极大的关注，期望子女取得教育的成功，以保证未来职业的顺利发展。移民父母要想实现对子女教育的超高期望，甚具挑战性。原因是，移居海外导致移民的家庭结构深刻变化，家庭内部不仅有代际冲突，还有跨文化冲突。此外，移居国的教育体制，主流社会环境和族裔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语言文化问题等，都对华人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的中心议题是：在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移居国社会环境中，中国新移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否不同？他们面临着哪些挑战和制度限制？他们运用哪些社会支持机制来应对挑战、解决困境，从而实现预想的教育期望？本研究以美国洛杉矶和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家庭为例，根据参与观察，大众媒体报道，以及有关历史和政策文献等资料的分析，从父母的角度去探究此议题。

二、新移民产生的背景：移出国与移居国因素

学界对于“中国新移民”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来说，这一移民群体泛指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移出的国际移民，这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多元的群体。根据联合国和国内学者的数据，1978年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移出的国际移民高达一千万人。^{[3][4]} 这些中国新移民虽遍布世界各地，但多数流向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以及亚洲发达国家，如新加坡和日本等。关于国际移民在移居国的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入研究的一个影响力较大的分析框架，是关注祖籍国移出环境（contexts of exit）与移居国接收环境（contexts of reception）中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互动所产生的影响。^[5]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祖籍国移出环境的考量因素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等宏观因素，还包括移民社会网络和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等中观和微观因素。移居国移入环境的考量因素包括移居国移民政策，主流社会的结构与华人族群在其中的地位，华裔社区组织的发展以及个人、家庭和族群的社会经济背景等。

（一）1978年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移民潮

就移出环境而论，当代经久不息的中国国际移民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直接结果之一。这一轮

¹ 周敏，“美国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² Jennifer Lee, Min Zhou,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5).

³ 王望波、庄国土，《2009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⁴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Total Migrant Stock at Mid-year by Origin and Destination* (Washington, DC: UN DESA, 2017).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7.shtml>, access on December 31, 2018.

⁵ Alejandro Portes & Ruben G. Rumbaut, 1990,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大规模的移民潮由几个方面的结构因素促成。第一，改革开放使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1980年代，超过四分之三的外资来自于海外华商。海外华商资本的注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激活了休眠多年的海外亲属联系和跨国移民社会网络。第二，中国政府撤除了国际移民的制度障碍，放宽了取得护照的条件，简化了出国手续，允许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合法移民海外。第三，中国放宽了海外留学和研修政策，资助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海外学习和学术交流，同时也允许国人自费到海外留学。最初自费留学的资金基本上来自留学生的海外亲属。1990年以后，不少经济能力较强的家庭也有能力资助子女出国留学。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后，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海外投资迅速增长。这些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结构因素，加上一些接收国放宽移民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新移民潮推波助澜，使之经久不息，方兴未艾。^[1]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移居海外的老华人移民相比，中国新移民有几个明显不同的特征。一是来源地更为广阔，早期的老移民大多源自广东和福建侨乡。当今的新移民则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大小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背景更为多元。二是早期的老移民大多是仅有小学文化程度，还有文盲的农民和低技能劳工，而今新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远远高于祖籍国总人口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一些移居国总人口的平均水平）。如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移民的比例，占在美国的中国新移民的50%以上，占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的75%以上。三是居住模式更为分散。即使还有少数新移民仍然聚居于唐人街和华人移民聚居郊区（美国），大多数新移民混居于中产阶级社区。四是迁移目的更倾向于定居。早期的老移民移居海外是为了打工谋生，持暂居心态，希望最终能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而今，新移民即便有跨国流动的机会和实践，他们大多是定居者，努力融入当地社会，落地生根。

（二）移入环境：美国与新加坡比较

就移入环境而论，美国是中国新移民首选的移居国，新加坡也是中国新移民较为偏爱的移居国之一。但两国的移民政策、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族裔社区的结构以及族群社会地位都差异较大。美国是中国新移民的最大接收国，吸纳了中国新移民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移民法修正案，废除了不平等的配额制度，确立了家庭团聚和技术移民的优先原则，由此引发大批亚洲移民包括中国新移民的涌入。美国国际移民政策的放宽，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上前文提到的有利的移出环境因素，共同推进了中国向美国的跨国人口流动，使中国新移民浪潮四十多年来汹涌高涨。中国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美国华人社会的结构和人口成分。据统计，美国的华裔人口从1960年的24万人激增至1990年的160多万人，2010年的380多万人，并在2016年突破500万人。^[2] 当今的华裔美国人在教育、家庭收入和职业成就等客观社会经济指标的平均值已经超过欧裔白人，因而受到公众褒奖，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但同时他们也被视为“永远的外国人”、“不公平的竞争者”和不同形式的社会歧视的对象。^[3]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特指1990年新中建交后移入新加坡的中国移民。^[4] 1965年国家独立后，新加坡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从“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跨越。1980年代末，新加坡面临科技人才紧缺和自然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的严峻挑战，两者都直接威胁到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因此，政府紧急调整经济和移民政策，例如提供奖学金吸引中国留学生，通过引进人才来解决这些困境。宽松的国际移民政策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新加坡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非本土出生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

¹ Min Zhou,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² Min Zhou,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s*.

³ Min Zhou, "Are Asian Americans Becoming White?" *Contexts*, Vol. 3, No. 1, 2004, pp. 29-37.

⁴ Hong Liu, "Transnational Chinese Sphere in Singapore: Dynamics, Transform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1, No. 2, 2012, pp. 37-60.

比例不断加大。尽管在吸引国外人才和留学生的政策上并未明文限制某个族群，但是基于历史、种族和文化的因素，加上 1990 年以来新加坡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中国新移民人口大幅增长。新加坡的主流报纸《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曾报道，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已从 1990 年代的数千人上升到当今的 100 万人。这些新移民大多数是已经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或加入了新加坡国籍的中国留学生、技术人才和投资移民。^[1]

新加坡深受英国殖民政治和文化以及国际移民历史的影响，是一个糅合了东西方文化但以华人为主导的多种族社会。出于种族和谐的需要，新加坡政府全力建构“新加坡人”的国民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虽然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源自相同的文化传统，并且因移民政策的超高端筛选（hyper-selectivity²）^[3] 而成功融入了国家的主流经济，但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融入程度高低不等，仍然保留了浓厚中国特色的文化习俗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0 年至 2010 年的二十年间，中国新移民的大量快速涌入，对新加坡当地社会的就业、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造成了巨大冲击，引起了新加坡本地人的不满和排外情绪。一些新加坡华人视中国新移民为“他者”（the other），既不同于本地华人，也不同于来自东南亚其它地区的华人移民。无独有偶，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以华族为多数族群的多元社会中的“他者”身份，与美国华人（包括新移民）在华族为少数族群和白人至上的社会中的“他者”身份，都同样受到本土文化和社会的排斥。

三、中国新移民在移居国所面临的挑战

（一）对子女的共同教育期望

无论是在以西方基督教新教文化为主导的美国社会，还是在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加坡社会，中国新移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没有明显的差异。他们都传承了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思想，希望子女勤奋刻苦、学业优异，将来在职场中获得较好的职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在美国，华人移民家庭把教育当作子女向上流动唯一有效的途径，希望子女克服在移居国社会面临的结构障碍和种族歧视，通过个人的努力和选择实用学科，找到一份高薪的稳定职业，最终在主流社会立足。虽然美国华人新移民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多样化，但他们都对子女的教育抱有极高期望。美国华裔二代的学业成绩显示出与经典社会地位获得理论（status attainment model）相悖的结论，即无论移民父母的经济社会背景如何，子女的学业成就不仅优于其它移民族裔，还优于本土白人学生的平均水平。^[4] 这已经被证明是华裔移民子女学业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5][6]} 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同样重视子女的教育，虽然这也有儒家传统的因素，但新加坡政府倡导的精英主义和唯才是用的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加坡教育考试制度和教育竞争的激烈性。子女教育是很多中国新移民移居新加坡的原因和目的，他们不仅凭借自身优秀的教育、收入和职业背景在新加坡取得了较好的职业机会和中上层的社会地位，他们更期望和相信子女将来能够通过优秀

¹ 周敏、刘宏，“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1-19 页。

² 超高端筛选（hyper-selectivity）是李智英与周敏在《美国亚裔成就悖论》（*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在某移居国的某个移民群体的平均教育水平（大学本科四年以上的学历）既高于移出国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移入国的平均水平。

³ Jennifer Lee & Min Zhou,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⁴ Min Zhou & Carl L. Bankston III, *The Rise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6).

⁵ Ruth K. Chao,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Vol. 65, No. 4, 1994, pp. 1111-1119.

⁶ Esther Lee Yao, “A Comparison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Asian-American and Anglo-American High Achiev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26, No. 3-4, 1985, pp. 198-208.

的海外教育背景和教育资本,获得理想的职业和全球流动的机会。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对子女的期望同时也充满矛盾。具体体现在:父母一方面希望子女在移居国接受教育,能够尽快的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希望子女能学习和继承华人的语言文化。他们运用各种机会和资源向子女灌输中华文化传统,加强族裔身份认同和提高母语能力。对于移民父母来说,这不仅仅是希望子女保留中国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理性和实用主义的选择,他们认为这可以帮助子女提高未来在祖籍国、移居国以及全球职场中的竞争力和社会流动,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二) 在社会融入过程的共同困境

移居海外是个充满挑战和压力的过程,移民所经历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他们及其家庭在移居国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以及工作与生活。中国新移民在适应和融入移居国社会时主要面临以下的困境。

1. 语言和文化障碍

在独尊英语的美国社会,英语水平欠缺是影响中国新移民适应和融入的主要障碍之一。不谙英语或操较重口音的英语不仅时常导致新移民在职场和社会生活中被歧视和边缘化,在家庭中也出现父母权威减弱、子女中文水平低下的现象。在新加坡,虽然新加坡社会以华人为主导,也沿袭着儒家文化中的孝顺和遵从长辈等传统。然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加坡社会以英语为主要的官方语言,其社会制度建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均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特点,教育、商业和法律实践都沿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惯例并偏向使用英语。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人与早期的华人移民和现代的中国新移民更为不同,他们强烈认同“新加坡人”的民族国家身份,对祖籍国中国基本没有归属感,缺乏华族文化认同,华文语言和应用能力日渐减弱。尽管中国新移民具备移民政策高端筛选的优势,拥有相对优秀的平均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职业背景,但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仍处于不利的地位,需要不断地调整 and 适应新加坡独特的文化环境。

2. 移居国社会的结构障碍

尽管中国新移民在美国和新加坡分别处于更加开放、宽容、平等的社会大环境,但是两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仍然使新移民经常遭遇明显的或隐性的社会偏见和种族歧视。他们的专业文凭、职业经验和资质往往不被认可,同时,他们缺乏族裔关系网络以外的大社会的制度支持,导致新移民初到移居国时处于弱势地位。对美国的中国新移民来说,不仅要努力工作迅速适应移居国的职场和社会,还须通过亲身的体验和经历,教育子女加倍努力,避免蒙受社会歧视和制度的限制。^[1]此外,中国新移民父母还特别强调子女要克服与主流社会白人子女竞争时作为少数族裔的劣势,以双倍、甚至多倍的优异成绩来应对社会竞争。^[2]在新加坡,中国新移民迅速大量涌入,对新加坡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引发了本地人对中国新移民的厌烦甚至怨恨情绪,加深了原已存在的新移民“他者”弱势地位和社会歧视。近年来,新加坡移民政策迫于公众压力逐年收紧,根据移民的教育、职业、收入、居住年份等因素严格区分他们在教育、住房、职业等方面的福利与机会,为新移民的移居和适应设置了更多的结构障碍和制度性约束。

(三) 中国新移民家庭结构和内部关系的变化

1. 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沟”问题

移居海外中断了传统的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结构及其社会支持网络,父母管教和约束子女的能力也因文化和语言障碍而被削弱。二战后,唐人街内的大多数华人移民家庭或是隔洋

¹ Barbara Schneider, Yongsook Lee, "A Model for Academic Success: The School and Home Environment of East Asian Students,"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1, No. 4, 1990, pp. 358-377.

² Sau-Fong Siu, "How Do Family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ffect Children's Education Achievement? The Chinese-American Experience," *Equity and Choice*, Vol. 8, No.2, 1992, pp. 46-49.

的“分裂家庭”(split households),或是虚构家庭(fictitious family),完整的核心家庭为数不多。^{[1][2]} 主流社会歧视华人,在学校、职场以及社会等方面设置了各种种族隔离的障碍。华人父母别无选择,为使其子女不受种族歧视的直接伤害,两代人被迫生活在唐人街狭小的族裔空间里。他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与华人社区有着各种密切的族裔组织关系,相互依存,对族裔社区既依赖又受控,价值观和言行举止均受到社区文化的制约。当时的华人家庭内部虽有潜在的代际和文化冲突,但族裔社区的特定环境和社会关系,避免了冲突的发生或使冲突得以缓解。1960年代的美国平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在法律层面禁止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为华人移民及其子女融入主流社会、取得向上社会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移民的家庭结构以完整的核心家庭为主。新移民不再受困于唐人街和族裔经济,大多数人散居在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社区,就业于主流职场。但无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大部分的新移民家庭都是双职工家庭,父母很少有时间陪伴照料子女,致使不少孩子成为脖子挂着钥匙的“钥匙孩子”(latchkey children),课后单独在家。父母与子女间缺少必要的沟通,父母的权威因为生活在新的英语社会环境里而大打折扣,代际和文化冲突在缺乏族裔社区缓冲的情况下屡见不鲜。^[3]

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移民家庭的“代沟”(generation gap)和代际冲突问题尤为突出。在美国,华人移民家庭强调长幼尊卑、孝顺和尊重权威等儒家传统,与西方家庭崇尚的自由平等、个人奋斗等价值观格格不入。中国新移民家庭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移民父母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子女之间同化步调的不一致,以及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导致了代沟的形成。以如何定义“美国梦”为例,大多数的成年新移民、特别是为人父母的新移民忙于工作和养家糊口,对“美国梦”的定义比较实际,即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能当上老板,子女能进名校。虽然他们十分努力寻求打入主流社会,但大多朝着这三大目标而奋斗。^[4] 而他们的子女们则更为雄心勃勃,不仅追求有形的和物质上的成功,更要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他们追求的是如何成为与众人无异的不受歧视的美国人。还有就是能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子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成长,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父母的期望大相径庭,这主要由移民父母与子女的文化鸿沟所导致,文化鸿沟则进一步导致了家庭代际关系紧张,加剧了两代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2. 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家庭的跨国隔代抚养现象

中国新移民大量涌入新加坡是1990年代以后的现象。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人口成分不像美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口那样多元化,主要由留学生、专业人士和投资移民的中产阶级高端人才构成,年龄结构偏中青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中国新移民的家庭由夫妻两人转变为夫妻和子女构成的逐渐稳定的核心家庭。在养育婴幼儿和学龄孩子的阶段,这些新移民家庭特别需要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初为父母的新移民希望给子女提供成长和教育的稳定环境,他们通常会在这个阶段决定转变国籍、取得新加坡的公民身份而长期定居下来。但由于新移民在新加坡缺少扩大家庭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双职工的时间和经济安排不能满足照顾孩童的需要,新移民往往要求助于在中国的父母,让双方父母持探访签证轮换来新加坡照看孩子。尽管新加坡有为18个月以上的婴儿开设的幼儿园,也有雇用外籍女佣的社会惯例,但新移民倾向于选择家庭的帮助和支持,目的是在经济上和孩童的养育和安全上得到多一重保障。这种跨国隔代抚养现象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家庭中

¹ Evelyn Nakano Glenn, "Split Household, Small Producer and Dual Wage Earner: An Analysis of Chinese-American Family Strateg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45, No. 1, 1983, pp. 35-46.

² Min Zhou,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³ Min Zhou, "Negotiating Culture and Ethnicit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am Mahalingam, e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Immigran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6), pp. 315-336.

⁴ 周敏,“美国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

非常普遍，是新移民和自己父母一代理性安排的结果。新移民的父母跨国来与子女相聚，目的不是颐养天年，而是承担家庭责任，辅助子女的核心家庭在移居国建立新生活，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职场打拼，加速向上社会流动。由此，这种三代共同生活的家庭代际关系更为复杂，除了新移民与子女的这层关系，还加上新移民与父母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父母跨国流动的暂时性、老中两代人养育观念和方法的差异、以及共同生活而引起的分歧和冲突等。

与美国的中国新移民家庭对比，新加坡的新移民家庭有几个不同的特征。第一，新移民夫妻大多是高教育和高技能的专业人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第二，持永久和临时（工作）签证的中国公民的比例较大，因而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不确定性较高。第三，子女大多尚处幼年和童年阶段，青少年的比例较低。第四，三代的扩大家庭比例较高，但新移民子女的祖父母大多属于暂居性质。

四、移居国的制度限制与社会支持机制的作用

美国和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都期望子女能上名校，成龙成凤。这种超高的教育期望能否实现，受到两国不同的教育制度、社会环境和社会支持机制的影响。

（一）移居国的教育制度和大社会环境

1. 美国的教育制度及“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

美国实行自由主义开放式的教育制度，没有全国性的中央教育体制，也没有课程设计、教材、教学方法和考核制度等方面的统一标准。美国的教育制度鼓励学生发现自我，发展自我，注重教育的过程，注重动手能力和批判性分析思维的培养。家庭和学校都相信天赋和个人能力是个人学术成就的决定因素，主张因人而异的人性化教育，分数和名校学位不是衡量教育成功的唯一标准。中国新移民一方面充分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则限制子女的学业选择，要求他们选择最为实用的学科，期望子女通过勤奋努力获得最好成绩。重视教育且经济社会背景较好的中国新移民，能够选择好的学区，充分利用所属的公立中小学，使子女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在购买房产时重点考虑“学区”因素，就是学区制对移民家庭的教育策略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美国，由于国际移民的超高端筛选，华人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显著的提高。根据 2000 和 2010 年美国的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来，华人族群的教育、家庭收入和职业成就等指标的平均水平不仅远远高于美国总人口的平均水平，也优于白人族群的平均值。^[1] 华人子女以其优异的教育成就沿着社会阶梯迅速向上流动。社会、学校和媒体也因此而把华裔（和其他亚裔）称之为“模范少数族裔”，形成新的刻板印象。这无形中造成了社会对“模范少数族裔”的华裔不平等的评价标准和不现实的期望，强化了他们天生就适合从事数理化科研和工程技术的社会偏见。此外，这些观念不仅给亚裔、包括华裔子女追求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以外的职业制造了实际和潜在的障碍，还迫使亚裔族群和家庭本身对下一代的期望也更多的局限在被主流社会公认的适合亚裔的领域，把在这些领域的学业成就当作将来职场就业成功的敲门砖。^{[2][3]} 移民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相关问题也因这种局限性而产生严重的焦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使华人父母认为其子女必须大幅超越白人，才可能获得与普通白人的同等的机会和职位。另一方面，华人父母认为名牌大学的文凭是将来获得职场高薪工作的首要条件。由于名校录取亚裔（包括华裔）的名额有限，亚裔学生之间的竞争使考量标准更为严格、要求更高，要想在同等优秀的学生中脱颖而出，必然

¹ Jennifer Lee & Min Zhou,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² Jennifer Lee & Min Zhou,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³ Min Zhou, "Are Asian Americans Becoming White?"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时间与金钱，这无疑加剧了原已激烈的教育竞争，加深了华人移民家长的焦虑。

2. 新加坡的教育体制及其对中国新移民的压力

新加坡政府采用实用主义的策略设计教育制度，信奉精英主义，采用唯才是用的原则，通过考试和分流制度来因材施教，导致家庭、学校和社会把高分数和名校学位与教育成功等同起来，大家都认为只有努力和勤奋才是取得好成绩的决定因素。虽然教育分流和竞争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为经济发展服务，但也造成了人们过度参与教育竞争和焦虑的社会环境。例如，新加坡被称为“补习国家”（tuition/enrichment nation）¹，私人补习产业即“影子教育”产业（shadow education industry）发展成熟，能满足不同经济背景家庭的需要。新加坡统计局 2016 年的数字显示：新加坡家庭用于课后补习的投资超过 11 亿新元，趋于 2005 年 6500 万新元的两倍；120 万个家庭的孩子要去补习中心学习，占总家庭数的 90%；40% 的学龄前儿童会参加补习，上小学以后，补习的学生则达到 80%；介于 13-19 岁的孩子中，85% 的小孩每周要课外补习 4 小时以上。² 考试和过早的分流，包括小学三年级的“天才班考试”（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 GEP）和小学六年级的会考（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在教育路径上对孩子未来的机会和资源的获得至关重要，因此，新加坡家庭和父母（包括本地人和移民）都会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开发中，成为教育竞赛的参与者，无形中加剧了“怕输”（kiasu）的社会心态³。

激烈的教育竞争和焦虑的社会环境，使新移民更加重视和强调教育结果。移民父母们认为，如果在教育分流中落败，必然会导致子女失去优越的教育资源和学业前途，即使将来有机会迎头赶上，也会需要更多倍的时间和努力。另一方面，慢流的孩子会被贴上能力和智商较差的标签，未来只能成为新加坡社会精英的追随者和服从者。新移民虽然具备超高端筛选的优势，却缺少主流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缺乏社会网络的支持。同时，移民身份对教育机会和资源的限制，也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为了应对教育考试中重要的分流（GEP 和 PSLE），新移民家庭和父母不得不把子女教育，包括中小学、甚至学前教育，作为“社会工程”，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使很多父母处在焦虑甚至痛苦当中。

（二）社会支持机制

由于美国和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和主流社会环境不同，新移民在子女教育方面虽然有相同的教育期望和焦虑感，但他们的应对策略因地制宜，通过不同的社会支持机制达到预想的效果。

1. 美国：基于族裔社区的社团组织和社会网络

在美国，族裔社区的有形和无形的教育资源成为中国新移民家庭应对挑战的重要社会支持机制。⁴ 随着华人社会的转型，华人社区内服务于华人家庭和子女的非营利社团组织迅速发展。首先，华人社团组织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可以帮助华人父母在族裔社区的环境中对子女进行华族文化教育，强化家庭价值观、处世准则以及行为规范。华人社团组织中最重要的非营利组织之一

¹ “Tuition Nation.” *The Straits Times*, July 04, 2015. <http://www.asiaone.com/singapore/tuition-nation>, access on November 26, 2020.

² Amanda Wise, “Behind the World’s Best Students Is a Soul-Crushing, Billion-Dollar Private Education Industry” (December 12, 2016), <https://qz.com/860356/pisa-singapores-competitive-private-tuition-system-helps-students-ace-the-worlds-biggest-education-test>, accessed on November 26, 2020.

³ “怕输”来自闽南语 kiasu（惊输），特别指当代新加坡人由于生存环境狭小和资源缺乏产生的危机感、焦虑和攀比、以及从众的心理和行为等。参见《联合早报》社论：改变怕输心态先从自己开始（2018 年 8 月 1 日）<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180801-879771>，浏览时间 2020 年 11 月 26 日。

⁴ Min Zhou & Xiyuan Li, “Ethnic Language Scho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Vol. 100, 2003, pp. 57-73.

——中文学校，不仅满足华人父母对子女母语教育的需求，同时也开设其它的学习科目，如中国历史、文学、诗词、民乐等等，以利于华人子女进一步了解族裔传统文化和构建族裔身份认同。第二，华人社区以及各类社团组织的发展，也为华人父母提供了相互交往的族裔空间，既帮助他们重建族裔社会关系网，加强社会资本积累，也加强他们对族裔社区的归属感以及对社区认可的社会流动目标、途径和行为准则。美国华人的社会关系网的阶级成分十分多元，既有已经融入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成员，也有被隔离在唐人街和族裔经济里低收入劳工，也有企业家和老板。跨阶级的社会交往有利于传递教育信息和分享教育资源。对于青少年来说，族裔社团和中文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的族裔社交环境，扩大了他们校外的朋友圈，也加强了他们的华裔身份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同族朋友的共同经历也让他们把来自父母的压力和代际冲突转化为刻苦读书的动力，改变了衡量他们学业成功的参照群体（从欧裔白人转为华裔）。第三，华人社区里除了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外，种类繁多的为移民教育服务的营利性商业团体，如课外补习班，才艺班，大学预备班等等，这些应运而生的族裔经济的新行业，迎合了父母害怕子女“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进一步刺激了父母对子女课外补习的需求。这些基于华人社区丰富的有形和无形的族裔资源，不仅为新移民的基本生计提供了帮助，还可以辅助移民子女取得教育成就，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和向上流动搭桥铺路。^[1]

2. 新加坡：新移民家庭的资源与跨国资源的调动

与美国的华人新移民相比，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则更多的依靠自身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包括良好的教育背景，职业状况和收入水平，以及可调动的家庭资源（如父母辈的支持）和跨国资源（通过跨国的职业、商务和社会文化活动所获得的相关资源、资讯、机会等等），来应对子女教育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压力。新加坡移民政策的二分性和筛选性规定，只有高教育、高职业和高收入的专业技术移民才是新加坡政府希望引进的移民，才能得到 Employment Pass 或 S-Pass 的身份。中国新移民具备这种超高端筛选性，拥有较强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是他们抵达新加坡时就具备的优势，因而能够为自身和子女在移居国社会适应和发展创造更高的起点，客观上为移民个人和家庭的向上社会流动奠定了基础。

为了应对激烈的教育竞争，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借助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本，秉承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思想，鼓励和鞭策子女刻苦学习，通过良好的教育在移居国社会获得稳定和高薪的职业，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使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在新加坡的教育考试和分流制度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中国新移民自身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可以全力投资于社会上已有的公共资源（公立中小学）和私人教育资源（影子教育产业）。例如，为了选择好的学校，新移民通常会购买毗邻名校的房产，以保证或增加子女进入名牌小学和中学的机会。此外，新移民为课后补习不惜投入大量的金钱，促使子女超前学习和拔高学习，参加各种价格不菲的才艺班和兴趣班等等。这种追求分数和应试能力的做法，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加坡的教育竞争激烈，家长们不得不去适应现行的教育制度，因而往往随波逐流，从众而为，以求在教育考试的重要分流节点给孩子的胜出增加砝码。得益于本身大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新移民还具备人力资本的优势。因而他们能给在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中成长的子女提供亲历亲为的辅导和支持，未来还有能力帮助和指导子女选择大学、专业和职业发展方向等等。

五、结论

本研究揭示，无论身处西方或东方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子女教育

¹ Min Zhou & Xiyuan Li, "Ethnic Language Scho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问题对于中国新移民家庭来说都是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透过子女教育的问题，可以了解当代中国新移民在适应和融入移居国社会时所遇到的挑战和困境，尤其是移居国的教育制度、大社会环境以及变动中的移民家庭和族裔社区对新移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影响。

我们的比较分析显示，在美国，由于华人移民在历史上经历过严重的社会排斥和种族歧视，主流文化与华人的儒家传统文化存在着剧烈的冲突，因此，华人家庭面临着文化和代际的双重冲突，使移民父母对土生土长的子女的管教更为复杂。新移民除了依靠自身的能力和社会经济背景，还通过华人社区的社会支持机制来缓解家庭内部的矛盾和代际冲突，使子女能够取得教育的成功。在新加坡，虽然中西文化交融，但儒家文化影响仍然较大，其择优录取的教育制度和中国的应试教育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新移民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制度和结构而引致的机会缺失。新移民本身由于超高端筛选而有较高的起点，加上充分利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跨国家资源，不遗余力地从时间、精力和金钱等方面投资于子女的教育，因而不得不从孩童阶段就开始未雨绸缪，应对新加坡的考试制度和过早分流带来的激烈竞争和焦虑。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海外华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除了新移民由于超高端筛选而有较高起点这个因素外，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有重教育的儒家文化和虎妈式的严管良教，还与多层面的移出环境和移入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和社会支持机制密不可分。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320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